

炎黄春秋

第 9 期

第

期

2011年

周瑞金：中国改革路线图

科学研判“消极腐败的危险”

刘泽华：文革中的思想历程

我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

苏联“八一九”事变目击记

目 录

特稿·辛亥百年

- 1 辛亥百年：从世界演变看中国改革路线图 ……周瑞金
12 重新评估三民主义的价值 ……匡萃坚
19 辛亥百年的主航道 ……朱相远

亲历记

- 22 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 ……刘泽华
28 苏联“八一九”事变目击记 ……张锡恩
34 楚图南在美国领事馆避难记 ……楚泽涵
38 1958年温江特大疫情病原体探索追忆 ……陈廷祚

一家言

- 41 科学研判“消极腐败的危险” ……李永忠 董 瑛
45 论孔子的复活 ……张绪山

访谈录

- 50 我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口述：艾 玲 整理：洪小文
53 我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
……口述：朱锡琪 访谈：金光耀 金大陆 整理：孙路遥

求实篇

- 59 张闻天理论的两大亮点 ……张培森

人物志

- 66 陈垣校长入党前后波澜 ……陈徒手
70 陈登科的“瞒和骗” ……陆志成
74 官越做越小的吴亮平 ……唐宝林

往事录

- 79 第二次“伍豪事件” ……丁 伟 郭德宏
81 为什么只有一位井冈山籍的开国将军？ ……孙 伟
84 张学良最恨日本，为什么打苏联？
……张晓丹 王海晨

海外事

- 89 1956~1957：越南“双百”运动人物素描 ……程映虹

专 稿

- 93 “求实存真”的一面旗帜 ……郭德宏

编读窗

- 94 读者来信摘登 ……脱恩铸等

顾 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陈 敏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赵德润 保育钧 郭道晖
资中筠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韩 钢 董 健 曾彦修
鲁 淳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竟成 张晓鸥

社 长：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吴 思

副 社 长：杨继绳 李 晨

副 总 编 辑：徐庆全 执行主编：洪振快

社 长 助 理：胡竟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经 理：李 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张晓鸥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员：白建钢

秘 书 长：吴 思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淞赵国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 刊 网 址：<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yhcqfxb01@126.com

电话：发行部：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68525374

办公室：68522852 (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8.00元

辛亥百年： 从世界演变看中国改革路线图

○ 周瑞金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迎来辛亥革命 100 周年的今天，我们以世界的眼光、历史的视角，结合中国的实践，审视我国改革所处历史方位，可以更自觉主动地把握改革的机遇和发展的进程。

如何观察辛亥百年来的中国发展进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特别是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我们应当从全球的视角加以观察。从世界经济、文化、宗教发展看，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中国虽说有自己的国情和特色，但总体上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许多重要文化、宗教、经济进程不但与世界其他国家基本同步发展的，而且在工业革命之前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首先，综观辛亥革命百年来世界社会思潮与国家制度的激荡、较量、竞争与融合

辛亥革命百年来，前五十年风云激荡，战争、革命、危机、冲突不断。其间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俄国十月革命，经历了一次席卷全世界经济大危机（1929 年从美国开始的）。二次大战后诞生了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东西方阵营，五六十年代民族独立运动此起彼伏。尤其是中国、古巴革命，印度（包括后来的南非）独立，对全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后五十年，世界进入相对的和平发展时期。一是新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推动工业化、知识化，出现知识经济、智能革命浪潮，中国正赶上这一波发展浪潮，取得巨大后发优势。从 2008 年开始又引发一场席卷全世界的金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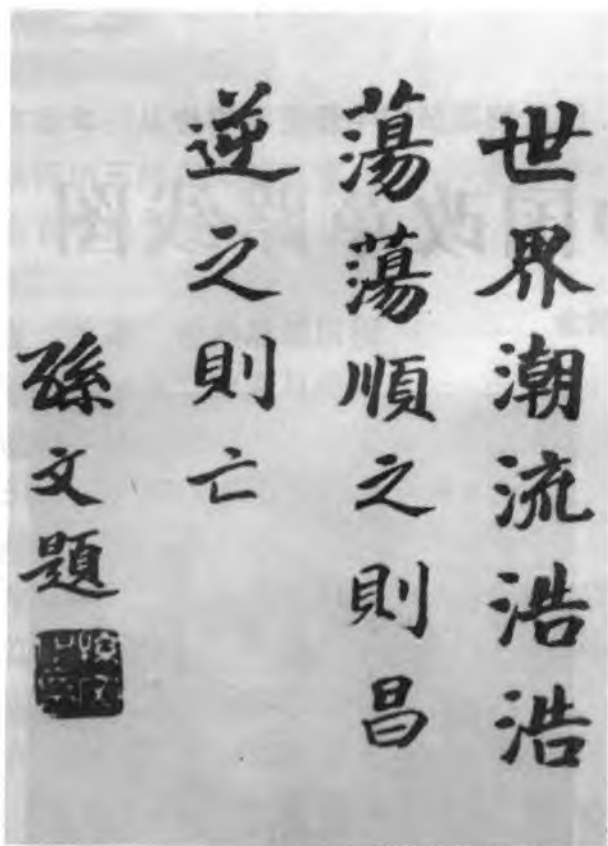


孙中山(1866 - 1925)

危机，至今世界经济未从这场危机中走出来；二是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崛起，欧盟出现，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以崛起的姿态走进世界各国的视野。

辛亥百年来，我们看到世界社会思潮与国家制度的激荡变化：

1、以前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及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实行全面国有化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领袖集权；思想文化上舆论一律，垄断意识形态；对外关系上输出革命，组成集团，冷战对峙。苏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席卷世界经济大危机中，显示了计划经济动员全社会财富，实现快速赶超粗放型工业化



孙中山遗墨

的优越性，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一枝独秀。后来又 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攻克柏林，战胜德国法西斯主义。上世纪 50 年代苏联在核技术利用和航空航天领域的领先发展，如第一艘原子破冰船下水，第一架超音速飞机上天，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开创了人类探索太空的历史。这为社会主义在世界上赢得巨大威望，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追求的目标。然而，由于这个国家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高度集中和垄断，束缚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不到提高，人民民主自由和人权遭到严重损害，内部危机日益深重，执政党严重脱离群众，终于显示出不可持续性，像抛物线那样先高后低，最终走向解体，并引发了东欧剧变，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2、以德国纳粹党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统制经济；政治上实行独裁专制，以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反对民主，扼杀人权，种族迫害，发动战争，给人类带来严重灾难。因此，它像电脉冲来得快消失得也快，很快被世界人民所唾弃。但它留给世

界历史重大警戒，凡发动世界大战者必亡！由此得以开启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时代。需要指出的是，纳粹虽然灭亡，但纳粹思想却一直阴魂不散，在世界各地时有火星冒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需要对此保持持续不断的警惕。

3、以欧洲各国社会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实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政治上以和平方式取得议会多数掌握政权，实行议会民主，提倡罢工自由，节制资本盘剥，推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文化上提倡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它像渐进线在欧洲发展着，结出今日欧盟之果。昔日战火不断，成为两次世界大战发源地的“火药桶”，今天变为统一货币、统一议会，边境开放，和平发展的区域经济政治联盟，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大创新。但是其高福利的模式也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希腊、意大利等国引发的欧债危机为其前途投下了一层难以忽视的阴影。

4、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新政为代表，对传统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坚持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同时实行必要的国家干预和社会调节，反对垄断；政治上坚持宪政自由和议会民主，推行社会改革，调整分配制度，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大缓和社会矛盾；文化上提倡多元兼容，自由思想，激励创新，不断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对外推行霸权主义。美国的变革无疑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改良中发展，成为今日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美国基本制度对资本节制不力，甚至有意纵容，使得美国的金融大鳄有可能吞噬其他国家的金融财富；虚拟经济有可能吞噬实体经济所创造的财富，从而引发规模宏大的全球性金融乃至经济危机，带来社会动荡；大规模举债的发展方式也可能最终因其在一定时期内无力偿债而导致国家信誉的崩溃，也会拖累其他国家。

5、以中国改革开放为代表，对传统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的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混合型经济和快速赶超的粗放型工业化。政治上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文化上强调主流意识

形态,实行思想文化舆论统制;对外关系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我国的改革无疑吸收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因素,使传统社会主义走出困境,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但对这种中国发展模式,我们要有清醒认识。因为它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与低工资、低地价、低人权的“高三低”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复制推广;同时,资源、资金、权力高度集中下的举国体制,虽然可以办大事,抗灾害,但也容易带来决策不当,暗箱操作,造成腐败,造成巨大浪费。甚至由于其不计成本的特点,容易形成官僚利益与垄断利益相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举国体制办大事的特点又极易让执政者产生“大跃进”、“跨越式发展”这样的冲动。这种冲动如果和特殊利益牵扯在一起,将给中国社会带来无法估量、难以挽救的灾难后果。许多清醒人士已经看到,这已成为我国深化改革、社会转型、民主建设的一个难题。

二 综观辛亥革命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路径选择的艰难、曲折与希望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企图通过军政、训政、宪政道路走向宪政民主和人民共和。他毕生奋斗,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家天下的皇权统治,但没有彻底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临终留下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然而,蒋介石把持国民党后,走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道路上去,与共和背道而驰。蒋经国在台湾主政后采取一系列政治革新举措,特别在晚年出于“向历史交代”、“不计个人毁誉”的强烈心理动机,大力推进台湾民主政治转型,解除戒严,取消党禁和报禁,充实民意机构,促使地方自治法律化,作了宪政民主的勇敢探索,成就了民主转型的成功。今天台湾的政党政治虽然不能说已经很成熟,但国民党政权失而复得,说明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展现了新的模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倡导社会主义,走向共和。建国60年来,前30年现代化路径选择,基本照搬斯大林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制度,发生严重失误。经济上全面国有化,追求一大二公,实行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比前苏联更急于快速赶超粗放型的工业化,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政治上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高度集权,进行全能主义的行政管制,取消了社会私权领域。文化上推行斗争哲学、驯服工具,实行一元化思想控制,舆论一律,文化统制。这样,造成国家吞噬了社会,执政党吞噬了国家,领袖吞噬了执政党的局面。我们党成立时走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门,想不到建国后稍稍地跳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窗口,走到文化大革命道路上去,国家经济遭巨大损失,政治冤假错案遍及全国(仅胡耀邦同志主持平反工作五年间就平反了300多万人),社会信仰造成混乱,国民心理遭受巨大创伤。

以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为代表的一代老革命家,痛定思痛,大彻大悟,决心与斯大林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决裂,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决裂,改弦易辙,另辟新路。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选择!经由这一历史选择,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三 当代中国在大国崛起中遇到的困境与难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奇迹般成就。GDP以年平均9.7%速度持续30多年增长而不衰,尤其在国际金融大危机之下仍保持高速增长。GDP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元猛增到2010年的39.7983万亿元(约5.74万亿美元),翻了110倍,人均达到4283美元。我国GDP总值去年已超过日本(5.4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的9.27%。邓小平同志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标,2010年已经达到,提前了40年。这真是谁都料想不到的。

再以汽车发展为例,2009年我国顶着金融危机汽车销量飞速增长,全年销售汽车1364万辆,增长46.2%。2010年我国汽车生产和销售又双双超过1800万辆(生产1826万辆,销售1806万辆),成为全球第一汽车生产和销售的大国。据2009年统计,我国石油日消耗量是800万桶,美国是2000万桶,中国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石油消耗量仅占十分之一,应当说还有发展空间。当

然,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多,主要还是发展轨道交通、公共交通。

还值得一提的是钢铁产量,2006年中国钢产量达到41750万吨,超过美英等28国的钢产量。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产钢13350万吨,英国加欧盟25国产钢19890万吨,他们加起来才33240万吨。想一想1958年我们为1070万吨钢,动员了9000万人工人法炼钢,炼出400万吨是铁疙瘩,更严重的是山林被砍光,植被遭严重破坏,还让丰收的粮食烂在地里,没有人工收成,造成后来大饥荒,饿死了三千多万人。一个是命令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两者对比何等鲜明!

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由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世界历史来看,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跨国海洋贸易使欧洲国家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转型,从神权社会走向人权社会,其间引起多少次战争、革命,充满血腥与掠夺。19世纪到20世纪的工业革命,欧美国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也是引起社会很大动荡。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激烈震荡了八九年,通货膨胀达到百分之一千以上。而反观我国,30多年同时进行三大社会经济转型,5000万工人下岗再就业,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二亿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却能保持全国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稳定。而且,这些年还不断遇到国内外各种危机、灾难的冲击,都没有引起全国性大的动荡,值得引以自豪。

然而,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随着国力的增强,人均GDP的提高,随着30多年来市场化的改革,也积累起来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困境。

其一,大国崛起的烦恼。中国的崛起是客观事实。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必然遇到新的问题。近年来围绕汇率、海权、领土、军事、周边关系、意识形态领域争议,中国与世界大国及周边国家不断产生摩擦,凸显了中国外交的严峻挑

战,也透露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担忧,甚至敌意。在对待西藏、新疆、台湾、人权等问题上更经常产生纠纷。南中国海争议,美越联合海上演习,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本民间反华情绪抬头,延坪岛炮击带来的频繁且规模升级的军演,以及诺贝尔和平奖揭晓引起新一轮对中国民主与人权的施压,等等,说明中国崛起遇到的外交挑战与麻烦也大大增加了。与此同时,国内狭隘民族主义思潮也抬头了。每出现一个涉外问题,民族主义思潮就上来,对正常外交产生干扰。而在外交应对上,受意识形态影响,常出现进退失据、十分被动的局面。尤其在处理与美国、朝鲜、非洲、中东等国关系上常陷于被动。外交工作上我们有时显得过于“另类”,适应不了大国崛起的挑战,往往很难与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同时,应对的对策不足,方式也不够灵活,缺少纵横捭阖的大国气度和韬略。

其二,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了四大问题: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28上升到目前的0.48(欧洲与日本在0.24~0.36左右)。而且,1%的人口掌握了41.4%财富,财富集中度畸高。招商银行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布了《2009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内地高净值人群(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到2009年底达32万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规模超过9万亿元。就是说,相当于中国总人口千分之0.2的人,持有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0万亿元的近一半资金。此外,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而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工资与福利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在经济发展中社会事业发展被忽视了,比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事业滞后。2003年在抗击SARS中表现较为突出,暴露出医疗卫生薄弱特别是农村。这些年GDP快速增长,财税大量增加,许多地方大造高楼大厦,经营城市,改造旧城,成了一种潮流。政府机关的大楼造得漂漂亮

亮,但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农村小孩上不起学。不少城镇居民买不起房子,居住条件很差,等等。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全国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卫生问题更是十分严重。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一代人的饭。如此高消耗发展模式引发了近年来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暴涨。要知道,环境债是高利贷,我们这代人借下了,子孙后代还不起。

四是权力腐败和社会腐败。一般官商勾结经济腐败,是世界各国都有的现象。我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第一卖官买官盛行,导致吏治腐败,败坏党风、政风、社风,影响恶劣。沈阳市慕绥新、马向东买官卖官案,涉及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等16个第一把手;黑龙江省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干部900多人,多名省级领导、上百名地市级领导卷入,引起全省领导干部大调整。有的贪得无厌,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前公安厅厅长)涉案总金额达20亿元;有的贪财又贪色,95%贪官有情妇,60%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人在网上公布“二奶排行榜”列出九个奖项,例如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包养146名情妇得数量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宾馆包养未婚大学本科女大学生17人,得素质奖;四川省乐山市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在16~18岁,得青春奖;还有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性爱日记95本,制作性爱标本236份,得学术奖。多么荒唐!第二,我国腐败蔓延到法院、检察院,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开始,到各地法院、检察院不少法官检察官犯案,有的甚至“一锅端”,这在法治国家少有。美国建国200年来,法官犯案的只有40来人,新加坡独立45年来没有一个法官犯案。因为法院、检察院被称为社会良心,是主持社会公道的机构,维护社会正义的主要力量,它的腐败是社会良心的丧失,社会正义平台被丢掉。第三是媒体舆论腐败,本来媒体是监督公权

力的有力工具。我国媒体不但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而且还产生腐败现象。一个是吏治腐败,一个是司法腐败,一个是舆论腐败,显然比经济腐败更严重,是与政治体制弊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体制性的腐败,值得引起严重关注。

其三,市场竞争的焦虑。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我国民众由人人参与政治搞阶级斗争的“政治人”,变为人人关心经济利益努力创造财富的“经济人”,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民众的上升通道。现在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不同,那时凭市场的自由竞争,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可以在社会获得上升通道。现在却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要上好学校读书,要找好工作,要升迁,要提职,都要跑关系,找靠山,讲背景,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社会上弥漫着浮躁情绪,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教育学术领域也受到侵蚀。这样一来,就进入信仰空虚、是非无据、唯利是图、险燥悱惻的时期,多年积累的不满、怀疑、怨恨,到了释放期,一方面督促当局改善改革,另一方面,也越来越不信任当局,当局做什么都会被怀疑指责,越来越偏激,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具有破坏性。这就导致民粹主义思潮起来,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到处宣泄。同时,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受主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金钱至上观念泛滥,人文精神丧失,人性的物化,导致不少人紧张、焦躁、精神崩溃,引起精神病患者大为增加,自杀率也不断上升。据有关报道,我国现在有将近一亿精神异常的人群,这么庞大的数字,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这就提出了一个迫切的任务,务必要把“经济人”变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人”,以取得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

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积累的这些问题,给社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权力失控,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1993~2006年从8708件发展到9万件。2007~2009年连续三年社会群体性事件都超过9万件。2010年全国信访总量970万件(人次),群体事件官方统计20817起。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用和城镇房屋拆迁上,集中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上。群体性事件大体分三种类型:

一种是维权型的社会事件。从农民抗税费到抗圈地,又发展到地下资源、林权、环境污染问题,矛盾冲突加剧。2010年发生十大社会群体事件,安徽马鞍山万人群体事件、山东潍坊拆迁冲突、江西九江拆迁冲突、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拆迁冲突等都是数千上万人闹事抗议。从成都唐福珍到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到今年5·26江西抚州连环爆炸案,标志着暴力化加强。

抚州钱明奇爆炸案具有典型的警示意义。钱明奇为房产两次被强拆的补偿问题,曾经上访10年、上网1年。他两次上告法院败诉,为此绝食四天,到检察院上告不受理,他静坐抗议;后多次到北京上访,被关进黑监狱。为向社会发出他微弱的声音,五十多岁的他学电脑学发手机短讯,并在新浪、腾讯、天涯、凤凰4家网站同时开通了微博,在网上给媒体人士和律师发“私信”,诉说自己的遭遇。他发微博说,“我十年依法诉求未果,请大家理解我反腐报仇行动!”他表示自己不学唐福珍,也不学钱云会、徐武,要学董存瑞。爆炸前一天,他又发微博说,临川将会听到爆炸声。5月26日上午在抚州市检察院内停车场、临川区行政中心的地下车库入口处与东广场发生三起连环爆炸案,三人死亡,五人受伤。凤凰主持人间丘露薇叹息:“进钱明奇的微博,赫然发现就在几天前,他曾转过我的帖子,后脊发凉。在那几千条评论中,我不会知道有一个声音是来自如此决绝、预备死亡的他。他一辈子不被听见,直到那一声巨响。”

今年6·6发生广东潮州古巷镇和6·10广州增城新塘镇群体事件,引发本地民工与四川籍民工大规模持械斗殴和互相报复,标志着二亿农民工维权问题提到新议程。

内蒙古锡林郭勒今年5·11与5·15抗议煤矿开采污染环境的两起命案,引起5·23、5·25全盟族众与学生抗议游行,接着又引发5·30呼和浩特20年来最大规模的民众上街抗议活动,蒙古族民众、学生呼喊“还我草原”口号。这标志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资源开发与维护当地民众利益的矛盾激化了!

另一种是社会泄愤型事件,参加者没有利益诉求,主要对社会不公发泄心中怨恨,对公权力和有钱人的不满。2009年6月湖北石首事件是

典型。为一个厨师死亡,7万人围攻政府,火烧公安局。这种泄愤型社会群体事件没有组织动员,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讲规则底线,打砸抢烧行为随意爆发。2009年海南东方事件、四川南充事件都属此种类型。

还有一种社会群体事件是骚乱。2008年9月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州骚乱,把政府砸了,也把当地超市砸了,超市与事件毫无关系。结果国庆节商店全部关门,野战部队开进去才恢复秩序。2008年3·12拉萨事件,2009年7·5乌鲁木齐事件,都属于骚乱,但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差别,其共同特点是攻击无关人员。

正是由于这样那样的问题,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走回头路,为“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鸣冤叫屈的思潮,借反思改革的名义来否定改革。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思潮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60周年建国大庆时,我们有意无意地屏蔽了前30年的沉痛教训,这极不利于树立改革开放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

综观这些社会群体事件,没有一件是直接针对中共的,也没有一件是反中央的,绝大多数争利不争权,用人民币可以解决问题。只有新疆、西藏问题复杂一些,有外来干涉。因此,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对目前中国改革面临的态势,我们可以作出一个总体的判断:一、经济保持快速发展;二、政治基本稳定;三、社会矛盾突出。我们从辛亥革命百年来,世界与中国的实践来看,还可以得出这么五点共识: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二、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三、公民社会是社会治理最有活力的社会选择;四、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五、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和谐共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从五点共识和我国总体态势判断出发,我认为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必须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为什么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必定涉及法治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和国有垄断企业改革,财政金融体

制改革,等等,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社会体制改革则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全能主义的政府回归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上来,要发育公民社会,实行社会基层自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这也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至于文化体制改革,首先涉及媒体舆论的改革,体现言论自由、思想多元,放宽舆论统制,发展新生媒体,激励文化产业创新,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可见,四位一体改革,攻坚内容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深化改革必定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

但是,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改革,又要分步骤实施。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现在看来,中国的整体全面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的路线图。

四, 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 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2004年,用了大约25年左右时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着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2004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标志,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深化、完善。就在这次全会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表明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

这个阶段,需要花大约15年到20年左右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两个多五年规划,到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十二五”期间正是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公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



邓小平在1980年和1986年两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改改的道路仍然很漫长

这也是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主要要求。所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就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解决30多年来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所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体制改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务,又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借鉴世界历史的经验,欧美国家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当中也出现过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的美国,经济发展很快,但出现了产业与资本财团的寡头垄断,出现权力与市场结合,权力与资本结合,官员普遍腐败,社会失业工人很多,贫富差距拉大,妓女满街走,社会治安一片混乱。20世纪初,美国在老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领导和支持下,发动了一场反垄断的斗争,美国媒体发动了充分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扒粪运动”,引起全社会震动。由此推动了三十年代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出台。顶住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美国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逐渐建立起完善的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教育普及制度、

医疗保障制度、失业养老保险制度等的建立,支持工会与资方展开利益博弈,从而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这是资本主义一场成功的改良运动,使资本主义制度走出困境。这是列宁当年写《帝国主义论》所未曾料想到的,列宁论述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大部分是不准确的,其结论也被实践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其实,第一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中,也包含有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内容;第二步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也包含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第三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也包含着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总之,改革“三步走”,经济、社会、政治三大体制改革是互动的,互相配合、相互促进的。

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一个是制度层面的。在意识形态层面,我们要形成一些全社会范围的基本共识。我们推翻了一个旧社会,那么我们要建设的新社会有哪些基本特征?社会以何为主体?是官府还是民众?社会秩序的主导力量是什么?社会的伦理、道德底线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应该看到,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和阶级斗争逻辑给中国人民套上了沉重的桎梏。社会上假话充斥,假面盛行。很多官员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人格完全分裂。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所应有的现象。应该把假历史、假成绩、假典型、假榜样,像对待假货那样,统统送进垃圾堆。为此,有必要彻底摒弃阶级斗争思维,让意识形态回归常识,使社会回归正常。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下,才谈得上社会建设。

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在制度层面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六大民生问题。一是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这是中央一再强调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建立学习型社会的基本要求。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更新教育观念,改变教育内容方式,搞好小学、中学、大学教育同时,还要搞好职业培训、社会教育、终身教育等等。要从教育这个起点上实现机会公平和社会公平。中国现在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寄托谋生前途于大学学历与文凭,将谋生与做学问混淆起来,

结果毕业生往往缺乏做人做事的学问,扼杀了各行各业的创造力和生机。信息时代,完全可以利用网络、电视、手机、广播,广开门路,制作各种课程,从生存技能到生活艺术,从广博的知识到专业的学问,都可以任人选择学习。职业门槛应以职业技术资格为基本,重点在于实际贡献。全社会应鼓励人格平等、职业地位平等,靠合法劳动谋生光荣的风气。职业教育与做学问分开,也是教育改革必由之路。

二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这个问题,十多年过去了,不是国家财力不足,而是由于政府内部重重阻碍,至今未建立,使弱势群体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现在建设进度必须加快,尽快建立城乡失业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三是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扩大就业是合理公平分配格局的基础。一次分配在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就要注意公平。二次分配更要体现公平、公正原则,使低收入者提高收入,高收入者在税收上多贡献些,扩大中等收入人数,拉小贫富之间差距。1993年,邓小平就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解决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的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今天回头看,小平同志的预见多么正确!

四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尤其是农村医疗服务最差,要改善。医疗卫生作为公益性事业,应当以人为本,最大努力保障民众的身体健康。目前我国医疗的现状,是所有病患都诉诸于大医院和专科医院,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结果是病人和医生都不满意。如果改为社区医疗为基本,大量培养社区全科医生,在社区做保健诊断与保健指导(中医讲究“上医治未病”),有了小疾病就地解决,就会大比例降低患病率和医疗成本。社区医疗解决不了的问题,才由社区医生介绍到专科医院、大型医院,这样就理顺了医疗体制。

五是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应该建立廉租房、

平租房、产权房三级体制,对于平民大众,到处都有平租房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大众就有居住自由了;对于穷人,提供廉租房。其余才是产权房。上海这些年建了那么多高楼大厦,但老百姓住房却没有真正解决。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新到任时,到市中心黄浦区居民点考察,看到不少居民还住棚屋,晴天日晒,雨天漏水,他感慨地说,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还有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我们政府没有尽责啊!的确,现在不少城市是表面繁荣,百姓痛处何在,缺少关心。

六是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现在水荒、水污染严重,食品不安全屡见不鲜,药品有假冒伪劣,还有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事件,震惊朝野。百姓基本生活环境都没有保障,谈何解决民生问题?现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百姓要求很高,对环境要求也高了,我们虽然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决,但一定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解决。

切实解决民生问题,需要把我们的财政预算从行政财政变为民生财政。中国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据统计,1978年到2003年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万多亿元,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元升到7000亿元,增长达87倍。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达到19.03%,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在这28年里,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倍,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接近四分之一。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的3%~6%。还有一组数字,据财政部谢旭人部长介绍,2007年中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三项开支总共6000亿元,相当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收入461元。而在美国,同样三项开支为15000亿美元,相当与政府总开支的61%,为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2007年美国财政税收占GDP的18%,中国5.1万亿占到20%,说明中国政府相对收入高于美国,但美国把61%的财政收入用在普通老百姓身上,而中国只把15%用在老百姓身

上。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向改善民生增加拨款?涉及政治体制问题,中国党政官员多,三公消费开支大。要坚持以人为本,实施民生财政,抑制三公消费,新的财税改革势在必行。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壮大中产阶层。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50%~60%以上(目前我国为46%左右,一年增1%,约10年左右达到56%指标,发达国家达80%以上),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以上。这样,年收入在6万~18万元(月均5000元至15000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产阶层的人数,可提高到占总人口的40%~60%(目前我国占20%左右)。有专家提出,我们如果能培养出7000万高级技工队伍,就能解决这中产阶层问题。这就形成了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中产阶层既是推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主体,也是现代文化承载的主体,壮大中产阶层就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一定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城镇化问题。欧洲、日本、美国的城镇化,是保护农民本有的土地和生产生活方式,帮助农民做好医疗服务、生产服务,在村镇的生活便利与美观艺术设计上,在宗教文化艺术精神生活上,在环境保护和行业自律上,给予良好的设计与保护。而不是搞乡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消费城市化,环境污染化。而我国有些地方的城镇化,大批农民被改变生存基础与生活方式之后,土地问题解决不好往往成为矛盾焦点,粮食安全问题也存在较大风险。大批农民作为城镇化居民,会要求与城里人平等待遇,如果得不到满足容易成为乱源。

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既是社会体制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

其次,要从制度上保障社会组织包括宗教组织的适度发展,放宽对民间组织的管制。有活力的宗教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该与其充分合作。在不可



中国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城乡居民的居住环境,图为一居民小区

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靠经济手段,而不是强化行政手段,防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涉微观经济,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

社会体制改革,需要建立起一系列制度,来确保社

会改革成果。当前急需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制度,这是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本途径。建立这个制度要配合建立信息获取机制——保证公众知情权,即有阅览卷宗、参与听证等的权利,让公众及时了解事关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与公共决策,在第一时间就能保护自身权益;利益凝聚机制——以一定组织形式为载体,把公众中分散的、散射的要求凝聚和提炼起来,达到提供政府决策的层次;诉求表达机制——让公众有利益表达的渠道和环节,如以听证、表意、监督、举报等方式向公众提供表达机会。还要设置相关制度使利益各方通过大众媒体等方式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施加压力机制——当今利益分化,有了强势与弱势之分,强势群体拥有资源多,为自己争利益的手段也多。而弱势群体必须有特殊的施加压力机制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当然对这种施加压力机制需要用法律法治加以规范;利益协商机制——在利益诉求明确基础上,矛盾各方按法律渠道和程序进行对话与谈判,协商公平有效地自行解决利益纠纷,政府无需事事介入,既减行政,又节约社会成本。目前急需建立和完善的是劳资双方的协商谈判机制;调解与仲裁机制——在矛盾双方无法达成妥协的情况下,第三方的调解和仲裁必不可免,应该鼓励成立民间仲裁机构,大量的纠纷应该交给民间仲裁机构处理。中国古代民间纠纷,一般是族长或乡里有德行威望的人给予仲裁(做主),其次是找里正,再

预知的危机到来时,社会便会显示出强韧的弹性,社会结构就会更加牢固。所以,要重视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比如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等,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按照发达国家的统计,每百人就有一个社会组织,而我们国家有13亿人口,目前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45万个,备案的社会组织25万个,实际存在300万个左右,即使如此也只有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但这些社会组织已覆盖我国社会各个方面,初步形成体系。仅6万多个行业协会就联系企业会员2000多万,4万多学术团体联系专家学者500多万人,专业协会联系1000多万家。中国各种商会、协会、学会、基金会、志愿组织、维权组织、慈善组织等这些社会组织还要进一步发展,政府要推动、协助、保护这些社会组织的发展,而不要视为对立的、异己的力量。目前对社会组织还是制约大于鼓励,重要法律法规并不完备。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管理创新,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那就要转变原来对社会组织从管制为主变为培育和鼓励为主,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鼓励他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

次才是告到衙门。民间仲裁无法解决,才由政府
和司法机构介入,担任最后仲裁角色,这是矛盾
终止机制,类似于法院的终审裁定一样。

五 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而谨慎地推进

经过经济体制为重点的改革阶段,现在的社会矛盾暴露很多,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预示着,如果不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不解决民众关注的民生问题的话,就会影响到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同时,在社会矛盾多发的情况下,如果不经由社会体制改革,而突出政治体制改革,在社会基础、公民素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落空,甚至带来政局动荡,最终损害我们的事业。

在基本完成社会体制改革之后,我们有条件用25年左右时间推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努力建设经济富强、宪政民主的国家,建设法治文明、自由发展的社会。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增长上,还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以及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上,要建立一个大家都有幸福感和满意度的和谐社会,人人能享受充分的政治自由和民主,人权和私人产权得到充分保护,社会真正进入一个民主、和谐、幸福、法治的发展阶段。这应该是21世纪中叶实现的目标。这样就跟邓小平提出的发展“三步走”战略配合协调起来了。

改革30年多来,我们丧失几次政治体制改革的好机会。但30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两大成就,即党与国家领导人形成年龄、届别的定期规范的交接班制度,网络媒体日益成为推进民主政治的平台,这些成就意义重大,为我们未来的改革做了必要的准备。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社会民主问题,也即解决党政职能分开、权力过度集中、缺少监督的问题。具体来说,要改变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调整执政党与民意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与执政党的相互监督作用。执政党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要进一步完善起来,提倡竞争性选举,

从党中央到乡镇委员会实行较大差额的民主选举。协商民主与直接民主互动,监督和制衡体制健全完善,党内民主风气活跃,社会思想文化更加多元,舆论更加自由开放。党管军队、管干部、管舆论,如何管得科学、管得民主、管得依法,要有新的规范和制度。四大基本政治制度(人大、政协、民族区域自治、社会基层自治)的改革要配合推进。总之,通过改革建立现代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制度,改变传统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保证既能体现党的领导,又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都统一在依法治国、宪法民主之下。也就是说执政党应当遵循民主政治的规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必定会迎来新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改自己,共产党改共产党,政府改政府,官员改官员,所以相对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而言更困难一点,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要有自我改革的决心和献身精神。

经过“三步走”改革路线图,到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社会体制改革也接近完成。到新中国建国100周年的时候,我国经济总量有望超过美国,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完成,社会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这个时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任务可以说真正实现了,“中国模式”也可以光耀世界了。■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重新评估三民主义的价值

○ 匡萃坚

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孙中山的精神遗产中最突出的就是三民主义。长期以来理论界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和评价一直存有偏颇，认定它早已过时，被历史远远抛到了后面。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条件下，面对现实，人们对此不能不予以重新思考：既然当今仍然强调要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实现祖国统一，既然提出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既然还高调宣示关注民生，并将其作为一个永恒的课题，那三民主义的历史使命岂不就仍未完结？由此我认为，重新评估三民主义价值的问题，应被提上日程。

需要说明一点，我们这里的评述是以较为成熟的三民主义为限的。三民主义经过了一个由笼统的三民主义，到具体的一民主义、二民主义，再到具有丰富而深刻内容的三民主义的过程。

一、理念：激进主义还是温和主义？

在中国近代史上，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在与立宪派的对立中，一直被视为激进主义者。1923年他在一次演讲中，针对社会上的“疑义”与“误会”指出，“其实中国式之革命家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他一再表示自己与“激进主义”无关，“中国人从不为极端举动”。而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的则是另一种误解，认为在三民主义中间保留了不少“东方文化、阶级妥协的旧思想。”在我们学术界，流行的也是对其温和主义的批评。

我以为，首先是不要忘记，作为一个革命家，孙中山自始就有其激进的方面。他早年立志革命，反对保皇，就认为二者之间“理不相容，势不

两立”。他表示，赞成共和政体，“赞成在这个伟大的国家的发展中进行根本变革。”为此，他高举武装斗争旗帜，直接、间接领导了多次反清起义和讨袁斗争。他宣布，“不能容忍别人瓜分自己的国家”。对于掠夺我土地、奴役我人民的帝国主义强盗，他主张“奉行强硬政策”。为了废除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款，他甚至准备“同日本作战”；并表示，一旦到了那种时候，“我们革命党一定打到一个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条款废除了才歇手。”斗争的实践使他认识到，“盖当革命时，非采激烈手段一定不能成功”。在实行“联俄”、“容共”政策后，他甚至一度接受了共产党人的某些口号，如提出“对资本家宣战”，说“现在中外的工人都是一样的作战，所向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敌人”。不过，这主要表现在个别言辞上，其基本态度仍不失温和，即努力“调和他，使不各趋极端”。

应该看到，孙中山是在革命的前提下讲温和的，并非奉行无条件的温和主义。在革命斗争中，他一直坚持讲策略，不蛮干。如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为非作恶，除了作必要的回击外，他力主交涉，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他视此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他的基本认识是：“排外与畏惧，两端皆非”。对于国内的反动势力，他主张“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府（客），完完全全扫干净”。同时，又尽可能利用军阀间的矛盾，予以制约。对于清皇室，他同意给以优待，除发给年金，还保其财产。对于国内党争，他也主张讲规则，“为文明之争”。这就是既讲斗争性又讲灵活性，不是处处讲你死我活，并在斗争中留有余地。

在社会变革问题上，孙中山则明确反对激进主义，坚持和平与改良。他说，“对于资本制度只可以逐渐改良，不能够马上推翻。”他反对滥用暴力，称劫富济贫为“荒谬绝伦”。他始终反对“夺富

人之田为己有”。在提出“耕者有其田”口号后,他强调并非“马上就要”,不能“仿效俄国的急进办法”。他的原则是:兼顾业佃,“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对于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他都主张互利双赢。他说,“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很公道的办法,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至吃亏。”他支持工人农民组织起来,争取自身权益,只是认为对其正当要求的满足,要以客观条件的许可为限,不能一步到位。他主张“制定工人保护法,以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徐谋劳资间地位之平等。”“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徐谋地主、佃农间地位之平等。”总之,三民主义既含有激进的一面,却不是激进主义;其基本面是温和的,但又不是绝对的温和主义。这就是,在革命之后讲改良,除弊之后讲兴利,大恶除去之后再除小恶时讲温和。



图为孙中山亲自题签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书

二、目标:有没有最高纲领?

有种长期居主流地位的看法,说在三民主义中“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这不是事实。孙中山一贯主张革命党既要有“适应目前时局之需要”的“最小纲领”,也要有“最大纲领”。如果把最高纲领看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话,那就应该承认孙中山确有这种纲领,因为他是位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他说过,“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为利国福民之神圣。”他在复社会党国际局的信中说,“我辞职让位给袁世凯后即……专心致力于探寻逐步以社会主义思想来缔造政府的最佳途径,以实现我这一生唯一的目标和抱负。”他相信,“中国是一个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她的政府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政府的典范。”他之所以采用“民生主义”一语,就是为了“较为允当”

的表达社会主义的内涵。他再三表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包含社会主义。他对社会主义的前景充满了期待。

孙中山还承认“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的理想”,人与人争的结果“必要再回复到一种新共产时代”。他用传统语言描述过“大同世界”。这就是:“幼者有所教,壮者有所用,老者有所养”。他相信“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针对某些对“共产”的简单化理解,他还强调,“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同时,他还曾用马克思的一些语言来描述共产主义社会,说“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处一家,各尽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竞争,郅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之一途。”不过他明白,这是长期的奋斗目标,眼前还谈不上。他指出,“今日一般国民道德之程度未能达于极端,尽其所能以求所需者尚居少数,任取所需而未尝稍尽所能者随在皆是,于是尽所能者,其所尽未必充分之能,而取所需者,其所取恐又为过时之需矣。狡猾、诚实之不同,其勤惰、苦乐亦因之而不同,其与真正之社会主义反相抵触。”据此,他认为共产社会的真正实现当在“数千年之后”,我人不必“穷思竭虑,筹画于数千年之前”;而当前的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他写道,“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

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三民主义政纲所定的各方面的目标,都是既具体实际,又远大宏伟。在民族主义方面,内要“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使“五大民族相爱相亲,如兄如弟”。直至“团结国内

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外要先“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在“恢复我一切国粹”后，又“学欧美之所长”，以达至“和欧美并驾齐驱”。在民权主义方面，在以共和制取代替君主制后，还要以“民治”代替“官治”，超越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实现“直接民主”。“真正以人民为主，造成一个驾乎万国之上的国家”，“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在民生主义方面，通过经济变革和发达实业，实行“《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直至“消灭贫富阶级于无形”，“使中国为世界最强之国、最富之国，又政治最良之国。”在这几方面，都无一不既包括有最低纲领，又包括有最高纲领。至于这种纲领是否只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主观愿望，有没有实现的可能，那就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另一个问题。

三、路径：两阶段革命能“毕其功于一役”吗？

列宁创立的“两阶段革命论”认为，一、在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任何跳出它的企图都只能是反动的空想。二、为其发展开辟道路的民主革命，是历史进步的必由之路。三、只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才会到来。列宁据此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民粹主义”与“主观社会主义”，说他的思想“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毛泽东也据此说孙中山“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说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过程”。应该说，对孙中山的这种批评是不准确的。

首先，孙中山的愿望并非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他深知，政治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将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近世进步资本主义之天然推演”，“非人力所能阻遏”。他主张对私人企业“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就是支持、而不是阻止这种发展。其次，他并不认为既然这种发展是不可阻遏的，就应对其发展取自由放任态度；而是恰恰相反，主张积极地进行干预，以“预

防大资本家之发生”，“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进而预防不可避免的“较政府专制为尤烈”的“资本专制”。第三，其更为深远的着眼点则是要防止爆发再一次的社会革命。他认为“若不思患预防……那时再杀人流血去争”的局面就必然到来。他并不把社会革命视为盛大节日，因而大声疾呼，“须知社会革命的惨痛，比政治革命流血更多。”在他看来，西方的这种教训历历在目，“欧美各项国……现在还是在剧烈战争之中”。他强调，若不予以借鉴，在中国则“三十年后又将酿成欧洲革命流血之惨剧。”

孙中山提出的预防资本走向垄断与专制的办法，总的可称之为“节制资本”。具体说来就是：推行实业计划，一方面发达国家资本，“行资产国有制”；另一方面在扶植微弱的私人资本的同时，将其发展限制在“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范围之内。至于外国资本，则在“直接有利于民，间接有利于国”的条件下，大胆吸收，“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由此可见，这里对私人资本的基本态度，是扶植而不是消灭；同时予以节制和引导，而不是放任。换句话说，即不是撇开，而是利用。其目的就是要既减轻资本主义大发展过程中的痛苦，又避免再次革命的灾难，以更为顺畅地走向他所期待的社会主义。

有人说，在东方国家革命问题上所搞的“‘两阶段论’……骨子里还是资本主义阶段的不或逾越论”。我以为这是不错的；只是不够，还应加上“资本主义的不可节制论”。当然，在孙中山那里，资本主义的“可节制”是有条件的。他相信，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达，“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尚未流入阶级战争之中。”就是说“障碍物未生，因而行之故易”。如果资本主义发达了，像西方那样，要节制就难了。

孙中山在近代中国的条件下，力图通过“节制资本”将西方分为两次的革命贯通起来，这就是“以欧美为鉴，力谋社会经济之均等发展，及关于社会经济一切问题同时图适当之解决”，“为一劳永逸之举”，这就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熔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于一炉。其发展前景便是“使革命频仍之痛苦消灭于无形。”这可以说是，走一条不消灭私人资本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如果完全否定这条道路的实际意

义,那岂不就是要先把先通过革命,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然而放任其发展,引发消灭资本主义的再次革命的西方道路,作为世界革命的通则,要求东方落后国家紧随其后,亦步亦趋。在孙中山看来,这不仅是条弯路,而且是条痛苦的路,实在不可取。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所作的这种独立探索,与马克思主义者从东方国家实际出发所作的探索,可谓不谋而合。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探讨过东方国家发展的特殊道路问题。马克思说过,俄国农村公社未来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恩格斯也认为,处在资本主义以前发展阶段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搞社会主义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这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共同信条。后来的历史说明了什么?恩格斯在垂暮之年反思道,“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既然资本主义还不可能“铲除”,哪如何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不就得重新考虑?这段话表明,恩格斯已开始自觉面对这一问题。列宁晚年则已用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对这一问题做了回答。1921年11月在同蒙古代表团谈话时,他还明确地阐述了“向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过渡”的各种问题。在中国,毛泽东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其实际意义也正在于此,即跨越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提法说明,他承认在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强调了民主革命阶段的长期性以及革命转变过程中共产党领导的必然性。可是,新的经验表明,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再次革命,是否就一定不可避免,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东方国家革命学说的这种发展历史表明,孙中山的上述设想有其合理性。

四、属性:是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理论?

学术界有一种相当固定的看法,将三民主义

视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称孙中山为革命的民主派,即资产阶级革命家。

我以为,说三民主义是民主主义理论,称孙中山为民主主义革命家,是正确的。列宁曾赞扬三民主义为“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说其“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也曾认定,“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他的党纲虽不完全,而表示于公众的三民主义和发展实业计划,都是民主主义的色彩。”对此,孙中山是认同的。在他的言论中,常用的提法虽是“民权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但二者是相通的。可是,将三民主义定性为资产阶级的理论,称孙中山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则不恰当。

首先,视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的观念,来自一种传统理论:社会主义是消灭资本主义的产物,不反对私有制、不触动资本主义基础,即不超出“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在这种条件下,资本主义终将发展进来,再一次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但是,如上所述,这时通过“节制资本”是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的。在这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相通的,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分界线。这种贯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显然已超出了资产阶级所能允许的范围。手定这种纲领的革命家,怎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

其次,不能仅仅依据所有制关系变化的状况,来判定革命的性质。应该看到,所有制问题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唯一的;不是所有制一变就一了百了。在社会经济问题中,民生问题既实际,又广泛,且急切。撇开这些,孤立地抓住所有制,仓促进行变革,只能造成混乱,不仅无益,反更有害。因此,要准确判定革命的性质,就不能将眼界局限于所有制,不能局限于经济纲领,而必须从整个社会关系入手,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其全部纲领。在这里,具有代表性的是孙中山所草拟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这一《大纲》指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这里的“民生”指的非某一阶级,而是“全国人民之衣食住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这里既承认土地、资本所有者的权

益，又强调自然资源增加之利当归“人民所共享”，“原主不得而私之”。还规定“政府当与人民协力”经营各种事业，以应“种种公共之需”。“其次为民权”。这里的“民”包括有富人与贫民。当经军政、训政至宪政告成，人民得以行使选举、罢官、创制、复决诸权之后，由人民授权组成政府。这时富人专权就不再可能了。“其三为民族”，扶植“国内之弱小民族”，“抵御国外之侵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这自然也是全国人民、而非某一阶级的要求。这种政纲及其手定者，能看成是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代表吗？

第三，孙中山除反复表达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外，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承认资本家“在经济上已经成功”，可是他们“自私自利，不顾群众生活”，使“很多人没有饭吃，甚至饿死，所受的痛苦不是一言可尽”。他谴责道，“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由此他承认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战争的合理性，说“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他还明确指出过三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说“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又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不愿少数富人专利”。孙中山是坦诚的。他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他的这些言论和政纲的吻合性也是一目了然的。这种理论和政纲的突出特点就是：兼顾社会各阶级——包括对立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使他们能各得其所，均有所获而不受损。所有这些都说明，孙中山确是一个为全民、而不单是为某一阶级谋福祉的国民革命家。

五、风格：其论说是空泛还是实在——只是欠精深？

孙中山有理想、有抱负。他目光远大，告诫国人“当看到数十年、数百年以后，及于全世界各国”。他胸怀开阔，主张“博爱”“普及于人人”，“地尽五洲，时历万世”。他意志坚强，百折不挠，任何时候都信心满怀。可是，他高瞻远瞩的言论却常常被人误解为大话、空话，甚至被讥称为“孙大炮”。三民主义也常常被误解为无实际意义的政治口号。一些西方学者还认为，三民主义只是些

像竞选演说一样的空洞无物的“现成的套话”。

孙中山是革命家、实践家，不是理论家。他从事理论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学理，而是为了指导斗争。这就使他的理论显得非常地务实和朴素。例如，在对社会问题的把握上，他不多作抽象的理论论证，而是把问题直接落到实处，突出民生，关注民众的生存状态。对于土地问题，他重视城市地价的上涨以及如何实现涨价归公的问题。这点看来似乎有些超前，常被人视为不切实际；但在经济发展后，这其实也是一个必然会出现的大问题。他重视在党内外、在群众和军队中作理论宣传。从实际需要出发，在宣讲中，他对三民主义一项项讲得很细，有计划、有步骤，甚至有程序、有规则，但所作的论证，则是粗疏的、朴素的。可正是因为这样，使他显得更亲近民众。而务实、朴素、亲民，这恰是一个革命家所倡导的理论的优点和优势之所在。

全面地看，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三民主义也有其不足；尤其是跟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比，更显出其欠缺理论的高度与深度。例如，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孙中山的阐释常停留在古老传说的层次上，并无规律性的把握。他并不认识历史上自由价值的可贵，对于马克思所谓的贯穿于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人的自由、自主发展”线索并不了解，因而只从革命斗争需要组织纪律出发，就对自由与自由主义取全盘否定态度。对于作为最高理想的“大同世界”，他一般是用《礼记·礼运篇》的言论来说明，缺少现代经济眼光。人们不禁要问，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出现的这种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天下，难道真值得向往吗？他还说，“到了共产时代，大家都有面包和饭吃，便不至于争”。并认为“太平天国此等制度，便和俄国所行的共产制度一样。”这里所反映的实际就仍是一种小农的“共产”观念。他在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解说共产主义社会时，其理解也停留在较浅的制度层面上。从他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由人联合体”未置一词，对马克思的“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以及“人的胃和肉体的需要”是有限的，人的“正常需要”是“某种‘僵硬’的东西”的观点也不清楚，因而对有可能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境界深感困惑。还有，虽然他对那个时代的工业革命与资本制度

是了解的；但由于不明白社会形态的演进最终“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的原理，因而只能把社会进化的动因归之于“求生存”的“内在欲望”，说“历史的重心是民生，而不是物质”。如此等等。

三民主义理论之所以有以上不足并不奇怪。往深处看，这里既有孙中山个人方面的原因，即他保有中国和东方思维的特点，重于实证考察，疏于理论抽象；但更多、更主要的原因却在客观方面。三民主义定出来之后，他除在战斗的间隙从事过几年著述外，毕生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上。他没有条件、也没有实际的需要去从事更高深的理论研究，并对之做出更为充分的理论论证。

孙中山对于自己的欠缺是清楚的，也是承认的。他钦佩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赞扬“他的研究透彻，理由充足”，终于“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他称马克思学说的信仰者为“社会主义里头的……科学派。”由于深知自己没有达到马克思那样的理论高度，因而他一再表示要“师马克思之意”，并尊称马克思为“圣人”。

比较而言，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各有特点。一个体系完备，论证充分；一个立足经验，论证朴素。一个注重科学抽象，把握历史规律；一个贴近社会现实，只作一般的归纳和推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革命的理论，二者在根本问题上、在大目标上是一致的，至少是大同小异；分歧主要在具体道路和方法问题上，——但即使在这里，也不是没有共同点。三民主义讲宽容，马克思主义讲多样性的统一，不同而和，二者完全可以并行而不悖。

六、意义：突显于现实中

苏俄政府代表、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聘为政治顾问）的鲍罗廷有个说法：“中国国民党宗旨最适用。中国尚可应用一百年。”应该承认，这位共产主义革命家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是了解的。在普遍认为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并不遥远的背景下，他这种“一百年”的说法好像有点夸张，但它实际反映了一位共产党人对三民主

义的高度认可，承认在中国它将管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孙中山是志向高远的革命家，他相信自己手创的三民主义是种既立足现实，又着眼未来的革命理论，短期内不会过时。他强调，“如果有了不均，三十年之后不革命，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一定是要革命的”。因而三民主义依然会适用。

当代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三民主义在现实生活中仍有意义。从在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从中国这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结论中，我们看到了不少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张相类似之处，甚至可说其间显现了浓浓的三民主义色彩。

（一）在社会变革问题上，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政策，对于非公有制经济是保护与发展，而不是排斥、打击、摧毁，直至其绝种。这走的就是一条“节制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的道路。至于在保存私有经济的条件下，如何面对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社会分裂的问题，现在也已逐渐呈现出来。这和孙中山预防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构想，所提出的就系同一类问题。

（二）在社会建设的道路上，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倡导和谐社会建设，强调“统筹兼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全体社会成员互相帮助，融洽相处，使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康乐。这不就是力主温和与宽容吗？在战略思想上的这一重大转变，与三民主义的基本理念就有一致之处。

（三）在建设与发展目标上，与三民主义宗旨相一致之处就更多：1. 主张在国内巩固和发展不同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在国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这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不是相容的吗？2. 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以人民为主人、官员为公仆，建设服务型政府，保障人民依法行使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权利，还有扩大基层民主，完善群众性自治等。这不就是民权主义精神的发扬吗？3. 强调始终关注民生，以改善民生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2008年胡锦涛在党

的十七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要求。”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更是着力于说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全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实际上不就是高举民生主义的旗帜吗?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已经突显了三民主义的重要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仍然坚持讲三民主义。2009年7月12日,马英九在竞选党主席时发表“七大政见”,强调“以三民主义为核心价值”。他的伦敦经济学院演讲,在追述孙中山三民主义形成过程后指出:“由民族独立、政治民主与社会福祉三个理想所构成的三民主义,正是国民党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

三民主义今天可以说已成为国共两党、海峡两岸的一种共同语言。历史上为了共同的民族使

命,曾经有过两次国共合作。通过两党的合作,焕发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力,建立了令世人惊叹的功业。那时我们尊奉孙中山,表示愿为三民主义纲领的实现而奋斗,其作用是积极的,没有造成思想混乱,更没有带来什么消极后果。可以肯定,今天我们承认三民主义仍然有价值,只要头脑清醒也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台湾《联合报》在《中华民国九十九年感思》的社论中写道,“当海峡两岸今日共同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并反省这60年分裂、分治后各自的是非对错,现在还能一同想到孙中山,还能一同想到辛亥革命及武昌起义……天安门广场的孙中山巨像即是重要象征。面对中华民国100年,海峡两岸若能在辛亥革命精神与孙中山事业中找到更多交集点,两岸未来应当会有更多的相互善意,并有可能发展出双赢共生的共同憧憬。”■

(作者为江西财经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万里图书馆文献资源征集启事

“万里图书馆”,是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同志的姓名命名的图书馆,坐落于万里同志的家乡高校——泰山学院。这是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姓名命名并设立于高校的第一家图书馆。

万里图书馆开馆于2010年7月15日,全国政协原主席李瑞环、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田纪云分别为该馆题写馆名,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出席开馆仪式,为万里图书馆的开馆及“中国改革发展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剪彩、揭牌。万里图书馆常年举办“万里与中国农村改革文献图片展”。

万里同志的长子万伯翱同志任名誉馆长及中国改革发展史研究中心主任,次子万仲翔同志任中国改革发展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女儿万淑鹏同志任该馆馆长。

为充分发挥万里图书馆的收藏、展览、研究、育人等功能,我馆下设的“万里文献资料中心”、“中国改革发展史资料中心”与研究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基地,特向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公开征集相关图书文献以及相关实物,热望各界友人给予大力支持。我馆将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精心保护,科学使用,确保您捐助的资料和实物能充分发挥它们的珍贵价值。

征集范围:

- 1、万里同志及其与中国改革开放相关图书文献;
- 2、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的图书文献;
- 3、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图书文献;
- 4、上述征集不限载体和文种,包含图书、传记、手稿、日记、回忆录、文件、会议资料、音像资料、生活用品等。

征集办法:

欢迎有关单位和个人无偿捐赠。不论是文献还是图书,我馆将永久收藏。专题性质的文献捐赠,我馆将设专柜收藏。凡捐赠者,可来馆查阅、复制资料,颁发收藏证书,并邀请参加相关的学术和纪念活动。

通讯地址:山东省泰安市迎宾大道中段

万里图书馆交流中心

邮 编:271021

联系人:姬秀丽

联系电话:0538—6715912

Email:wltsg10@163.com

万里图书馆

2011年6月19日

辛亥百年的主航道

○ 朱相远

继续发扬中。

一、两种文明碰撞的升华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辛亥革命说到底,实为东西方两种文明的一次大碰撞。中华民族如一羽浴火凤凰,在碰撞的烈焰中涅槃、升华,终获新生。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工业文明打败了东方农耕文明。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进行西化。此后,中国出现的维新变法、洋务运动、模仿洋教的太平天国等,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他们皆不懂此时东西方文化的差距所在,也不懂如何学习西方文明的真谛,只是引进一些皮毛而已。

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海外华侨,发现了东方专制体制的没落与腐朽,认识到西方工业文明及民主共和体制的优越性,觉悟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大势所趋。正如孙中山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孙中山组织革命政党,以美国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为榜样,以《独立宣言》与《人权宣言》等为思想武器,提出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实现民主共和,振兴中华的政治主张。先后发动十余次武装起义,历尽艰险,不畏牺牲,终于在1911年起义成功。一举推翻千年专制王朝体制,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纪元。辛亥革命不仅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迈向现代化的一次飞跃,而且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重大转折。它使古老而又逐渐暗淡的东方文化,再次得到复兴与光大,能同西方文化比翼双飞。从而使人类社会,可从东西方文化融合中,创新出一条能克服危机的新路径。

因此,从人类发展进程高度来看,辛亥革命,是继17世纪英国大革命,18世纪美国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19世纪欧洲大革命后,20世纪人类最有影响的一次中国大革命。其影响力远超过俄国十月革命,因后者又夭折了,而辛亥革命仍在

二、孙中山是贯通东西文化第一人

解读辛亥革命,离不开孙中山,因他是中国大革命的缔造者与导师。孙中山所以成为20世纪世界级伟人,就因他是贯通东西方文化第一人。

杨昌济在评论其女婿毛泽东时说:“农家多出异才”。孙中山是个真正出身于贫苦佃农家的异才,且其故乡紧邻港澳,为当时东西方文化的“结合部”。他幼时边劳作边读私塾,熟背传统经典后,就进入教会学校,后又随兄赴檀香山读中学,并受基督教洗礼,使他的英语具有“童子功”。中学结业后,又读了5年医学院,并获硕士学位。这使他由信仰基督教,转为信仰科学。

孙中山的这一学历,使他除中文外还精通英文,浏览各类英文典籍,还用英文写书出版。他曾在马克思常去的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中,度过半年,终日博览群书。中国近代革命家,或不懂外文,或精通文史不懂数理化,惟孙中山掌握中西语言又兼通文理。这便使他能超越其他革命领导人。他常年旅居港澳及欧、美、日,一生中在海外的时间多于国内,故对西方文化的掌握,是第一手并亲自体验实践的原汁原味,而非经他人咀嚼过的二手货。他的理科基础,更使他懂得西方文化中的科技精髓。作为职业革命家,竟能如此熟悉中国地质、地理,在《建国方略》等著作中,为新中国的交通、铁路、港口等,提出那样具体的科学规划,实无二人。

因此,孙中山学贯东西,兼通文理,纵晓古今。他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王道”等普世观念,同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法治、科学等普世精神,进行融合,而创造出三民主义学说。

他不仅包容兼通东西方文化，还能与时俱进。当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他又吸纳部分马克思主义，称自己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但他又不是盲目全部照搬，而有所取舍，如对阶级斗争与高度集权制专政等就有所保留。孙中山曾到欧洲找到第二国际的领导面谈，后来又接受第三国际的援助。但他却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不使中国革命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听从莫斯科与斯大林的指挥。过去曾把这些看成是孙中山的阶级局限性、革命不彻底性。如今看来，这正是他的先见之明与伟大之处！

孙中山作为一个革命领袖，面对如此复杂的历史环境，残酷的斗争现实，却依然保持表里如一、坚守诚信、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道德操守与人格魅力。

他一生中不仅受尽清政府的迫害、追杀，受尽袁世凯等军阀的欺骗，还多次受到同志的误解、反对甚至背叛。但他宽宏大量，仍以平等、诚信、博爱待人，从不搞宫廷权术、计谋手腕，来借故整人报复、打击异己。虽然出于组织严密的需要，他曾接受助手的意见，要求入党时向他个人宣誓效忠，服从他的领导。但孙中山对君主专制深恶痛绝，一生中从未搞过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也厌恶别人喊他万岁，真正把自己作为人民公仆，且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当袁世凯宣称维护共和时，他宁愿辞去临时大总统，只负责去修建 20 万里铁路，而从不计较个人权位。

据说列宁曾指出，孙中山有一种“无人能学的、孩子般的天真。”这也许是他的弱点，但又何尝不是其人品伟大之处呢。历数其后的中国领导人，惟有胡耀邦尚具有这种品性。

孙中山积劳成疾生命短暂，仅活 59 岁，一生中失败远多于成功。许多人常以成败论英雄，故贬低他的历史地位。其实，他虽然也有历史的局限性，并非完人，但他真正是贯通东西文化的第一人，也是最能经受历史档案、资料检验的第一人。有些人随档案解密而失去昔日的光环，他却反而更加令人景仰。他不愧为中国现代化之父。他的思想、学说、品德、人格、作风，皆是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遗产。对于有着强烈“圣人情结”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惟有孙中山才是中国人心中，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神支柱与文化“圣人”。当哪天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时，建议新币能印上孙中山头像及中山陵全景。

三、和平崛起同辛亥革命是一脉相承

辛亥革命十多年后，孙中山又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就同中共的最低纲领相等同、衔接。1940 年毛泽东写成《新民主主义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在、奠基之作。毛泽东把新三民主义，具体等同化为新民主主义，并坚持中共取得政权后，要实行新民主主义作为过渡，几十年不变。这就把中共的革命同辛亥革命一脉相承，成为孙中山事业的真正继承者。

可惜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放弃了自己的正确思想，也搞起“毕其功于一役”的“左”倾路线，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急于向社会主义“穷过渡”。结果饿死那么多人，最终更走上“文革”的绝路。

邓小平这位 16 岁就去法国的留学生，从小较能贯通东西方文化。他的“拨乱反正”就是拨毛泽东的“左”乱，反原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之正。只是将新民主主义社会换个名字，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反正”就将中国革命又返回至辛亥革命的主航道了。因而仅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就使中国发生孙中山所预言的“大跃进”了。

且看今日之中国，真的开始和平崛起、“振兴中华”了。令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此足以告慰孙中山在天之灵。当下中国，虽仍未完全统一，但实处目前“一国两释”下的海峡两岸，皆宣称自己是辛亥革命的继承者，是孙中山的传人。

其实，从百年历史的宏观视角来看，国共两党正是在争夺继承辛亥革命的主导权上，出现左右分歧，直至分裂。可谓当年在山下，面向左右而背离分手，但今后，定将在中国现代化的山顶上，再次相逢握手言和。

四、中华民族的第四次文化复兴

关于中华五千年文明传承，笔者最近曾提出，中国经历过三次文化复兴，如今正处第四次

复兴中。第一次是西周后的春秋战国 500 年,出现诸子百家的文化繁荣,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为秦汉的 440 年,提供发展动力。第二次为六朝时代的 360 年,出现文学艺术宗教的文化繁荣,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基础,使隋唐 380 年,出现兴盛。第三次为 320 年的两宋时期,出现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全面繁荣,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全面基础,供元明清沿用 630 年。

第四次文化复兴,就起于辛亥革命,目前仍在继续中。这次文化复兴重点是全面学习西方,进行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自两宋成为世界领先国家后,其后之 600 多年中,西方在文艺复兴推动下,逐步发展成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中国却止步不前,闭关锁国,除人口膨胀外,经济、文化皆停留于宋代水平。且“文字狱”横行,万马齐喑。辛亥革命一举推翻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其后虽由北洋军阀篡夺革命成果,武夫当国,但其统治十分薄弱。17 年中更换 13 位总统等领导人,46 届内阁,如同走马灯,因而对各种新文化无力限制。这就使辛亥革命后的二十多年中,形成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时期,使中华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

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总共只有 45 天。但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在 4000 年的历史中,至今就有过这 45 天的民主”。45 天才一个半月,但孙中山在这一个半月,通过《临时约法》共 7 章 56 条,就把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雏形勾画出来了,奠定了中国现代化宪政政治的基础。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更把这第四次文化复兴推向高潮。各种西方学说,无论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无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主张的政党、团体,各种流派的文学、艺术;各种门类的自然科学、实用技术;各种专业的几十座高等学校;各式各样的大师、巨匠、学术领头人、教育家、艺术家;各种倾向的 500 多家报刊;各种宗教信仰;各种时尚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等等。五洋杂汇,争奇斗艳,繁星纷呈,造成中国文化的空前大发展、大繁荣。致使上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文艺,竟能在世界当代文艺史中,拥有一席之地。

直到目前,我们在思想、文艺、教育、科技等方面的进展,无一不是那时打下的基础。无奈这场规模浩大的文化复兴运动,被日本侵华战争、内战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左”倾错误等所打乱,甚至出现“文革”的大倒退。但这一文化复兴的薪火,从未熄灭过。当实行改革开放后,文化复兴的大潮必然将会再次掀起。所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指这始于辛亥革命的第四次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华民族将在这次前后约 200 年的文化复兴中,完成工业化与知识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的知识经济时代。从而使东方文化在被西方文化唤醒复兴后,也能反哺西方文化,使东西方文化由碰撞,而产生融合,并再综合创新。从而迈向孙中山所理想的大同世界,即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这正是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所在。

100 年过去了,邓小平预见还要再努力 100 年。那时的中国与人类,定已跨入知识经济时代。智慧绝顶的后代们,定能克服人类自身的许多愚昧与弱点,制服人类自相残杀的战争怪物。实现马克思让一切人皆能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理想,也实现孙中山自由、平等、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

(作者为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原民建中央副主席)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最早与苏军会师的中国军队》内容补充

我是《最早与苏军会师的中国军队》一文的作者,该文经平北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传阅,提出两点修改意见:一是攻打并解放张家口,并非平北一支部队,还应包括冀察军区所属第 13 军分区 20 团和蔚涿支队,为此我们根据《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的提法做了补充(注 2011 年第 8 期第 35 页左栏倒数第 5 行“直到哈尔滨。”后面):“第 13 军分区 20 团和蔚涿支队原拟从南面、西面协同作战,不料山洪暴发,洋河水位骤涨,深可没顶,未能及时投入战斗,直到 23 日拂晓,方由南面攻入市区,协同 10 团、40 团肃清残敌。”二是对北平这一战略要地,美蒋从 1944 年初开始亦加以关注,为此需要加一句话(第 39 页右栏第 14 行“缴械投降。”后面):“对于这一战略要地,1944 年春,李宗仁曾建议蒋介石‘隔离中共和苏联陆地交通和直接接触’。雅尔塔会议后,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向蒋介石建议,派傅作义由五原东进建立所谓‘绥察热防共隔离带’”。

段沫恒

2010 年 7 月 22 日

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

○ 刘泽华

我入党的时间不算是长的,但算起来也接近60年了。“文革”以前我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把领袖视为神明,我写过两首打油诗来说自己。

一首是“走神”:

信到迷信不知悟,朝三暮四全维护。

睁着大眼一走神,多情反被多情误。

一首是“听喝”:

衣食住行听安排,找个对象领导裁。

是非全赖上头论,只有屎尿自己来。

这不是调侃、嘲讽,是自己的真实写照。“文革”促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大的转变,我在过去多篇文章说过,我逐渐抛却了“神明”,而萌生出“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理念。诸位一看就知道,这是从“上帝在我心中”套过来的。尽管马克思本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时至今日,他提供的学说仍然是诸多学说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至少使我的心境能获得安稳。我是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由是我得出两点自箴:一是“史家面前无定论”,一是“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历史的一切都是认识对象,都要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在证据面前人人都有发言权,也都应服从证据。

就我而言,观念的转变很复杂、漫长,也很曲折,至今还有诸多理不清的心绪。所以“在我心中”绝对不如“听喝”省心。

大致说,到了“文革”后期我就不再“跟”了,而且在思想上开始进行批判,但也仅仅是写在日记里。我拥护周、邓,矛头所向也很清楚,如果当时日记落入专政者手中,我可能会毙命。现在大概也难有刊物能刊出。那时我内心极端苦闷,只有靠日记来诉说,我从周总理逝世那天起写日记,文中引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如果他不能讲话,那就行动。如果不能行动,那就宁肯一言不发。”(这是日记中写的,没有核对原文)我很怯

懦,采取的是后者。

下边写的几个镜头只是一个侧面。

一、我在“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面前

“文革”期间,四个“伟大”喊的震天响,我不敢有什么异议。不过对陶铸说的,太阳里也有黑点,私下里认为是很有道理的。对林彪说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一类的话,我想不需要“上智”,都能感觉出拍马屁的味道,但那时是绝对不能提出异议的。老百姓天天要唱一首歌,其中一句就是:“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她,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在那种情况下,人们仅有的一点才智已经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曲直,而是用来如何保护自己,免遭不虞之祸。我虽然对林彪的话感到不顺耳,可我绝对不敢去触犯,更谈不上公开反对。自我解释,这是政治家们的语言和政治需要。

“文革”把毛泽东推到了顶峰,但到了顶峰也就该出问题了,这是无法逃脱的规律,而辩证法又指明了人们分析这种现象的路径。过去的很多错事,上下一致的打、吓、瞒、哄、骗,还真的有效果,比如大饥荒饿死那么多人,竟然不了了之,三面红旗依然高高飘扬,彭大将军依然被视为大逆不道。造反派反这个反那个,看来毫无禁忌,但竟然没有一个造反派为彭大将军伸冤,相反倒是最革命的造反派充当了置彭德怀于死地的打手。文革中的老老少少都是吃过三面红旗苦头的人,可是竟然都还高举着它,横扫天下,凡是对三面红旗发疑或批评的人都再遭洗劫。远的不说,南开大学经济系一位青年教师徐振芳(现年八十、健在)同志当时从理论上论述了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再认识,批评了“公社化”,全国大饥荒与饿死人等,并致信中央,要党主席毛泽东检查,谢罪天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集会的场面

下。这一下子惹了大锅，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革”一来再重新算账，被整得死去活来。由此可知当时对毛泽东是不能分析的，对毛泽东思想除了无限崇拜外，更不能提出任何疑问。

可是“文革”中乱七八糟的事就摆在人们的眼前，让人们开始怀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正确论。既然辩证法告诉人们，无论什么都是可以分析的，毛泽东也一再讲，一分为二是普遍规律，1964年他同日本物理学家谈话时，讲一分为二是无限的，他很肯定庄子说的话：“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当把毛泽东思想推到极限的时候，也就是人们开始生疑的时候。于是人们发出疑问：“毛泽东思想能一分为二吗？”我想当时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心中是有数的，但聪明人没有敢说的，只有不要命的“冒失鬼”才敢较真。大约是在1968年，我的一位学生竟公开放言：“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他的名字叫刘培庚，东北丹东人，根红苗正，又是中共预备党员。此言一出，立刻乌云压身，大会批，小会斗，停止他的工作（工宣队进校，他在机关报《工农战报》当编辑），停止党员登记。周围没有人敢与他交往，往日的朋友最多道路以目，孤独、苦闷、憋气，几乎要发疯！

他在苦恼之极时来找我，问我在哲学上他的观点是否有问题？这一问立刻让我胆战心惊，面对我的学生，该怎么办呢？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无论从哲学上或事实上说，我心里是赞成他的观点的，可我不敢给予公开的支持，面对自己的学生，又不能讲官话，也不能说太违心的话，但也不敢说真话！再三思索之后，我做了这样的回答：一分为二既然是普遍的规律，适用于任何现

象，从哲学观点上说没有错，可我就是不点明“毛泽东思想也应一分为二”这句话。我虽然很相信这位学生，但那时的“逼供信”整死了不少人，也逼得不少人神经错乱，瞎咬一通，我不能不有所戒备，所以我只说哲学道理，绝不说这几个字。接下来我对他说，在目前形势下说这种话不适宜，会让人抓住把柄。他问我怎么办？我再三掂量后，建议他不要在理论上纠缠，只说受了怀疑思潮的影响，没有深思，政治上幼稚，对别人的批判不要顶，态度要温顺。你是学生，又不是头头，没有任何职务，也没有干过任何出圈的事，估计批一通也就完了，不至于戴什么帽子。我又叮嘱他，千万不要往下说一分为二的具体内容，不管怎么压和诱导，都不要说，一破口，就无法收拾。刘培庚真的照此应对，折腾了一段时间，他毕竟是个青年学生，放了他一把。最后还是给了一碗饭吃，发配到偏远的农村当了一名中学教师。

二十年过去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突然一天刘培庚来到我家。他带给我一件礼物，是岫山玉雕的喜鹊登梅。我说，你来看我非常高兴，但我有自己的规矩，不能收你这个玉雕！他说，给我平反了，现任某党校的教育长，总算是个喜事吧！二十年来，我一直念念不忘老师的恩情，我这点心意，老师不能不收吧！他还说，那件事情之后，成了瘟神。离开学校时没有一个人来送行，只有老师您到车站来送我，并鼓励我要坚强。车开动了，您还久久伫立在车站目送我，我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回想起来，我很惭愧，与其说我伸出了同情之手，不如说我怯懦、圆滑和世故。

“文革”后承认了毛泽东的诸多错误，在思想理论上也有不少纠正，但“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依然不能作为一个严肃的理论命题和历史问题让人思考。某些人依然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还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的结晶”云云，以此禁止这个问题的深入展开。“集体的结晶”与“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两者是两个不同的命题，“集体的结晶”另论，但无论如何不能遮盖后一个命题。把毛泽东诸多错误言行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天下有比这更滑稽的吗？

对毛泽东思想要不要“一分为二”？这是一个极大的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关系着中国历史、

当下与未来的命运。毛泽东思想有过辉煌的时期,1949年之前确实指引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大史学范围(世界范围内史学)看,不管人们的评价有多大分歧,但作为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但1949年以后,他违背了自己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与实践,以他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绝对权威,硬要实行他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并以极端的阶级斗争作为基本手段,一步一步走到“文革”这种荒谬的时期,把整个中国搞乱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实践与理论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着“一分为二”,但仍没有提到应有高度来认识,在许多时候这个命题尚没有获得“合法性”和“正当性”。我是一个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人,且主要是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我的重点尽管不是近现代史,但每每也有涉及。我深深感到远没有尊重“一分为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有时仍以“毛泽东思想”为神圣,拒绝、阻止进行“一分为二”性的研究,或“垄断”再认识的权力。

从历史学的角度说,没有神圣不可再认识的东西。我应该把“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作为理论命题和历史命题来看待,在认识对象面前人人有平等的认识权力。人们如何“一分为二”,肯定会有很大的差别,但必须尊重“毛泽东思想应一分为二”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只要言之有据,就有合法存在的理由。不管何种见解,都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来,在证据面前,人人平等。

如果有些人不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理论和历史事实,仅仅视为“信仰”,那就是“宗教”性的问题了,这与科学性的认识是另一回事,正像有些人信佛祖、上帝一样,是宗教信仰问题,不必与这些人争议。但现代社会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宗教不能干预政治与他人的社会生活。如果还坚持政教合一,那显然是前现代社会里的事,如果硬要坚持,不妨请他们去某个地方建立太阳城,进行试验好了。但不要强迫他人与自己一样也必须“信仰”,更不应企图借助行政力量实施什么强压。

我对毛泽东思想信仰过,而且信到迷信的程度,具有很强的“宗教性”。我入党已近一个甲子年,总的来说,也还是个积极的党员。在巨大事实面前,我的观念逐渐发生了转变,这就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理论和历史问题来看待,也认定

“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是个合理、合法的命题。

二、《矛盾论》有抄袭之嫌

1970年秋,我们逐渐听到如日中天的陈伯达被揪出来,说他是“假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骗子”。我一方面很震惊,不知此论从何说起?另一方面,我对陈也没有好感,揪出来感到很痛快。但疑问也发生了,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理论与行为如何看待?我无法得到解答。1971年夏,学校革委会宣传部门组织了几个人来清理陈伯达的假马克思主义言论。召集人是牛星熙,成员有经济系的郭士浩、哲学系的封毓昌,还有我,共四人。当时很神秘,对外保密。图书馆拨给我们一间房子,任何人不得进入。我们直接到书库提书和杂志、报纸。时值酷夏,不能开门对流,热得要死。给我们的任务是整理陈的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但上哪里去找呢?我记不清是上边的指示,还是我们自己拟出的原则,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不能有损毛主席的和林副主席(我们当时还不知道整陈的背后是整林副主席)。只要是毛主席批准的文章或肯定过的,不能列出来,不能从中找问题;第二、不能损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路线,陈的有关文章与讲话,凡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不能批。第三、陈过去的著作很多,凡属中央领导人肯定过的,或代表中央的文字不能轻易动,如《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等。有了这三条,我们实在难发现有什么“假”和“反”的问题。我们四位彼此虽然都认识,但互相之间并没有深交,谁也不敢多嘴,很怕踩了“红线”,更怕人说借批陈指向“文革”,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于是把清理重点放在陈的早期著作。我们对陈的历史了解的很少,又没有适当的索引,只知道他30年代在北京、天津教过书,搞过“新启蒙”,写过一些文章,但哪些是他的,我们并不清楚,特别是以笔名发表的,更是一无所知。只好“广撒网”,把一些可疑的书刊尽量找来审查。其中有一本《社会学大纲》,没有署名,但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是“河北商专”的教材,石印本,大约是上世纪30年代初印刷。陈伯达在那个时期活动于京津一带,于是怀疑是他的著作。此书由封毓昌查阅。这

本书中主要论述唯物论与辩证法,在论述“矛盾”问题上,封毓昌发现与毛泽东的《矛盾论》多有雷同之处。他不敢声张,悄悄地让我看,果如他所言,在论述矛盾的普遍性、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观点上,有些语句几乎相同。我们两人窃窃商议,是否告诉另外二人,我建议要告诉,我们是一个集体,不说反而易引起麻烦。封毓昌同意了,于是请牛星熙和郭士浩也看了。四个人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不愿首先把问题挑开。牛星熙是召集人,四人商定了两条:一是不扩散;二是把书封存。我当时冒出一个念头,伟大的领袖的“顶峰性”的著作原来也有抄袭?!

到70年代末,我多次建议封毓昌同志把这件事弄清楚,封毓昌下了一些功夫,找到了《社会学大纲》的作者是杨秀峰。杨秀峰是当年的教授,已是共产党员,1949年后任过河北省省长、教育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文革”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封毓昌给杨秀峰去信询问。杨请他的秘书给封毓昌回了信,证实了该书的作者就是杨秀峰。但同时转述了杨的意见,此事不要提了,《大纲》中的论述也不是他的创见,是从苏联学者转述过来的。后来我多次请封毓昌从学术史的角度把事情写出来,他总说等等、等等,等到现在,他和我都老了!他比我聋得更厉害,几乎全失聪。我写字条让他把事情公布出来,他写字条回应:《社会学大纲》图书馆找不到了,不知去向,无法核对。又说,老了,不找麻烦了。

因是封毓昌首先发现的,我也不好插手。不知还有人关注此事否?

三、“社会主义不够,资本主义补”

从我加入共产党始,就立志消灭剥削、消灭资本主义。在我的观念中,是容不得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一直在地下流动,大饥荒时期在政策上也曾一度允许“三自一包”和农村的集市贸易,但随着1963年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三自一包”被取消,集市贸易又被禁止。“文革”中强行割资本主义尾巴,自发的资本主义活动都转入地下,称为“黑市场”。我一直保持着“纯洁”的态度,不与任何“黑市场”发生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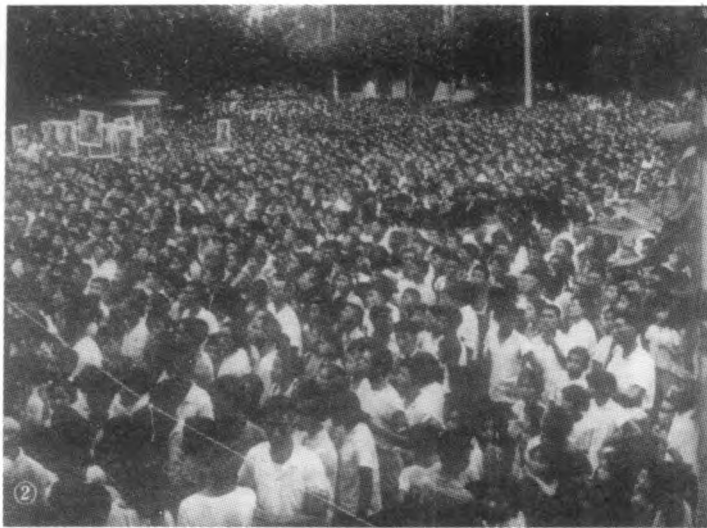
1967年2月22日,江青鼓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进行造反

1973年,我带领一个级的学生“拉练”(模仿军队长途行军),横穿河北,从完县经保定、白洋淀地区到天津。沿途我们看到自发的资本主义很活跃,我与农民闲聊,我问,不是有政策不允许这类的活动吗?农民悉数了他们的公社的苦楚,有一位农民说了一句话:“社会主义不够,资本主义补!”

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的思绪,启开了我的再思,把我多年来积累的疑问提到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是啊,为什么“社会主义不够?”为什么要由“资本主义补?”

“不够”,这是中国的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于是有理想,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曾承诺解决“不够”的难题,也是我追随的目的。但自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不够”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公社化竟然饿死数千万人。“三自一包”救了数亿人的生命,转眼又成“罪恶”,“文革”发展到极致。当我听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说法时,我仅仅感到把“草”和“苗”对立起来,冠上社会性质,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荒唐。记得当时还有过一篇报道农村革命人物事迹的文章,引用一句俚语“花钱买笼屉,不蒸馒头,蒸(争)口气”,把资本主义尾巴说成是“馒头”,把坚持社会主义说成“气”,我一听也很反感,怎么如此不伦不类的乱比喻?不要“馒头”,靠“气”就能充饥?我看到了农民与市民们对自发资本主义的欢迎和参与,但我没有“资本主义补”的观念和意识。

对于社会主义的“不够”,我们这把年纪的普通人都深有体验。也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一



“文革”中群众集会的场面

次路过保定,去了一家饭馆吃饭。饭刚上来,就有一群乞食者伸过手来,同时出示盖着村政府红印的出身证明,都是贫下中农。我问这是怎么回事?答曰:我们没有吃的,但地主富农不能出来乞讨,那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我感到万分惊讶,天呀,乞讨都要凭成分,是“社会主义”支柱者的特权!?

“不够”原因在哪里?我们多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目睹了各式各样的“出工不出力”、“龙多不治水”等等现象,也调查过农民的工分值低得可怜,一个工不值一张邮票(八分),还有的年终分不到红还需倒补,对此我仅仅与农村干部们水平和违法乱纪挂钩,从来没有与“社会主义”的“问题”连在一起,农民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够”源于“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

农民的这句话,使我想到了古人说的一句话:“公作则迟,私作则速”。迟、速就是效率问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人就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为什么我们还要硬搞“公作”?农民为什么对“三自一包”那么钟爱?我们为什么不顺从农民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而一定要改造?这些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年,但有一点我逐渐走向清晰,当时通行的那种“社会主义”是造成“不够”的根源,反过来能“补”“不够”的“资本主义”未必不是一条路:多年来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看成罪根,为什么不把它看成历史过程中的自然与必然?为什么说是“黑市”,“黑”字是谁给加上的?一个“黑”字就能堵住历史的必然?

农民的这句话对我是又一次大启蒙,此前的

启蒙是那个“工程纪要”。“纪要”的启蒙是政治和政策;农民这句话的启蒙是社会道路问题,更深刻啊!

四、他领错了路

从1949起到“文革”,我高呼“毛主席万岁”是真心实意,自觉的。“毛主席”在我心中几乎是真理的化身,是一尊神。

在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对毛虽然也萌生了一点点怀疑,比如反右倾、反彭德怀,心里认为是搞错了,但看到他致基层干部的一封信(纠正左的错误),便又改变了怀疑,认为主要错在下边的瞎指挥。南开经济

系的一位教师上书党中央,对毛提出尖锐的批评,要他下“罪己诏”,我听说后一方面佩服他的勇气,另一方面看到他被肃整,大会批、小会斗,被戴上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也十分惧怕,庆幸自己当时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也说了一点,比如说过生产关系走在了生产力的前头之类的话)。但随着经济形势逐渐见好,又恢复了往日的崇拜。凡属毛主席的指示,我基本不敢有任何怀疑的地方。有一些不理解,但也不敢正面提出疑问。比如他的1964年春节关于教育改革问题讲话,我就认为过于极端化,如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可以抄书,考60分就行等等,我在实践上是不执行的。

从“文革”中后期开始,逐渐萌生怀疑、不满,甚至有些痛恨。1976年9月上旬,我带着小女儿回老家看望年迈的母亲。我听到发布毛去世讣告,从内心感到是一种解脱。我倒不是对个人生命的无情,实在感到他的特殊地位已经是中国的负担和灾难。我们的体制是把整个民族的命运系在了他的脖子上,除了生命的结束,无法摆脱个人的控制,这是多么可怕的体制呀!现在一些人还孜孜不倦地歌颂他弥留之际醒来的一瞬间还如何如何发号施令,指挥天下。作为个人生命的顽强另作别论,但这种体制难道值得称颂吗?

治丧期间的一天,我到妻姐家。说到毛的逝世时,妻姐含着泪花反复地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妻姐的丈夫是老清华的毕业生,数学教授。妻姐是一位一心扑在小学教育上的模范教师,后来

被评为特级教师,还成为代表人物当上某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为了给他们悲切的气氛一个冲击,我说:不要悲伤,死了好,早就该死!他们立即发出惊恐的嘘声!同时以爱切的口气说我:你千万不要到外边说,这要被打成反革命的,这要给家庭惹祸的!我说我知道,只能在你家说,你们不会去检举我。我简要叙述了对毛的看法,如果他1957年去世,他会成为一个完人。后来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已经成为历史的包袱。这个包袱早该去掉!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们即刻接受了我的看法,特别是几位内侄子反应尤其强烈。实际上,当时有我那种看法的何止千万,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

这不是我一时的激动,而是长时间逐渐形成的看法,下边把1976年日记中的一些话抄录几段:

1·10:

悲痛之余都在耽心,有些人要抢权。请看最近的所谓批判文章是如此的不讲道理,如此的霸道,如此说瞎话,如此上纲,很明显,是以夺权为目标的,无非是舆论上烧火,封住群众的嘴,上头各个击破的故伎再演。权可能到手,人心会再丢掉一大批。“百年”之后,鹿死谁手,未必能由一人说了就能管一万年!

所谓“打招呼”,我看是夺权全局的第一步,下一步棋如何走,从这里左右都可以抓人:有错误,不能接班;不承认错误,顽固不化,更不能接班,稍有不逊之意,以对抗为名又可以开刀。这三条路,三个圈套让你挑,让你选,何其毒也,这是共产党吗?

总理的后事会怎样,谁来接替这一职务,这对中国的今后若干年的历史将会有重大的影响。如果落在他们手中,我相信只要他仍照目前的这一套作下去,总会有一天清算他们的,那时甚至会来一个总的清算。这些年的内幕,一桩桩使人无法理解的疑案、疑事,斯时会亮出来的。

1·13

革命需要权威,权威应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

权威不是手中有刀,而是有真理,有人心所向。

权威不是给人以幻想和乌托邦,而是理想同

现实的结合,引导人一步步走向理想实现的世界。

权威有着个人的因素,但权威是在千百万人民牺牲的基础上树立起来,一旦把权威变成私有物,它就是另一种性质的东西了。

权威适应着人民的需要,人民乐意听从权威,当它不再为人民带来利益时,它就只能是最有权力而无威信了。

权威应建立在革命的基础上,而不应成为个人的专断,不应成为私产。

面对着现实的一切,令人沮丧,也许没有权威才能使矛盾爆发,才能解决。

权威是在变的,应是时代的要求!谁能真正解决实际的矛盾,满足人民的需求,谁就是权威!

1·22

人老了,不出屋,不见人,真理从那里来。整日批先验论,可先验论已达到顶峰造极的程度,哪里还有党的集体领导,圈阅就是最大的权威,笑话!谁圈阅的?君不见祖龙时赵高左右一切吗?人死之后,宦者还藏在车子里冒充祖龙曰:“可”。他已不是龙,而是一条“虫”了。祖龙后几年的事贻笑千古,遗臭万年,这个教训难道不值得回味吗?

2·7

哪里还有什么党的组织和领导原则,党已成为手中的弄物和工具,成了私产。

历史上多少杰出人物,一旦身居禁中,不理群臣,一下子变成小人物手中的工具,宦官的弄物。伟大受制与渺小,最后落个惨局!可怕的历史场面真的出现在眼前吗?

2·26

将来的历史能否证明:让邓出马正是为了五马分尸。人家的预谋就是让他当垫背的角色,如在羿之彀中,处于必死之地。

老谋深算已不是用于打敌人,而是用于耍阴谋。

目前我们的党已是一家的祠堂。会永远如此吗?

夫人迭次出场,似乎表明又处于执牛耳之地。

中国未来会是怎样?

3·3

问题在于真理不是由实践证明(下转49页)

苏联“八一九”事变目击记

○ 张锡恩

1991年8月19日至9月2日,我作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当时的工作单位)访苏团组的一员(团组共5人),途经莫斯科访问了苏联的鞑靼尔斯坦自治共和国科学院和该共和国巴尔达辛区苏共委员会,历时15天。作为“8·19”事变的见证人和目击者,通过现场和新闻媒介,所见所闻甚多;同时通过同苏联社会基层和接待人员的接触,了解了某些苏联人对此事变比较有代表性的反映。我是这次学术访问的材料记录员,回来后即写下这篇《目击记》。由于当时的条件,本文未能发表。今年是“8·19”事变20周年,以这个难得的记录作为纪念,或许仍有意义。保留第一手材料的生动性和历史感,本文稿只对原稿做了个别文字的订正。

一、访问过程

8月19日下午2点,我们在北京首都机场办理出境手续,准备乘4点20分的909航班赴莫斯科。此时得知中央军委刘华清同志将率军事代表团与我们同机访苏,且也与我们同时办理有关手续。登机前约20分钟,在接近登机口的地方,一位在机场工作的山东老乡悄悄告诉我们:刚刚得知,戈尔巴乔夫于今日凌晨4点(北京夏令时上午10点)下台了。消息突然,我们当时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登机后,飞机迟迟不起飞,说是在等几个重要客人。实际情况是,军事代表团也是这时才得知戈尔巴乔夫下台的消息,是否仍按计划访苏正在做新的决定。结果是军事代表团未登机,而飞机则因此迟于5点才起飞。

飞机在当日莫斯科时间下午7点2分(北京夏令时次日1点2分)在莫斯科西郊国际机场降落,我们办完入境手续和提取行李后,约8点出

机场,苏联科学院远东所研究员比留林、阿列克谢和鞑靼尔斯坦自治共和国的波波夫迎接我们。刚一上汽车,几位东道主即告知我们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台,现在军队已经开进莫斯科,各要道口都部署了坦克。我们在急速行驶的汽车上,借着路灯也不时可以看到在公路岔道口有不少坦克守卫。我们住进莫斯科十月广场附近的科学院宾馆后,比留林、阿列克谢、波波夫先生拿出预先准备的一根圆火腿和一瓶白酒,算是给我们接风。晚饭间,比留林只是谨慎地叙述眼前发生的事变而未作评论,波波夫则毫不隐讳地表明反对这次事变。他说:“两天后说不定戈尔巴乔夫又回来了!”(很快证明,这句话言中了!)比留林说:“这只是你的想法!”

8月20日上午7点,我们团组一行乘111路无轨去红场,电车提前两站停车,因为前面的路口被封锁了。我们徒步去红场,见到莫斯科河大桥的两头每个角上都有数辆坦克守卫,通往红场的几条大街全被坦克车横队堵塞,红场已被封锁,不能进入,不时可见装甲运兵车往来,路边墙上有刚刚刷上的大标语:“我们想见第一总统!”下午2点,我们乘地铁去中国驻苏大使馆,看看使馆有什么指示,希望在使馆的指导下开展工作。我们刚刚走进使馆教育处大楼,即见楼厅内墙上赫然贴着一张告示:“鉴于政治局势紧张,使馆人员一般不要外出,外出的要随身携带护照,晚间外出的要尽早回馆。”使馆人员告知我们,现在形势紧张,希望你们谨慎行事。返回住所途中,在街道上看到各种贴在墙上的小报、传单,其中一份是叶利钦签名的声明,号召进行总罢工,反对“8人委员会(紧急状态委员会)”。下午约5点,我们乘波波夫安排的汽车准备赴火车站,乘8点20分的火车去鞑靼尔斯坦自治共和国的首

府喀山。由于时间尚早,我们乘汽车浏览莫斯科市容市貌,见到几处停放坦克的地方,均有大批群众围观、议论,有的坦克上还插上了各色旗子,其中有俄罗斯、乌克兰国旗等。在坦克准备前进的道路上,有群众用重型卡车、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混凝土器件、汽油桶、原来安置在路边林荫处供游人休息用的大连椅和各种家具设置的路障。我们从汽车窗口,遥见俄罗斯国会大厦(即所谓白楼或“白宫”)的周围,聚集了数万群众,大楼前面的台阶上堆满了障碍物。听波波夫和司机说,群众在这里集会已经3个多小时了(到下午6点30分时),那些路障、群众集会都是保卫叶利钦的。

8月21日上午9点,我们在波波夫陪同下到达喀山,鞑靼尔斯坦自治共和国党中央办公室的塞辅洛维奇、巴尔达辛区的沙基耶夫迎接我们,住共和国招待所。这里是列宁的故乡,也是列宁青少年学习的地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的重要工业基地。当时政治事变还未影响到基层,这里工作正常,开始阶段的学术访问、参观基本上正常,并且有时有警车开路,行程格外顺利。但到26日早晨,我们商谈调整访问计划时,突然发现当地的党政机关已经运转艰难,戈尔巴乔夫关于解散苏共中央、没收苏共财产的命令已波及这里,当地党组织已经瘫痪,计划访问的巴尔辛区区委书记沙基洛夫已无法接待我们,甚至无法和他取得联系,正式的访问计划到此即告中断。26日我们回到喀山时,只能吃自带的北京方便面,不仅自治共和国党的机关被封闭,我们原来乘坐的汽车亦被查封,因为它属于党的财产。从27日开起,我们旅行只能徒步或乘公共汽车,这与几天前的“警车开路”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们团组成员对此不无幽默地说:“我们成为没有党的第一批受害者!”

在我们滞留喀山期间,每天都能看到有或多数或少的群众聚集在共和国政府大楼前的广场,他们用喇叭发表演说。这时广场及其周围建筑物警卫森严,到处都有带着警棍和无线报话机的警察巡视,广场四周的每个路口都有大型警车待命,里面坐满了穿制服或便衣的警察。我们亲眼看见一个约50岁的男人被两个警察架上一辆警车带走了。28日,鞑靼尔斯坦自治共和国非例行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共和国政府大楼前广场上集会

的代表和群众情绪激愤,高举标语牌,高呼“共和国自由”、“共和国独立”等口号,即要求从俄罗斯属下的自治共和国独立为与俄罗斯平行的加盟共和国。他们有一个思想:“我们资源丰富,交给了俄罗斯,但我们生活不好,所以需要改革”,而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独立为加盟共和国。29日,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赶到喀山(我们目睹了他的警车队伍),反对鞑靼尔斯坦自治共和国独立,同时想干预代表大会,把曾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该共和国总统赶下台。但干预没有成功,代表大会仍选举高举“共和国独立”旗帜的原总统为总统。

29日晚,我们比原定计划提前一天离开喀山,于30日上午回到莫斯科。从30日下午至9月2日下午登机回国前的3天时间里,我们基本上是在塞辅洛维奇的陪同下自己到饭店吃饭、自己到街上活动。我们先后参观了红场、克里姆林宫、列宁博物馆,到列宁墓瞻仰了列宁遗容。列宁遗体保存完好,历经近70年仍皮肤光润,像熟睡的安详的活人。由于盛传列宁遗体可能被移走,去列宁墓的人格外多,不仅有大批的外国游客,且有大批的莫斯科人。我们看到了被封闭的克格勃大楼、苏共中央办公大楼,并在苏共中央办公大楼被封闭的铁栅栏前照了相。在行人较多的街道路口,有的墙上张贴了许多照片,展示了不久前的街垒、路障、坦克、群众集会,等等。

在整个访问期间,我们时刻关注着苏联政局的发展。每天的第一位任务是购买报纸,有空即看电视,了解有关事变情况的报道;有什么问题就问苏联陪同,苏联陪同人员对我们很友好,也很热情,每听到什么消息就及时转告我们,并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苏联熟人之间见面时也是彼此互告有关消息,加上我们直接看到的群众集会、演讲、军事行动、标语、小报、传单等情况,在当时比较混乱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了解到政治事变的大体情况。

二、政治事变情况

事变是8月19日凌晨4点对外公布的。当时戈尔巴乔夫在克里木半岛的夫拉斯(又译福罗斯)疗养地修养,被克格勃软禁了,他的30人的

卫队同样被软禁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均被切断。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成立，由8人组成（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巴甫洛夫、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组成，本文中有时简称“8人委”），委员会公布了一系列命令。其中主要的有：（1）副总统令，8月18日签署；（2）副总统亚纳耶夫等3人签署的《苏维埃领导声明》；（3）《告苏联人民书》；（4）《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第一号令》等。这些命令和文件的主要内容是：（1）鉴于总统健康状况，已不能执行总统权力，总统权力移交副总统；（2）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入困境，物价飞涨，人民不满，国家处于政治、经济、民族危机之中，威胁到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公民生命安全，为终止这个改革，挽救国家，所以采取非常行动；（3）宣布从1991年8月19日凌晨4点开始，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4）宣布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法律，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有效性；（5）宣布国家的一切权力归“8人委员会”；（6）宣布只保留6家报纸，其他均封闭，新闻单位不经批准，不得发表消息。

据《喀山晚报》驻莫斯科记者报道：8月19日凌晨，有几个穿制服的人从塔斯社的橱窗里把戈尔巴乔夫的像取走了，接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开进了大批军人。记者就副总统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状况不能行使总统权力而被解职一事评论说：“这很容易使人想起1964年和1973年的情况，人们立即想到总统或是被打死了，或是被捕了。”

对于事变的反应是迅速的。从8月19日早晨起，苏联新闻界就没有听从“8人委”的命令，依然继续传播有关国家情况的消息，叶利钦当即发表声明并印成小报、传单散发，称“8人委”是非法的，号召工人进行总罢工；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宣布“8人委”是非法的，接着俄罗斯领导人开始聚集白楼（俄罗斯国会大厦），宣布“8人委”是反宪法的，通过了《告俄罗斯人民书》，号召人民进行还击；再接着即开始出现群众集会。美国总统布什也立即发表声明，说这是一次政变，是反人民、反宪法的，注定失败了一半，称“8人委”的《告苏联人民书》所作的许多许诺，如降低物

价、提高生活水平、消灭犯罪、让人民有更大的责任心等等，都是用减号代替加号，用黑色代替白色；说“8人委”组成人员不是令人喜欢的人物，他们要把民主变成独裁、专制；宣布立即中止对苏联的一切援助；说希望“8人委”要谨慎地使用权力，完成戈尔巴乔夫留下的工作。

“8人委”传统派与叶利钦激进派的斗争是激烈的。据报载，“8人”委派了约500辆坦克清除广场等集会场所，封锁了俄罗斯领导人的出路（当时聚集在白楼），并对叶利钦发出警告。军队向白楼挺进，当日中午那里已聚集了约1万人，阻止军队前进，有几辆坦克曾经从侧面控制过白楼。但总的情况是，执行任务的梁赞空降团和随后到来的两个师没有执行命令。12点10分，叶利钦站在坦克车上宣读了《告俄罗斯人民书》，强调这是一场政变，是反宪法、反人民的，“8人委”的许诺是无法实现的，如农业情况很糟，正是没有改革的结果，物价飞涨，正是政府总理巴甫洛夫宣布提价的，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把民主的苏联拖向独裁和专制。当时的阵势是：一方面是亚纳耶夫命令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命令莫斯科卫戍部队司令加里宁对莫斯科实行宵禁；另一方面是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命令组织民兵，警察、卫队都要武装起来，要把白楼及其附近地区都控制起来。到19日中午，这个保卫白楼的中心力量就组织起来了。18点，紧急状态委员会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问：“现在戈尔巴乔夫在哪里？”亚纳耶夫回答：“在克里木，戈尔巴乔夫早就请求让他休息一段时间，等他身体康复后，还会出来的。”记者问：“你们的许诺靠什么措施来实现？”亚纳耶夫回答：“准备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进行研究。”这种回答显然是转弱无力的，既反映了他们准备不足，也表明他们已经软了下来，认输了。正如后来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所说：“他们在19日当天，就已经知道他们失败了！”

8月20日是冲突最为激烈的一天。早晨，群众集会、声势更大了。有的群众发表演讲：“要原谅、宽恕戈尔巴乔夫（‘8人委’的人员都是他提拔起来的），他是我们的总统。”设在普希金广场的莫斯科新闻社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之一，该新闻社是被封闭的单位之一，被封查的报纸贴到墙

上,用喇叭广播新闻。10点,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总理希拉耶夫传达了叶利钦的最后通牒,要求解散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求与戈尔巴乔夫见面,要求开放报禁。在斯摩棱斯克广场,装甲部队与群众发生冲突,一个人被步枪射中,另一个人被从装甲车上摔下后轧死。在加里宁大街路口,群众拦住了一辆冲来的装甲车,向车上扔汽油瓶,坦克车着火了,坦克车手弃车逃走。有5辆坦克车占领了乌克兰饭店,群众用无轨电车组成路障,向装甲车扔石头,把棍棒塞入装甲车履带。有一个由战士母亲组成的包围圈,打着标语:“士兵们,不要向你们的母亲和姐妹们开枪!”下午,天下起了大雨,成千上万的人拥向白楼,准备迎接“8人委”的进攻。群众还给守卫白楼的人免费送饭送水,同时也给坦克手饭和水。晚上,白楼周围汇集有7万余人,他们手挽手形成人墙,把整个大楼环了起来,在墙上写上“不要让法西斯主义回来”、“我们要把子弹射进普戈的肥肉里去”等标语。晚上有消息传来,说可能放毒气,于是群众又戴上面具。深夜1点,坦克向白楼进攻,冲开了人群防线,人们向坦克车扔燃烧瓶,一辆坦克开枪,一个人被打死,两人负伤。在加里宁广场上的坦克车队采取了中立立场,没有进攻,那里贴上了许多标语:“让苏联共产党负责”、“让我们进行最后一次血的斗争”、“亚佐夫滚蛋”、“‘8人委’滚蛋”等,有些标语还写到了坦克车上。关于20日这天军队与群众冲突的某些情况,我们在次日晚上反复播放的电视节目中也看到了。

8月21日,冲突已近尾声。早晨,电台公布对莫斯科实行军管,莫斯科的33个区的权力都交给军管会。从23点至5点为宵禁时间,居民在这个时间不得离开住宅。但实际上,莫斯科已不为“8人委”所能控制。在普希金广场和附近街道的装甲车都采取了中立立场,坦克车手微笑着让人们拍照。6点,亚纳耶夫给俄罗斯联邦政府秘书布尔布里斯打电话:“我只想从经济上振兴祖国,我不知道这会招致什么后果。”这标志着已经准备缴械投降了。10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开幕,大会宣布:“8人委”废除总统是非法的,其政变把国家带到战争边缘。叶利钦在大会上报告:政变分子已经逃到伏努科瓦机场,已命令逮捕他们。中午,莫斯科形势已完全转变,

军队开始撤离莫斯科。14点10分,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总统助手宣布与戈尔巴乔夫取得联系。15点,人们把总理希拉耶夫送出白楼去接戈尔巴乔夫,他从汽车里伸出手,做出“V”字形(英文Victory的第一个字母,意为“胜利”),群众说:“祝你成功!”19点,最后一批坦克沿着列宁大街开走了。晚上莫斯科生活恢复正常。凌晨1点,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一架飞机降落,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并在机场发表了讲话。

8月22日早晨,已传来消息,“8人委”成员已经被捕。后据报载,他们在伏努科瓦机场被捕时,亚佐夫很淡定,当听到“你被捕了”这句话时,他说“我早就知道了”,还向逮捕他的战士要烟抽;巴甫洛夫很坦然,说了句他“没有料到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么快就寿终正寝了”。亚纳耶夫是在自己的别墅里被捕的,当时警卫只有3人。普戈自杀,其子死,其妻自杀未遂,住进医院。22日这天,所有被封闭的报刊都已开始正常工作,《消息报》主编因与“8人委”站在一起,故被解职。中午12点,在白楼前举行胜利者集会,路障开始拆除。晚上,戈尔巴乔夫举行记者招待会,叙述他被软禁的情况,谴责政变,说他已在行使总统权力。20点,放焰火,庆祝胜利。

8月23日,我们在奇思达保里听到消息,莫斯科已经决定推倒捷尔任斯基像。8月24日早饭时得知,当日下午3点在莫斯科广场,为在事变中为保卫叶利钦而死难的3人举行安葬仪式,捷尔任斯基像已被推倒(次日早晨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捷尔任斯基的塑像用吊车吊走的照片)。下午,我们在汽车上从收音机里听到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的夫人在其丈夫的安葬仪式上发表讲话。后来,比留林在给我们送别的午宴上说:死难的3人,1个是工人,1个是教师,1个是画家,其中2人在阿富汗当过兵,在事变过程中,共有8辆坦克倒戈。24日早晨,莫斯科所有东正教堂都举行仪式,为在这次事变中保卫俄罗斯政权而牺牲的人祈祷。

就是在24日这天,戈尔巴乔夫宣布自行解除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党的领导机关解散,他不接受这个搞政变的中央委员会。戈尔巴乔夫总结了两条教训:一是他太不果断,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改变机构;二是没有过早地结束共产

党对权力的垄断。戈尔巴乔夫命令取消原部长联席会议办公室，建立国民经济高效率办公室；命令在军队、安全部门、内务部等国家机关实行非政治化，在工作时间不得进行政治活动；命令苏共财产转交人民代表苏维埃保管。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命令，莫斯科苏维埃决定，苏共中央和莫斯科党中央办公大楼被封闭和监护，以防止有人偷偷地转移党的文件。与此同时，列宁格勒也查封了当年的革命指挥部斯莫尔尼宫，喀山城市苏维埃非例行大会也封闭了在境内的所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筑。前总参谋长、当时苏联总统参谋、68岁的元帅阿尔哈尼耶夫于24日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上吊自杀了，他在遗言中写道：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破灭了。

三、苏联社会对政治事变的反映

首先，苏联的政治、社会组织大都是反对这次事变的。

事变发生后，苏联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首先作出反应，声明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的；全苏工会总联盟苏维埃主席团声明反对这次政变；俄罗斯工会谴责这次政变；新闻记者协会声明反对这次政变；煤炭工业工会主席团声明反对这次政变，号召全国人民进行还击，进行无限期总罢工。许多城市也谴责这次政变，如列宁格勒城市委员会刚宣布戒严，几小时后即宣布没有必要戒严，并谴责政变。海参崴、伏尔加格勒、维利纽斯都谴责这次政变。其他城市开始反应平静，但紧接着都纷纷谴责这次政变。

其次，苏联民众大都是反对这次事变的。

8月20日，即事变发生的次日，全苏民意研究中心就这次事变对弗努涅什、克拉斯纳雅尔斯克、列宁格勒、利沃夫这4个城市的1438人进行调查，结果如下：

问：你认为紧急状态委员会是否合法？回答不合法的（以下都是4个城市的比例平均数）占62.5%，回答合法的占19%，不表态的占18.5%。

问：你认为紧急状态委员会能不能改善国家权力状况？认为能改善的占16%，认为更糟的占55%，不表态的占29%。

问：你认为紧急状态委员会会不会采取大规

模的镇压行动？回答会的占62.75%，回答不可能的占22.25%，不表态的占15%。

问：你对叶利钦号召无限期罢工持什么态度？回答支持的占42.25%，回答不支持的占37.25%，不表态的占20%。

以上民意调查可看出，对紧急状态委员会不支持、不信任的占大多数，支持叶利钦的虽然不占多数，但比例也最高。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明这次事变失败的原因，即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

再次，我们访问期间没有遇到一个人明确支持这次事变，也极少有人明确表示支持共产党。

接待、陪同我们的波波夫是非党人员，前面已经述及，刚把我们从机场接到汽车上，他就明确表示反对这次事变。后来，当在汽车上从收音机里听到“8人委”倒台、戈尔巴乔夫复出时，他激动地一个人鼓起掌来。在莫斯科，我们见到一个老太太指着马路上坦克的履带痕迹说：“你看马路都给轧坏了”，明显表示不满。在喀山，一个老太太说：“共产党试了70多年了，弄成这样，也应该让其他人试试”，显然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8月24日晚，陪同我们吃饭的石化企业的一个领导人说：“现在这里退党的人很多，其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党丧失了威信，人们的日子越过越不好，20年前人们都愿意入党，现在我们党衰落了，人们也要退党了。”当我们不经意间谈到斯大林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个话题时，波波夫表现出极大的愤怒：“二战的胜利是人民付出极大的牺牲，是人民的胜利，怎么能说是斯大林捍卫了苏联？！”这使我们的谈话一度出现比较尴尬的场面。8月26日晚，我们从嘎马斯克回到喀山，被迫吃自带的方便面时，陪同我们的鞑靼尔斯坦自治共和国中央办公室的干部塞辅洛维奇说：“党建立88年了，突然完了，88年搞得如此模样，党解散也是应该的。”他和波波夫都表示：“我们可能要转到资本主义去了，实际上这也没有什么可怕，令人担心的是这个转变能否和平的、平稳的转变。”他们估计形势可能越来越糟，人们普遍忧虑，担心流氓团伙会乘机而起，搞打砸抢，形势会复杂起来。总之，他们担心、忧虑的已经不是共产党会否垮台，而是能否和平地转变到资本主义。

苏联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已经非常薄弱,基层党组织早已没有了领导权,戈尔巴乔夫多年来宣传的多党制已为广大基层党员干部所接受。8月22日,喀山皮革厂的总工程师向我们明确表达了他关于企业党组织的看法:“企业党组织的负责人对厂里的生产没有、也不应有领导权或干预权,因为党并不是无所不知的,如在生产上,我就比别的人知道得多些。”当我们向他介绍一些关于中国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生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时,他很以为不以为然,明显表示不相信。8月23日,苏共奇思达保里市委对话委员会(大约相当于我们党的宣传部门)主席达基娅娜说:企业党组织主要有三项任务,即协调不同民族工人间的关系,维护团结,管理工人的组织纪律,组织工人文娱活动。这就是说,苏联企业中的党组织已没有领导、干预生产的权力,其职能类似中国的基层工会组织。就是这样一位热情的党的宣传工作干部,也盛赞多党制说:“每个党员都应该赞成多党制,党的伟大正确需要得到实践的证明。党犯过很多错误,所以要改造党。我们党做事应该为了人,为了事业,而不是为了一个思想。所以,我们现在有了一种新的观念,党就是民主,就是群众,就是事业……如果每个工厂都有一个党的委员会,那么人人都是政治家了,就没有人干活了,工作就不好做了。我想指出党应该学会一种新的工作方法。”

苏联人普遍对现状不满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没有搞好,他们迫切地要求改变现状,处于一种“我们将会被开除球籍”的焦虑状态。8月19日晚到机场接我们的司机说:“再晚了对我们就没有时间了!”波波夫在陪同我们期间经常表述的一个思想是:“我们生活在最富的国家里(指资源丰富),但我们什么东西也没有,这是由体制决定的。70年代以前,商店里什么东西都有,但人们没有钱,现在有钱了,但什么东西也没有了。”他对现状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日益衰退的经济上。8月29日,在从喀山返回莫斯科的列车上,我们与来自巴库飞机制造厂的一位工程师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他对中国人很敬慕,知道中国的商品很多,改革很成功,赞扬中国人有修养,城市很卫生等等。他对苏联现状不满,并认为人人都像他那样不满,原因同样是“什么东西也没有”。

他对改革提出三条意见:一是要加强组织纪律,他认为现在没有纪律了,如从美国进口电影,有很多描述男女性生活的,在美国是儿童免看,但在这里什么人都看,他认为这应当禁止;二是要把土地还给农民,解决生活资料匮乏的问题;三是要提高产品质量,节约原材料,现在东西造得很大,质量又差,材料浪费了。当我们问及导致这种“经济衰退”、“人人不满”的原因时,他想了想,审慎而又幽默地说:“这个问题太困难了,还是让戈尔巴乔夫来回答吧。”

应当指出,我们在整个访问期间,确曾遇到过一个明确支持共产党的干部,同时也感受到苏联共产党仍具有很大的影响。苏共奇思达保里市委第一书记是我们访问过的唯一盛赞共产党的人。他在苏共财产被查封前的8月23日,曾对我们说:“我们这里的党是健康的,我是第一书记,但现在出了点麻烦,我们有思想准备,准备过冬。我们有个口号,光荣属于苏联共产党!我们的每条河流的命名都是由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据说,当莫斯科当局宣布推倒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等人的塑像时,一些老党员走出家门口,把自己在战争年代获得的勋章戴在胸前,以示不满。我们在红场目睹了许多对青年结婚,仍按老传统在烈士纪念碑前献花、拍照。虽然斯大林的形象早已在苏联人民心目中失去光彩,但列宁的形象仍然是伟大的。书店里摆满了许多封面上印有列宁像的图书,特别是在喀山,许多建筑物上都装有党旗的徽记,几乎所有庄重的场所,都有列宁的塑像或照片。在宣布封闭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没收苏共财产以后,莫斯科盛传乌克兰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地下秘密会议。

但是,就我们对整个苏联社会的感受来说,苏共在短期内似难形成有组织的强大抵抗力量,苏联目前正处于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人们最关心的是货架而不是“主义”、“思想”、“纲领”,苏联知识界和人民群众不愿回到过去,而愿沿着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改革道路走下去,这已是当时苏联难以逆转的现实和大趋势。■

(作者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楚图南在美国领事馆避难记

○ 楚泽涵

一、事情的缘起

1946年6月下旬,国共内战全面爆发,针对昆明流传的“民盟勾结地方势力在地方搞暗杀、夺权”的谣言,6月26日,民盟云南省支部在昆明商务酒店由民盟中央常务委员潘光旦和民盟中央委员、云南支部主任委员楚图南领衔举行招待会,招待云南政界和军界人物,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在会上介绍了民盟反对内战,实现国内和平的政治主张,并公开了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成员的名单;28日潘光旦、楚图南、李公朴、闻一多又在商务酒店招待云南文化教育、金融实业界的朋友,并介绍在昆明的民盟支部的领导成员冯素陶、潘大逵、费孝通等和大家见面。招待会进行中,有人抢走招待会的签到册,后被民盟的工作人员金若年等追回。29日,继续招待新闻界的朋友,由于商务酒店接到不许继续承办招待会的通知,招待会被迫改在冠生园酒家进行。

7月11日晚,李公朴在昆明青云街上遭遇枪击,随即被李夫人张曼筠和路过的云南大学学生抬到云大医院抢救,次日凌晨,楚图南、闻一多等赶到医院时,李公朴已告不治。张曼筠告诉楚图南等,李公朴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民主哇!”

7月15日下午,楚图南和闻一多在云南大学参加完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和《民主周刊》社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后,按楚图南的安排,楚图南先走,并嘱咐闻一多在楚离开后稍晚一点再走,而且还劝闻一多改变一下回家的路线。楚图南在出了《民主周刊》社以后,没有走通常回家的正路,而是拐进了一家原来熟悉的小理发店,并从理发店的后门出去,随即沿小路从昆华师范学校后门回到住所(胜因寺)。后来据说,昆华师范学校正门前,当日有若干陌生人在门前守候。楚

图南回家后准备晚饭时,有学生来告:闻一多在出了《民主周刊》社后在回西南联大宿舍的路上被枪击中头部,当即身亡,闻先生的公子立鹤也被枪弹击伤。

有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父亲楚图南和母亲彭淑端立即明白了:危险还没有过去,随即由母亲找到了父亲的学生许易源,由许易源陪父亲躲在昆华师范学校礼堂后台边的一间有两个出入口的半地下室式的小屋里。

当天傍晚,一辆美国军用吉普车开到昆华师范学校宿舍的门口,是一个美国人开车,找到我们家后,金若年进门就喊:楚师母!楚先生在哪里?母亲很冷静地说:楚先生不在;问他:有什么事情。金若年才告诉母亲:闻先生遇刺,朋友们都关心楚先生的安全,由潘光旦先生出面和美国领事馆联系,请他们保护一些朋友,现在潘先生和费孝通、赵(当时的名字叫赵天民)等已经住进美国领事馆,朋友们认为楚先生的处境最危险,因此请他去美国领事馆暂避,而且介绍了开车的美国人——美国领事馆的副领事马克基利。母亲在问清了所有细节后,才陪金若年一起到父亲藏匿的地点,招呼父亲回到家里,略施收拾,就准备走。当时,我家小妹泽湘三岁,小弟泽洋不到半岁。考虑母亲带三个孩子顾不过来,于是将我这个正放暑假的小学二年级学生一起带走——那年,我七岁。

二、避难人员考略

吉普车把我们带到篆塘新村的美国领事馆和美国新闻处所在地,我记得是一幢两层的小楼,二楼有一间圆形的大客厅,周围都是玻璃窗,玻璃窗外则有带护栏的整圈阳台。在我们到这里前,已经有几位先生在客厅,后来又陆续来了一



1945年秋,楚图南及家人在昆明。右起:楚图南、次子楚泽涵、堂弟楚存南、夫人彭淑端、幼女楚泽湘。

些人。按父亲的日记,先后到美国领事馆避难的有(按年龄排序):

张奚若,当时是西南联大教授,早年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

潘光旦,当时是西南联大教授,早年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理学硕士;

楚图南,当时是云南大学教授,民盟云南省支部主任委员;

潘大逵,当时是云南大学教授,早年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法学硕士;

尚钺,当时是云南大学副教授;

冯素陶,当时是《战时知识》杂志主编;

费孝通,当时是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早年是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

赵,当时是云大附中教师;

金若年,当时是中苏文化协会昆明分会和民盟云南省支部工作人员。

上述九人中,有四人原来留学英美,而且都有名校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还有四人是民盟的中央委员(潘光旦、楚图南、潘大逵、冯素陶,其中潘光旦还是中央常务委员,而且包括了当时民盟云南省支部的主要负责人:主任委员:楚图南,组织

部长:冯素陶,财务委员:潘光旦,秘书长:赵;潘大逵、费孝通当时也是民盟省支部的委员),有四人早年参加共产党(楚图南、冯素陶、尚钺、赵,但这四位的身分没有公开)。除了上述九位以外,眷属还有潘光旦和费孝通先生的夫人,小孩则有我和费孝通的女儿(比我略小)。另外,还有当时是云南大学教师的姜震中、王志诚、林彦群、王康等,但是他们由于年轻或者“目标”不是那么大,还需要担任一些与外界联系及事务方面的工作和活动,因此在美国领事馆避难的时间不长。

据后来父亲告诉我,在闻一多遇刺后,潘光旦先生立即和他原来就比较熟悉的美国驻昆明领事罗斯(Rose)先生联系,告诉罗斯,他和一些教授朋友(而且其中几位还是美国和英国著名大学的博士和硕士)现在的安全受到威胁,希望美国领事馆方面提供保护。于是罗斯亲自开车(或派人)将潘光旦夫妇、张奚若、费孝通

(及夫人和幼女)三位西南联大的教授率先接到领事馆保护,随即又接来了赵和金若年——因为这两位较年轻,而且熟悉有关情况(其他人的住所、活动规律及家人等),潘光旦等人到美国领事馆后,大家商量,认为楚图南、潘大逵、冯素陶的安全可虞,特别提出楚图南是民盟云南省支部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优先接来保护,楚图南被接来后,又提出尚钺(当时名叫尚健庵)有危险,因此又接来了尚钺。这时已经是7月15日深夜。

由于金若年当天晚上没有找到冯素陶,第二天,金若年才将冯素陶接到美国领事馆,据称,冯素陶在闻一多遇刺后的当天和次日,与民盟支部的其他负责人讨论和起草有关的声明等文件1,13,因此,第二天(一说是第三天)下午才住进领事馆。

三、避难经历和结束

避难期间最危险的经历是7月15日深夜,美国领事馆门口突然汽车声隆隆,来了两卡车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宪兵,将领事馆包围,并由宪兵队的头目到领事馆门前,要求将在领事馆避难的

全体人员交由宪兵带走，这遭到美国领事罗斯严词拒绝，随后也拒绝了宪兵头目要求领事馆交出避难人员名单的无理要求。这时美国领事馆又用电话向在巫家坝的美国空军求援，要求美国空军派人来保护领事馆和避难人员的安全。此后，宪兵队撤走，领事馆门口和二楼阳台外面则由全副武装的美国兵守卫。我当时已经入睡，半夜起来时确实看见玻璃窗外的环形阳台上，有数名美国兵手持卡宾枪在巡逻守卫，次日早晨，阳台上的卫兵撤走，但是门口依然有美国兵守卫。

次日，父亲以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的身份和潘光旦等与美国领事罗斯交换意见，父亲向罗斯介绍民盟的政治主张——反对内战和希望国内和平，施行民主政治，并对李、闻遇刺，表示了强烈义愤，要求追究治安当局的责任和缉拿凶手治罪，并保证民盟成员和爱国民主分子的安全。罗斯表示对所有避难人员的同情和欢迎，并承诺将所有情况报告在南京的美国大使馆及美国国务院，同时也表示愿意提供避难人员与外界、特别是与在南京的民盟总部的电信联系的方便。在这以后，罗斯意识到在避难的中国人中，真正有影响和起作用的是父亲，因此和父亲有较多的接触，在谈话中提及希望“教授们”能够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做另外的选择，也希望“教授们”有机会去美国讲学和研究。父亲回答道：中国以后走什么道路，作为学术问题，也许是文人论政的一个好题目，但是在当前蒋介石及国民党在军事上以武力对付过去合作者，在政治上以高压的态势对付所有不同意见的公民，尤其是以恐怖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则很难再认同蒋介石、国民党的政府。父亲也表示：当然希望有机会去看看世界上最富强的美国，但是，现在，在中国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似乎没有条件离开中国，而且，父亲表示：相信所有的同事们都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国——除了向往民主的中国，当前则更向往回到原来的学校（清华大学等），恢复教书和学术工作。虽然政见不同，但是父亲和罗斯保持了个人间的友好交往——后来父亲到了上海，还遇到过奉调回美国的罗斯，父亲还请他喝咖啡，为其送行——这是后话。

由于民盟云南省支部的主要负责人均在避难人员之列，因此民盟的活动仍在进行，其中在

7月16日通过新闻界向全国公布的《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为闻一多同志复遭暗杀的紧急声明》，就是在领事馆经过讨论、修改后由冯素陶带出，再排字印刷后交由新闻界发表的。《紧急声明》认定，闻一多遇害是“有计划的政治暗杀行为”，是“法西斯反动派决心放弃以和平民主方式解决当前国是问题……以配合正在展开的全面内战，公开向全国人民全面进攻的具体表现”。对暗杀惨案，《紧急声明》要求“追究治安当局的责任，调查真相，追究和缉获凶手，交付公审”，并提出保障人权、取消特务机关、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和重开政协的主张。

此外，避难人员还通过各种渠道和在南京的民盟总部联系，通报事件的进展，提出各种建议。民盟总部在案件发生后立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议，7月17日，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就李、闻案件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同日，马歇尔在和周恩来的会谈获悉闻一多遇刺后，表示和周“一样的震惊和憎恶”，而且认为，美国领事馆的行动“对阻止类似事件的继续发生会起到强有力的约束”。此后原来长期担任美国驻昆明的领事斯普劳斯被从北平调回昆明，调查案件和拟定对避难问题的处理意见，他的调查称：由于领事馆的人相信国民党“已决定谋杀昆明民主同盟领袖”，并且获知云南民盟主委楚图南等也列入黑名单，因此有必要对这些人加以保护。

李公朴、闻一多遇刺后，引起了全中国的公愤，美国领事馆对民盟领导成员的保护和美国舆论及马歇尔的态度又增加了对当时一心要打内战的蒋介石压力。蒋介石派警政署长唐纵到昆明处理此事。唐纵到昆明后，使出蒋介石惯用的伎俩，将与卢汉关系很深的杨立德逮捕，严刑逼供，企图将责任嫁祸于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卢汉，这使情况更加复杂起来。卢汉既不愿代人受过，但也不能得罪蒋介石，只对唐纵不满，蒋介石只得再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参谋长冷欣和宪兵司令张镇到昆明查处此事。8月6日，民盟总部派秘书长梁漱溟和中央委员周新民到昆明调查李、闻遇刺案件，而且更重要的是营救在领事馆避难的这些民盟的同志。顾祝同和卢汉曾经两次以宴请的名义会见梁漱溟等，最后顾祝同组织了两次欺骗舆论的“公审”，枪毙了两个“特务”做替死

鬼,草草了事。对案件负有罪责的中央军驻云南部队的头目霍揆章及蒋介石安插在云南省政府的李中黄则仅以革职了事。但是梁漱溟等的营救活动是有效果的:首先,卢汉到领事馆看望避难人员,表示愿意保证避难人员出来后的安全,但是希望避难者离开昆明,并表示愿意提供离开领事馆和昆明的交通工具和飞机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也派人到领事馆和教授们谈话,提出避难者以不公开发表声明为条件,承诺保证避难者离开昆明后的安全。

在这些安排后,7月30日潘光旦和费孝通等乘飞机离开昆明去上海,父亲则和尚钺、赵等暂居于李公朴在世时经营的北门书店,安排和处理民盟云南支部的工作和组织部分青年学生到外地的筹备工作。到了8月8日,父亲和张奚若、尚钺、赵同机离开昆明去了上海。历时半个多月的避难生活至此结束。

四、后来的事情

1946年在昆明美国领事馆避难的各位有民主思想和要求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非个人主义道路,在1949年后,全部留在大陆,为发展和建设新中国效力。当年避难者间都还有工作联系和个人友谊:

1950~1953年,父亲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长,潘大逵是副部长,两人的友谊一直延续到晚年。

父亲和赵则在1954年,以中国古典歌舞团团长和副团长的身份出访北欧四国,特别是到了当时还未与中国建交的冰岛;1955年两人又再次率团访问南美的智利、乌拉圭、巴西、阿根廷等与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的四国,而且积极准备进入美国,可惜由于匈牙利事件,这次企图敲开美国大门的目标没有实现。

张奚若和父亲在1953年分别出任担任人民外交工作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后来又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任主任和副主任,工作上上下下,私谊则是好友和兄长。

父亲和费孝通后来一直在民盟中央任职,最早的一届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中,父亲是主任,

费孝通是副主任,两人还先后担任民盟中央的主席和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两人的私谊,从来未因政治变迁和世态炎凉有所变更。

特别要说到的是潘光旦和费孝通早年有师友之谊,因此费孝通一直对潘光旦持弟子礼,在潘光旦先生遭难,被勒令在水稻田劳动时,费先生一定持奉在侧,而且为潘先生准备一个小凳子;在潘先生“文革”期间遭迫害,在医院得不到应有治疗时,是在费先生的怀中去世!

父亲和冯素陶和金若年都是在民盟中央工作多年的同事,始终保持友谊。

1957年,毛泽东在知识界搞“阳谋”而祸及众多知识分子时,父亲正在尼泊尔访问,回国后,高潮已过,潘光旦、潘大逵、费孝通这样的老学者未能幸免,金若年这样比较年轻的同志也在劫。父亲为当时没有能力保护和关心这些老朋友而深为惋惜。到晚年则对此有过困惑:当年美国领事馆都有能力保护这些“民主的个人主义者”,而正当这些人希望为国家效力时,为什么连他们要求思想和民主的最起码权利都被剥夺了呢!

还要说的是,几位教授和其他在美国领事馆避难的朋友的这段经历,在1949年后、1966年以前的历次运动中,均未作为问题,父亲说。1948年底他在平山时问过中共的负责同志,他们说知道和了解这些事情,并认为父亲和其他同志的处置应对是正确的。

劫难发生在“史无前例”期间,在美国领事馆避难的经历不仅是所有当事成年人的“罪行”,连当时仅七岁的我,也未能幸免,1968年,原来铁道兵某师的军宣队进入我所在的北京石油学院,在“清队”期间,系里军宣队负责人刘某逼迫我承认和交代当年在美国领事馆当“特务”的“罪行和经历”,当然被我拒绝。但是,我对这些人的憎恶和蔑视或可与当年当众对妇女撒尿的国民党特务流氓的厌恶相比!更对我们国家在一个时期里的斯文扫地、有领导的疯狂、有组织的混乱表示惋惜!1946年,国民党枪杀了李公朴和闻一多,使蒋介石政府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人心丧尽;二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则使中国的知识阶层面临空前的信仰危机!前车之鉴,为政者应该深刻反思!■

(责任编辑 萧 徐)

1958年温江特大疫情病原体探索追忆

○ 陈廷祚

1958年“大跃进”年代的夏收期间,四川省温江专区农村突然爆发了一次史无前例、无黄疸型钩端螺旋体病(简称“钩体病”,下同)的特大流行。其时,众多的青壮年农民集体下田收割早稻,抢栽晚稻,突然病倒,高烧不退,形成一发不可收拾之势。但因患者病状与教科书中所述及我国以往所见的钩体病大不相同,亦即,非典型性——少见有发生黄疸(典型外耳氏病Weil disease有黄疸),呼吸道症状显著,并每每由于咯血或肺部大出血而猝然死亡,由此迷惑了当地所有的医生和专家,致使他们处于束手无策、不知所措、迷失方向的困境。农业生产一度陷入了停顿,甚至水陆空交通也实施了防疫管制,疫情直接惊动了中南海。

疫情发生后,因需保密,省内外都不敢就此事大肆声张,邻近温江专区的成都市内仍然过着表面平静的生活,甚至与防疫站关系密切的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简称“成都所”,下同)的一般技术人员也只是偶尔有所风闻,不知其详。原来,自7月初起,省内各地就先后有零散病例,或小规模的流行发生,重症病人全都死于肺部弥漫性大出血。省里的防疫人员和专家从一开始就汇集在疫区的蒲江和温江两县防疫站,成立了专业检验组,从事病原体的检验和探索。经过约莫一个多月的辛勤劳动,专业组除了鼠疫杆菌等可疑病菌得以排除外,几乎一无所获。随后,终于在8月上旬,迎来了北京的流感病毒专家和防疫人员共4人,他们说是有可能为一种变异流感病毒感染,造成这次温江的特大流行。省里做出决定,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内成立以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朱既明研究员和四川医学院微生物教研室主任林志靖教授为组长的流感病毒检验组,从8月10日起开始工作。

我是在这个检验组开展工作之后,才开始对温江疫情略有所闻,但是仍然不知这次疫情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从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在重庆歌乐山的中央医院内科当过将近两年的助理住院

医生,由于不满医院当时检验工作的落后状态,随后到昆明西山脚下的中央防疫处,改学微生物学,从所谓“拉胡琴”式的体力劳动(当时一种戏称,即用细菌刮种棒刮种克氏瓶培养物做苦力劳动的一种说法)做起,练就了一手无菌操作的真功夫,掌握了微生物的培养、分离、检测和鉴定等全技术。1947年,我前往欧洲留学,一度师从享誉国际的钩体权威C.Borg Petersen教授,钻研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操作,特别是他们在这领域的特长,即钩体血清学分型法。1948年我在国外秘密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于1949年底应召回国,在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在这里,我曾经以总技师的身份,协助我国钩体学者魏曦教授主持的钩端螺旋体研究室(这在中国也是以此为名开创先例的唯一专业试验室)掌管过该室的科研工作计划,不但了解国内科研动态,对国外钩体病的最新进展(国外马来亚的疫情报告就是在1957年发表的)也了如指掌。

1957年反右派运动,我受到牵连。1958年初,我被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内定为“右派”,并于同年10月,“戴罪”来到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这样的身份,使我无缘对温江疫情有更多的关注,甚至难以与流感病毒检验组交谈或研讨问题。

事真凑巧,就在疫情发展到了高峰的严峻时刻,8月14日上午,我在所里行政楼前面的花园路上,无意中碰到了一位当时主管生产、科研的所领导——燕真副所长。燕真先生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早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时期,他就曾和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一起共事过四次,而后在延安时,他还结识了那里许多的老革命家和老干部。建国初期,他于1952年奉命来川主持当时的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第二所,即后来的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筹备建设工作,担任筹备处的主任(第一所为后来的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新所落成后,他于1957年3月起担任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

我在1954年就与燕真相识。那一年,作为中国第一代“海归”的我,被当时卫生部防疫司杨清秀副司长亲自点名,从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抽调参与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筹备工作,主持生产车间和实验室的技术设计。从此开始结识了燕真和王庭槐夫妇。我到成都来工作后,又和他成为同事,私交很好。

燕真主动向我简略介绍了温江疫情和患者的临床特点,以及疫区防疫站的检验结果,说是该做的工作都做了,就等所里新成立的流感病毒检验组拿出检验报告来。我听后,脱口说出了一个问题:“怪了,流感不在城里流行,跑到乡下去了,真是闻所未闻!”

燕真对此也有同感。我接着指出,这次病状有点像1957年《美国热带医学和卫生杂志》的一期刊物上发表的疫情那样:在马来亚(即今日的马来西亚)丛林中作战的英军士兵,因与被鼠尿污染的露水接触,染上了钩体病。流行趋势虽然没有像温江这么凶猛,但在临床上表现出来的某些主要特征,却与温江患者的症状极为相似:无黄疸,肺部症状突出,有血痰或咯血,乃至死亡。此外,在欧洲的意大利、丹麦等国,也有无黄疸型的钩体病存在,但只是散在性或是在少数人群中发生,从未见有这样特大规模的流行。

我顺口向燕真提出如下建议:“不妨叫所里的流感病毒检验组,从钩体方面附带做些工作,或可解决问题。疫情已经发生一两个月了,至今仍然毫无头绪,这事应尽快落实。”

第二天,8月16日上午,燕所长就派人给我送来了疫区12例患者的全血样本,要求尽快进行检验,解决当前这个使全省上下乃至北京中南海迷惘和困惑,而又了无对策的病原学重大难题。

艰难之时,我已是内定的“右派分子”。燕真不计较我的身份,我当然愿意临危受命。况且出于科学家的良知和公民的责任感,也应该挺身而出。我独自一人在所里马家桥一侧山坡下的一栋独立闲置房中,连夜建成所谓的“钩端螺旋体检验组”,这在医学史上是开创先例的一码事——从试验室和动物间的布置、领料、送料、实验操作、培养基接种培养、动物接种饲养解剖和处理以及打扫室内外卫生等什么细活、粗活、重活、脏活,全都由我这位尚未被公开解除职务的“总技师”一人独揽下来,包干到底了。



1997年夏,作者又一次来到旧地,当年他独自在这里查获了温江特大疫情元凶——赖型钩端螺旋体。惜乎这一重要的历史见证地已于2007年遭到拆毁。

8月16日,对12份患者血清样本的凝集溶解试验效价有10份阳性,多数达到1:1000或更高。内行人,或者稍微懂得一丁点儿临床检验知识的内科医生,一看就足以说明或证实,这是一次集体感染的钩体病。8月27日,用患者全血接种的一只豚鼠出现死亡(因动物间在19日始隔离安装完毕,当日才接种,以致推迟了3天得出结果),经解剖呈典型钩体病变,并在暗视野显微镜下看到活泼运动的钩体,由此可以进一步证实为钩体感染。

然而,由于我的“戴罪”身份,无缘参会,作出汇报和辩论,我的科学结论居然多次不被当时的各路专家和卫生当局认同和采纳。以致疫情还在蔓延,死亡人数还在攀升。燕所长几次将我的检验结果即时口头上报给以四川医学院曹钟梁院长主持的专家组,都遭到了否决。他们根据患者肺部症状及未出现黄疸的表象,即与教科书上描述的典型症状一样,仍然认为主因是流感。与此同时,专家组还向上级提出报告,邀请并等待北京的一位钩体病专家来川核实我的结果。至此,事情由8月16日获得阳性结果起,已逾10日!

时间就是生命,已经来不得半点迟疑和延误!早一

天确认钩体病的诊断,农民兄弟的苦难和生命就早一天获得挽救和解脱,免于死在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者的手下。因此,我也热切盼望北京的专家能早日到来,视察我的实验室、检查试验记录,乃至交换意见。但在等待的过程中,我被明示:已经成为公开的“右派”分子。

8月下旬(后经查证是在8月24日),北京派来的一位钩体病专家飞抵成都。这位专家始终没有和我有过接触,我甚至连这位专家的姓名都不知道。直到事隔30年后,我从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第一卷,1987)和四川省志编辑室通过所里给我发来的征询函(1989年9月初)中,才知道来者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钟惠澜先生。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搞钩体科研的机构仅有两个:一个是附设于北京友谊医院、由钟惠澜学部委员(院士)领导的热带医学研究室;另一个是卫生部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由魏曦教授主持的钩体研究室,他也是学部委员(院士)。

在中华医学会内科学会1964年出版的《钩端螺旋体病学术会议(广州)资料汇编》(简称《汇编》,下同)中,未见有人就温江疫情病原体的探索经过,做出专题报道。就是作为大会主席的钟先生,在他长达21页、以《新中国对钩端螺旋体病的研究概况》为题的开卷篇中,对1958年温江发生的那么大的、惊动了中南海国家领导人的疫情,也只是一笔带过,说了如下几行字,“1958年秋季四川温江等地区发生本病大流行后,在该省党政领导下,对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参见《汇编》第2页),而没有谈他对温江那次疫情病原体的探索成就。但在1987年出版的一本医学家传略书中,却有一段他亲自撰写的情节:“1958年,四川省4个专区的钩端螺旋体病暴发流行,数以10万计的群众受到感染。当时该病被误诊为鼠疫和亚洲型流感,封锁了川藏以及成都附近的交通。钟惠澜奉中央之命赴现场调查,三天内即找到病原钩端螺旋体,准确地判明了病因,解除了封锁,使广大患者适时得到正确的治疗,保障了人民的生活、生产建设的正常进行。”(参见《当代中国医学家荟萃》第一卷第292页。主编:崔月犁韦功浩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但在这同一本书上的第383页,却有我撰写的另一个式样的描述:“1958年,四川省温江专区所属各县爆发原因不明的一种疾病。医务界对该病的病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陈廷祚首先提出:鉴于本病的临

床症状和流行病学特征与马来西亚丛林中发生的、无黄疸型钩端螺旋体病极为相似,因此,钩端螺旋体有可能为其病原体。后来,通过实验,首先获得了血清学的证明,但仍不被人们接受。直至一个星期后,又分离得导致患者肺部大出血而致死的(现称为赖株)钩端螺旋体,才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治疗方向。”赖株钩体是我国最为广泛流行的钩体,现已被国际上认可为一新型钩体收藏。

在同一本书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到底是谁发现了病因?钟先生来成都时,我已经成为“右派”,不知道他来后是如何三天就发现病因的。为此,在读到钟先生的自传以及省卫生厅发来征询函征询情况后,我致信已在兰州离休的燕真夫妇,了解真相。2000年2月28日,燕真回信说:

“1958年温江地区秋季疫病大流行时期,成都所和你——特别是你做了大量实际工作。我当时是从疫区取标本,传信息,将结果带去疫区组织,起个‘交通员’的工作。在和你交换意见中,你提出马来亚疫情,并由你负责做疫区患者血清学检查等工作,很快获得钩体病原阳性报告,相继在患者血液标本动物接种获取到首例钩体病原体结果,证实流行是钩体病所致。这是有原始记录可查的。当时流研科钩体组做了包括华阳、双流等县区自然疫原调查,取样检测工作。在钟惠澜离蓉回京前,从成都所带了原始材料走,取教于他。但后来在他写的文章中只字不提资料来源。当时就有技术人员提该钟剽窃、篡取成都所相关人员的劳动成果,我也有同感。并与周绪德副厅长面谈过。但对那时文章尚无过问之意而不了了之……。事实永远是任何人主观意愿战不胜的,是不随个人主观愿望而转移的。”

原来事实真相是如此的!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多命运多舛。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有的人一生受难学无所用,有的人历经艰辛取得的科研成果被忽视被剽窃,有的人因仗义执言而家破人亡……但我们中的大多数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屡遭磨难依然自强不息,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历经侮辱折磨而不改。我已是九四之人,无意深究过往的对错,想到曾因自己的努力使百姓得以免除病痛,此生足矣!■

(作者系国家一级研究员、著名微生物学家、生物制品专家)

(责任编辑 李 晨)

科学研判“消极腐败的危险”

○ 李永忠 董 瑛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向全党郑重提出了破解“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的时代命题,再一次把科学研判和有效化解“消极腐败的危险”尖锐地摆在了全党面前。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防治因腐败而导致的“政治安全风险”问题,一直是党的领导人的关切重点和思考主题。毛泽东曾告诫全党: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邓小平警示大家: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胡锦涛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政府把反腐败置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之中进行谋划和推进,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反腐方略不断完善,但是腐败魔法也不断改变,腐败问题不断突破民众承受底线,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因而,迫切需要科学研判“消极腐败的危险”因素,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表现之一:反腐败战略“顶层设计”滞后,成为“消极腐败的危险”的滋生蔓延之伤。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反腐败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未能如期推进和突破,已经取得的反腐败成果有被严峻的腐败形势所抵消或得而复失的可能,执政党的一些执政资源也有丧失的危险。

一是提出问题张冠李戴。在反腐败的规划设计过程中,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背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中国历史上积淀的一些反腐败的优秀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说

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尤物。如中国秦王朝不仅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权力制衡、“三权分立”制度之先河,比瑞典的监察议会专员制度和美国三权分立制度早了两千多年,而且孙中山还推动了权能分开、五权分立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但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相当部分人士却把“三权分立”当成资本主义的制度特产和价值模式,讳莫如深,甚至加以批判和抵制,致使最核心、最根本的制度反腐败措施难以实质性启动。即使十七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但还是有人仍然坚持把三权分立、普选制、竞争性选举、民主法治、宪政改革、权为民所授等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优秀政治文明成果套上意识形态的色彩、戴上政治立场的高帽而不敢试、不让闯、不准冒、不许用,至今仍然“用等级授职制代替普选制”,严重违背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精神”。

二是分析问题讳疾忌医。谋划反腐败战略时,有时不善于使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抛弃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方法论精髓,采取实用主义的问题论,把社会主义的体制机制缺陷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流毒、资本主义的病毒,把内生的腐败怪象及其衍生的风险因素,片面地认为是“外在”的问题可以通过“体制外”来解决。如对既得利益势力垄断制、一把手体制、潜规则和明规则双轨运行制等制度性“病灶”引发的病变和腐败乱象,都统统归咎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封建皇权思想的作祟,不去触动改革现行体制制度弊端,致使制度上的漏洞和风险仍大量存在。

三是现有反腐败架构难以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由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致使解决腐败问题的战略架构常常脱离原点,畸形的监督权配置无法套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力之虎,粗放的反腐体制无法适应权利

时代的全民反腐诉求,封闭的反腐模式无法满足信息时代的开放的反腐机制建设,无学科化支撑的反腐之策无力应对“易发多发”的腐败之风。因而,把握改革“时间窗口”,加强反腐败战略“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上下互动、内外结合,重点突破、有序推进,成为当下我国应对消极腐败危险的紧迫任务。

表现之二:主体结构缺陷成为“消极腐败的危险”的根源性因素。马克思指出,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存在。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尖锐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致使我们犯大错误的“总病根”。要想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改革权力结构使之科学。改善结构、注重质量,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章太炎先生 20 世纪初发出“俱分进化”的警世预言,道德之善恶、生计之苦乐都是双方并进的。我国高速增长的经济总量光环,衍生和掩盖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主体结构缺陷成为制约和影响中国反腐败甚至改革开放进程的根源性风险因子。

一是权力结构僵化。我国现行权力结构,是按照 140 年前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议行合一”权力结构,借鉴苏联模式,初创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证明,“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极易演变成为从上自下高度并过分集中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形成以“一把手”为核心的“管理层控制”的人身依附关系,出现执行权取代或侵占决策权、控制或异化监督权的“议行监合一”的权力运行模式。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成为党群疏离、权力腐败、作风变异和危机事件多发的“总病根”,致使一些掌握公权的政府和官员在逐利时代常常像一个个总务处,既无心无力充当精神旗帜,更无心无力真正践行以人为本,致使权威性的“三会”(党代会、人大、政协)在集权时代常常开成一个程式化的“清淡馆”,无能也无法真正践行民主原则,无能也无法有效授予和监督公权。

二是经济结构缺陷。当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外汇储备规模和出口总额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 GDP 仍然非常落后,核心竞争力与大国地位不符,结构竞争力长期在低位徘徊,市场配

置资源机制不健全,“无形之手”权重过小,“有形之手”权重过大,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有因为缺乏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科学的结构体系、健全的市场机制而失去精进动力的危险。

三是队伍结构不优。俄罗斯共产党 20 多万党员时,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300 多万党员时,打败了德日法西斯;拥有近 2000 万党员时,却发生了亡党亡国的历史性悲剧。同样是一党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由于非常注重队伍质量建设,充分吸纳社会各阶层的精英人士,突出加强政党自身的结构建设,党员占全国人口总数基本保持在 0.38% 左右,是世界上清廉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我国目前党员达 8000 多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5.8%,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执政党。但是,在不断扩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同时,党员质量建设有所忽视,少数地方党员发展过多过快,一些不知党、不信党、不爱党的人被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一些地方出现入党功利化、手段化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党员队伍的整体质量、形象和战斗力。同时,由于片面理解和执行干部“年轻化”,致使“年轻化”这一权宜之计,成为培养选拔干部的长久之策。从而在调动少数人积极性的同时,却使大多数干部的积极性备受压抑!干部队伍建设中,一方面批量并大量地产生着各种“天花板”式的干部;另一方面,衍生并加剧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甚至骗官杀官的“六官现象”!在“年龄缩水”、“文凭注水”的“两水”压力下,催生了一些“59 式”、“49 式”,甚至“39 式”、“29 式”的腐败干部,从而产生了危害最烈、群众意见最大的吏治腐败危险,还带来了“能力不足的危险”,出现不少“缺乏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的干部,出现了文化水平提高而“能力不足”和“本领恐慌”的问题。王稼祥 70 多年前就深刻指出:不能为了党员数量而降低党的质量、党的水平。假若为了党的数量而降低党的水平、党的质量,便是离开了列宁主义。

四是社会结构滞后。与经济发展相比,我国社会结构调整滞后,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既存在结构性失调和功能性失调问题,又有大量的历史遗留老问题和社会转型衍生的新问题,如社会体制陈旧,管理手段落后,社会组织建设迟滞,公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贫富差距拉大,

危机事件多发等等,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和社会运行迟滞,中国的社会稳定因为缺乏相应的道德元素、权利成分和清廉因子而有失去坚实的合法性基础的危险。2010年,中国社科院公布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政治结构落后于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多少年未讲),这是诸多社会矛盾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因而,我们在辉煌的“总量论”中应更加清醒和自觉,不能光以速度、规模、总量看次第,关键要从结构、内涵、战略上看质量。全面的结构改革和优化,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应对危机和风险的首要任务。

表现之三:权权交易成为和平时期危及党的先进性形象和执政地位的新型风险因素。在快速推进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五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建设过程中,受本土化传统思想文化糟粕的潜在感染,受国际化腐败现象的传导感染,受转型期制度体制机制的缺陷感染,腐败现象逐渐向“三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演变,腐败手段智能化、腐败形式隐秘化、腐败收益虚拟化的特征日趋明显。

一是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成为典型的腐败方式。权钱交易,即权钱互换的赤裸裸的现实性简单交易,是权力现值的交换体现,是一种典型的显性腐败现象。其手段和方式不断翻新:汽车、电脑等现代工具替代了电视、手机等传统工具;字画、古玩等艺术商品替代了烟酒、服装等传统物质;土地、矿产、股份、资本等要素资源替代了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源,等等。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变现性、“比价”性、一次性和风险性。权色交易,即权力与色欲、情感、信息等非物质形态的复杂交易,是权力期值的持续体现,是一种典型的隐性腐败现象。其形态由传统的男女“授受不亲”向嫖娼、一夜情、包二奶、敛资财兼收并蓄转变;由权力与款物、值卡等实体交易向权力与信息、股份等虚拟交易转变;由权钱两清的现值交易向权力即时支付、回报未来领取的期值交易转变;女色、业绩、情感等由自然属性向权力场上的市场特性转变。其特点是隐秘性、温和性、多次性、危害性。

二是权权交易成为一种亟待高度关注和科学应对的新型腐败方式。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由

于风险较大,易授人以柄,腐败分子也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实施权力与权力的隐性交易。这是权力借助虚拟手段无限放大并急剧升值的一种无形腐败现象。这种腐败现象不仅隐蔽性更强,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蜕变现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执行权领域的权权交易到决策权、监督权领域及其相互间的权权交易。其二,从经济、社会领域的权权交易到政治领域的权权交易。如在一些地方实际上形成了以“一把手”为主导的“管理层内部控制”问题,逐渐实现了对区域内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到政治资源的全面垄断和控制,“一把手”成为腐败的高发岗位。如河南省2006年换届以来,已查处担任过县委书记一职的高达22人。其三,从财权、物权的权权交易到干部人事权的权权交易。如张书记提拔李局长的原任秘书,李局长提拔张书记的儿子,形成“官选官、大官选小官”的“小圈子”。

三是权权交易的主要特征。与前两种交易形式相比,权权交易主要表现为一种以虚拟交易为手段,以更隐秘、更长远、更巩固的期权利益为目的的无形腐败,是腐败现象演变的第三个阶段,具有四大特征:其一是整合性。不同的权力“受托者”巧于权力资源的算计、运筹,实现权力之间的对接、整合,积聚、提升权力的内生价值,转化主要是无形权力的交换价值,以谋取其个人、家庭或利益集团的深层和长期利益需求。其二是集团性。通过构建经济、社会、文化尤其是政治利益纽带,借以形成巩固联盟或既得利益集团,逐渐实现从对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控制到对政治人控制的转变,从经济利益集团到政治利益集团的转变,以谋求未来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以“权力”为主导形成的“管理层内部控制”问题,从表面上看,出现了让人诟病的“官二代”、“知二代”、“艺二代”、“富二代”;从深层次上看,是造成一些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党群干群关系疏离,显性冲突和隐性暴力积聚的主要诱因。其三是无需变现性。权权交易主要表现为权力市场上的一种虚拟交易,无需变现,但一旦时机成熟,权力对接所实现的政治价值大大超过现值和一般期值,且具有发散性、膨胀性、选择性特点,以既得利益集团现有人员为骨干依托,有选择性地扩编收徒,不断强化政治上的依附性、组织上的紧密性和利益上

的虚拟性。其四是危险性。这种新型腐败形式借助权力的虚拟交易无限放大并急剧升值,对党和国家政权具有肢解性和动摇性,是一种隐秘性更强、危害性更烈、风险性更大的高级腐败方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与权权交易中所形成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有深刻关联,至今俄罗斯的相当核心权力仍然被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所把持。

“三权交易”是从简单到复杂、再到“管理层控制”的渐变性腐败交易;是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层面的递进式腐败交易;是从一次性、单对性、单层性到多次性、多人性、多层性的集约型腐败交易;是从经济腐败到生活腐化、再到政治蜕变及融三者于一身的复合性腐败交易;是从显性化、隐蔽化到期权化、虚拟化的智能化腐败交易;是从物质所有权的一次性交易到非物质使用权的多次性交易,再到彼此都拿不属于自己的标的物(权力)进行的瓦解性腐败交易。其隐蔽性越来越深,潜伏期越来越长,投机性越来越强,对政策法律的规避和肢解越来越大,社会危害性越来越烈。

表现之四:“消极腐败的危险”与“精神懈怠的危险”和“脱离群众的危险”相互交织和转化。

一是“精神懈怠的危险”加剧了“消极腐败的危险”。意识形态不仅是党和政府须臾不可离的一种执政资源,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整合力量。但是,意识形态的假面化、装饰化与实用化等倾向,导致了“精神懈怠的危险”,且“消极腐败的危险”与“精神懈怠的危险”相互影响,加剧了新时期的执政风险。强大的意识形态教化,严格的舆论言论管制,刚性的政治利益驱使,一些党员干部人格分裂,上级面前一套下级面前一套,会上一套会后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单位一套社会一套;有的单位学教活动缺乏主动性、主体性和实践性,学用脱节、知行分离,用自上而下的层层传达代替自下而上的主动参与,用个别领导人的主观性代替党员干部个人的主体性;有时理论研究和宣传缺乏原创性、现实感、思辨性,一味注重思想领域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垄断,以大一统思维控制思想文化领域的正常自由和争论,导致马列主义的教条化、垄断化、实用化倾向,形成“万马齐喑”甚至“听不到人民声音”的可怕局面;有的党内组织生活堂而皇之走过场,虚假思想、空头政治、照抄笔记、复制体会、表扬与自我表扬

大行其道,批评与自我批评乏善可陈,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双重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名实双亡,从而严重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是信用缺失、诚信危机现象较为严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1年2月27日与全国网友在线交流时强调,诚信和道德是现代社会的应该解决的紧迫问题。2011年4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对6744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2.4%的人感觉当前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度低,其中53.8%的人觉得互信度非常低。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工作机制在利益牵引和市场大潮的冲击下显得苍白无力,传统伦理道德被颠覆,社会互信不断消解,社会心理日益扭曲,公共责任和核心价值观缺失,特别是一些权力持有者缺乏高尚的道德支撑,缺乏内心敬畏的法律约束,加之纠偏机制的软弱、监督机制的脆弱、权利机制的薄弱,权力滥用、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反腐倡廉形势严峻,信仰危机趋深,动摇了社会根基和党的执政基础。

三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已经成为我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密切党群关系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和平时期党执政的最大的危险。列宁以伟大政治家的务实精神清醒地看到,无产阶级政党在其执政过程中,如果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来制订和执行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意愿、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人民支持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政权的“政治期票”就有到期的危险。当前,有的党员干部的作风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渐行渐远,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的作风与入党誓词和人民根本利益明显相悖,从而导致一些地方官场生态变异,政府公信力下降,党群干群关系显性冲突与隐性疏离,人心民心不断流失。据有关资料显示,“2006~2007年度我国政府公信力指数为60.6分”,“导致一些政府公信力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是主要的因素之一。

如果说,3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推动全局,在南海边上画了一个圈,作为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区。那么,30年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担任总书记九年的胡锦

论孔子的复活

○ 张绪山

一、孔子身后的荣辱沉浮

孔子生前是颇自负的，称“天生德于予”，“文王既歿，文不在兹乎”，以文王、周公的托命人自居，为复兴“周礼”而奔走呼号。然而，终其一生可谓壮志未酬，宏图未展，除去鲁国司寇位置上的短暂风光，几乎没有值得夸耀的政治阅历。去官之后，怀揣经国济世的政治理想，颠簸于列国之间，有时几乎饿扁肚子，其体肤之苦可以想见，然而，更大的痛苦恐怕还在于精神上：他以绝大的希望汲汲于兜售他那套治国方略，而屡屡受拒于诸国君主，直落得“惶惶如丧家之犬”。他政坛失意而转心于教化人才，虽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但对弟子们能否不折不扣地遵从其“道”，并无充分的信心，故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的怅然之叹。

然而，孔子生前始料未及的是，他所创立而由其徒子徒孙发展的学说，竟然被汉帝国政府接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全国民众唯一的指导思想。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即使雄才大略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自称“奉天承运”，文治武功超过前人，但都不敢以道统自任，自立思想流派。随着皇权专制制度的高歌猛进，孔子的学说竟成了帝王们用来钳制人们思想的最得力的工具，须臾不可缺少了。于是，孔子的身价也水涨船高般地升腾起来，除了木制或泥塑的替身以“万世师表”的教师爷身份端坐于文庙，接受醉心功名的书生们供奉的冷猪肉外，还受到各朝皇帝们的推崇。唐代时进爵“文宣王”，宋代时进至“至圣文宣王”，元代来自漠北的蛮族皇帝夺取了汉

家皇帝老儿的人肉宴席后，为了显示道统纯正，竟显得比汉家皇帝更加尊孔，给孔子奉上一顶“大成至圣文宣王”的显赫高帽，让孔子最终当起了冠冕堂皇、帝王气派俨然的“素王”来。

然而，自从习惯于以孔子学说教化蛮夷的“中央帝国”，被船坚炮利的近代西方“蛮夷”彻底击败后，儒家思想便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蔡元培、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一班不尊祖法、胆大包天、离经叛道的留洋学生们，借助西洋人的“异端邪说”，大兴问罪之师，口诛笔伐起来，“孔家店”不仅失去了往昔的耀眼光环与神圣之貌，而且成为新文化运动清算的对象。

五十多年过去之后，孔子的处境更加不妙，被与林彪捆绑在一起，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角之一，成了全中国人民妇孺皆知的“复辟狂”，千夫所指的“孔老二”。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一阵阵如火如荼的读经热与祭孔潮之后，引人瞩目的一幕出现了：2011 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整 100 年之后——的年初，一座高 9.5 米，重约 17 吨，凝聚着艺术家虔诚心和敬畏感的孔子雕像，巍峨地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虽说百日之后又被人悄然挪走，但以雕像形式堂而皇之地供人瞻仰，已足以向世人表明：孔子终于复活了！

二、关于孔子复活的问题

孔子雕像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公开亮相，使很多人处于亢奋状态。一时间，“孔子回来了”、“孔子思想高调复兴”、“传统回归”、“国学复兴”、“道德重振”，诸如此类的赞叹声不绝于耳。然而，我

涛同志，以“七一”重要讲话的形式，对“消极腐败的危险”给予了高度重视，并首次对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进行了新的深刻阐述，为反腐倡廉的“顶

层设计”与改革党内“权力结构”，指明了方向——即必须尽快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责任编辑 萧 徐）



“文革”中孔府“大成门”的匾额正被砸毁

认为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

问题是：孔子学说乃至整个儒家学说是否可视之为当下公民社会建设关键时期的治世良方？是否有助于民主与宪政的建立？我们知道，孔子的学说乃与前现代的社会制度相适应，是传统农本社会的产物，是为皇权专制制度服务的意识形态，其政治伦理与现代社会政治伦理的对立是公认的事实。陈独秀说“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又说：“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伦理学说……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再答俞颂华》）李大钊明确表示：“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之本身……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换言之，在现代民主制度建立以前，尊孔读经意味着固守前现代的政治伦理，使现代政治民主面临更

多的阻力。

“权力为恶”既是几千年人类面对的最大的政治问题之一，也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变过程中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宪政民主绕不过去的根本问题。现代新儒家力图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变”，希望从“内圣外王”的传统伦理中开出宪政民主的新途径，并为此进行了许多探讨，但皆因前提存在根本性错误而难得正鹄。儒家学说的起点是“人性善”，儒家训导君王施行“仁政”，都是以“人性善”这个前提展开。但现在人们都承认，人性并非总是向善，从根本上讲，人类“半是天使、半是野兽”的观念才合乎实际。比较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对权力为恶的制度防范，儒家政治伦理缺乏以“制恶”为前提而展开的制度建设的设想，乃是至为显然的大缺陷。儒家设想君王能以“德性”克制其欲望，是过于一厢情愿的设想，因为君王乃至一切掌握权力者，都不能完全摆脱“半是野兽”的本质，尤其是皇帝，尽管他们自诩为“德善”天子，但在掌握至上权力的情况下，乃是天底下最易腐败的分子。两千余年中，皇权专制君主们暴戾恣睢，为所欲为，

恶政、暴政代代而有。对于这一点，后来的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宋代的大儒朱熹明确指出：“（从孔子算起）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这可是实话。实际上，不仅朱熹以前的一千五百年孔子的学说未见实行，就是此后一千年间也未尝一日得到实现。以孔子及儒家的“性善论”为依托的“天王圣明观”与“权力神圣论”等观念，从根本上遏制了“权力腐败”观念的产生，使人无法认清权力的腐败本性，不可能确立“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权力观念，其结果是，以“制恶”为本质特征的宪政民主失去了立论的逻辑前提。

孔子及儒家主张“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积极的入世观念，于政治家而言，它意味放任无道之世的肆虐，而仅仅守住“独善其身”的底线；但在芸芸众生而言，生活于“道不行”的世道，尤其是在暴君率兽食人的乱世，则意味着毫无选择地在水深火热之听天由命、任人宰割，因为没有“乘桴浮于海”的可能。孔

子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虽有反对越权胡乱干政的含义，但于普通民众而言，则意味着与国家政治的绝缘。历代书生言政被视为大忌，遭到严惩甚至诛杀，清楚地向世人表明，政治乃权力集团的独享之物；公共场贴出的“莫谈国事”的警示，以及当代人们记忆犹新的“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的说法，都说明政治的封闭性与垄断性。孔子又谓：“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确立民众服从权威的同时，更将民众对权威质疑与不满的权利尽数遏制。儒家学说将民众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与“主权在民”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驰。

比较西洋诸贤的民主学说与当今的民主理论，儒家学说的缺陷不言自明。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自然应放眼四海，对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遗产，兼收并蓄，采取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近代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相号召，发起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伦理已近一个世纪，而一些所谓“文化人”仍停留在偶像崇拜阶段，与皇权社会的臣民一般无二，骨子里仍是皇权社会里的帝王意识，岂非怪事！

三、孔子的复活无力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目下的中国在观念、价值层面似乎面临两大要务：一是对外推广中国软实力，二是对内重树道德、澄清官场腐败，许多人强调孔子复活的意义，多半集中于这两个方面。

三十年改革开放无疑已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尤其是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表现，让全世界见识了中国智慧。在目下的一些人看来，中国迫切需要一位形象代言人，证明这种“中国模式”或“中国特色”的真实存在，以及支撑其存在的背后力量，让西洋人认识到，中国可以不需要他们鼓吹的普世价值，照样可以做出不凡的成就。可惜的是，目下我族还缺少拿得出手的东西，寻来寻去，似乎只有旧货色可以利用，于是孔子再次成为选择的目标。

问题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潮流中，孔子及儒家思想真能超越现代世界潮流中的主流价值观，助我拓展国家软实力，展示我盛世之雄姿吗？

孔子的学说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现世主义的人生信仰。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等等，展现的正是这样的俗世理念与信仰；二是以“仁”为核心的“泛爱”道德观；三是以等级制度为核心、以“礼制秩序”为集中体现的国家政治伦理。在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儒家的“等级观念”与权力结合，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利器。

从学说体系上，孔子的学说由“礼”“仁”构成，孔子重视“仁”，希望通过“礼”来实现“仁”，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孔子关于“礼”的主张，目标是“正名分”，确立君臣、父子、夫妇、男女、长幼之序，尊卑、贵贱之序。所谓“贵贱不愆，所谓度也……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正是其核心观念。然而，应该明白，孔子及儒家主张的这套以“尊卑贵贱、男女有别、长幼有序”为特征的等级制度，乃是前现代社会（即农本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以人格不平等为其特征的；在崇尚个人主义和人格平等的现代民主社会，民众根本不可能青睐这种等级理念。无论我们以何种形式送去，都是人们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现代民主社会所能接受的只能是以“仁者爱人”、“泛爱众”的“仁学”学说。

然而，在已经习惯于基督教理念的现代西方社会，“自由、平等、博爱”已是整个社会妇孺皆知的基本理念。基督教的“博爱”理念强调“己所欲，施于人”，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为一体两面的同源体。在“博爱”理念面前，孔子的“仁爱”思想算不得新颖的思想。对孔子代表的儒家学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看法颇具代表性，他说：“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引者），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那里都找得到，在那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些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会获得什么特殊的東西。”（《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1959年，第119页）中国思想家也有相似的认识。陈独秀说：“儒教经汉、宋两代之进化，明定纲常之条目，始成一有完全统系之伦理学说。斯乃孔教之特色，中国独有之文明也。若夫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

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遵，未可自矜特异，独标一宗者也。使今犹在闭关时代，而无西洋独立平等之人权说以相较，必无人能议孔教之非。”（《宪法与孔教》）中外学者两两相对，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可见儒家学说中区别于近代西洋政治伦理的，是其等级学说，而非其“仁学”思想；更何况，儒家“仁学”强调“爱有等差”，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在本质上已经逊色于基督教“博爱”精神所强调的人类“平等之爱”。

近代西方文明优越于传统中华文明者，实在民主与科学两端。近代世界之社会改造大潮流表现出三个显著特征，即：经济层面上，实现以商品经济为核心的开放性的市场经济；政治制度上，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制度；思想文化上，建立科学思维。我国近三十年改革开放最大成就，是摆脱了此前三十年乌托邦理想对市场经济的敌视观念，确立了对开放的市场经济必要性的正确认识，并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在这个层面上，我族已取得显著成就并为世界各国所公认。然而，在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科学思维层面，则仍然处在任重道远的奋斗阶段。可以断言，除非我们建立起完备的现代民主制度，高度发达的科学思维伦理，则任何“送出去”的东西的“软实力”都会大打折扣。

三十年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变化中，负面的后果就是欲望横流。有的人甚至断称，从道德层面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一班所谓的“国学家”看来，这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病局，都是礼崩乐坏造成的结果，只有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携其治国方案重回华夏大地，才能挽狂澜，拯救被资本主义拜金热摧毁的传统道德，重现我族高尚的道德灵魂。所谓“儒学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儒学代表了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儒家思想挽救滑坡的道德”等等观点，以及近年来日渐高涨的读经热和祭孔潮，都是基于这种思维。

以道德挽救道德，一直是我族的传统思维定式。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话出自儒家弟子之口，自然不难理解，因为他们的政治设计就是以道德力量来匡正社会，惩恶扬善。不过，一套二十四史让人看到的，并不是“乱臣贼子”在《春秋》大义面前心惊胆颤、瑟瑟发抖，

而是乱臣贼子为私欲驱使一往无前，前赴后继。然而，从孔子开始，每当“礼崩乐坏”之际，往往就有人为恢复所谓“三代”完美之制奔走呼号。这已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现象。“文革”时期盛行“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刹那”、“灵魂深处闹革命”，以现代条件下的“思想制胜”手法将儒家的“修身”传统推向极端。目下将孔子复活视为拯救道德沦落的救命稻草，显然是渊源有自，一以贯之。

但问题是，孔子及儒家思想真有重树道德、澄清吏治的奇妙功效吗？

治病需对症下药。欲治当下道德败坏、吏治腐败之疾，须知病根何在。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效的劝善道德伦理以及实在的道德榜样；一是有效而健全的高度灵敏的惩恶法制机制。这两者相比较，后者更重要。当一个社会过度重视道德教化，而没有切实可行的惩恶法治体系时，其结果必然是，恶性得不到遏制，道德教化沦为虚伪的说教，整个社会陷于普遍的虚伪。因此，挽救当今社会道德堕落和吏治的腐败，一是要有保护善行的健全的社会机制，二是以强有力的法治措施遏制恶行。二者缺一不可。从本性上，人易于为恶，难于向善，古谚“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对权力恶行的及时惩治尤为重要，乃是道德改良、吏治澄清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揆诸当今吏治，人们看到的是令人心寒的事实。首先，名为主人的民众在自称“公仆”的权力控制者眼前，仍然是皇权时代卑微的“草民”。这一事实并不因为宣传机器对所谓“主人翁”天花乱坠的廉价赞辞而有所改变。名义上的“主人翁”的这种“草民”本质，在掌权者的“下意识”的话语中不断暴露出来，如不久前有高官气壮如牛地直斥民众“算个屁”，而今又有高官放言：“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此均为官员之真实心态，不可简单地以戏言视之。其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虽写入宪法，但人们看到的却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现代翻版。普通百姓小偷小摸十几万元，就可能被处以极刑，而高官将数千万乃至数亿国民财富攘入囊中，多数仅判处“死缓”，然后再转入有限度地逍遥。第三，高尚的道德说教比比皆是，但善行却得不到有力的呵护。“钓鱼执法”所体现的“有罪推

定”对公民的向善心是毁灭性的打击；而法院判决中对助人者遭受诉讼时提出的“与你无关为何助人”的质问及有罪判决，使人相信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善行，也不应对他人的善行。“让领导先走”、“让领导先飞”等诸如此类的“让领导先X”，已经让整个社会真切地认识了“权力优先”的事实，在“权力优先”面前，“美德优先”、“善行优先”已经失去其本应有的道德感召力量。

与此相应的是，恶行大行其道而得不到有效惩治。野蛮拆迁层出不穷、肆无忌惮，卑微民众呼天抢地的哀求，在冷酷的权力面前竟是那样的柔弱无力；一度盛行的“恶意上访”的官方界定，展示的是寻常民众必须面对的权力恐怖；“包二奶”的官员数量之多，用“过江之鲫”来形容已不过分，以权谋色已经成为一种官场风气，似乎成为官员“事业成功”背后的应有之义。“升官发财”的旧传统以新的形式展现出超过以往的活力。

在权力居于社会中心、政(治)教(化)合一的中国社会，权力控制者的思想作为对社会风气的

演变具有决定影响。有人说官场上并非人人作恶，但我们要知道，政(治)教(化)合一的社会，部分官员的恶行就足以摧毁整个社会对美德与正义的信仰。在公平与正义被无情践踏的社会氛围中，即使是真正的道德高尚者都难以唤起人们对善行的信仰，更何况伪善者的言不由衷、巧言令色。

两千余年前，孔子以复活周礼的手段挽救社会的“礼崩乐坏”，最终无功而返；此后的历史也证明，道德呼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道德堕落与吏治腐败。既然孔子的说教不为那些“公仆们”所接受，又怎能指望民众天真地接受？政治民主化与法治建设的严重滞后，是造成吏治腐败、人心堕落与社会风气恶化的关键；于此情势中，不去民主制度的建设中寻求解决之道，而乞灵于两千余年前的孔子及儒家思想，在道德教化中绕圈子，岂非误入歧途？■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上接27页)而是由一个人来裁决，真理变成了一个人的专利品，这才是危险所在。

九亿人的国，真理只能由一人定，这不是咄咄怪事！

造出来的真理是赝品，是不受用的！

3·25

我们党的事业成为个人的资本，把整个党的事业攥为己有，闹成夫妻店、家天下，主席变成了党王。

看来三千(年)来帝王思想是多么的深呀。深到了自称为马列的血液中。说别人搞什么王朝，看看自己搞的真正的王朝吧。打着反王朝搞王朝，这是又一大发明！

4·8

……

二、这条路线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生产上不去，物价上涨，生活下降，工资如此之低，引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满，这是产生这次运动的经济基础。只要这一条改不了，人民不满情绪就只能上升，决不会下降。在高压之下的低潮里，人们心中的怒火会越来越盛。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三、毫无道理地随便打倒人，把一切功劳归

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不平则鸣吗！所谓路线，那不过是自己的意志而已。为了打倒某些人，不惜党的事业，说的比国民党还坏。为了保自己不准人说一点小疵。

四、党已经变成自己的私产，口口声声用人唯贤而干的则是家天下，帝王行为，这是吃了二三十年封建苦头中国人所不能接受、所不能允许的！

五、民主集中制已根本不存在，“唯余一人”。口口声声无产阶级专政，实则是专无产阶级的政，是一人一家的专政，一帮亲人集团的专政。谁敢说半个不字，就有人头落地的危险。九亿人口要围着一个人的舌头转，哪里有什么民主集中制？

我并不完全否定毛泽东，就其才干和气魄而言，可能是千古一人，是一份有分量的遗产。但在1949年以后，他领错了路。应该把毛泽东还给历史，让他成为历史认识的对象！上个世纪80年代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史家面前无定论》，一篇是《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我现在依然感到这仍是历史认识中的大问题。■

(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我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 口述 艾玲 整理 洪小文

《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刊登《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一文,里面提到“《文汇报》为此印的白头《文汇报情况》,由张春桥直送江青,报给毛泽东。负责搜集情况的是《文汇报》北京记者站的负责人艾玲。为此张春桥还讲过,艾玲对批《海瑞罢官》是有功的。所以‘文革’中张春桥保过艾玲”。艾玲是1936年在广州参加革命,1939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从1958年至“文革”初期,一直担任上海《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2007年3月7日在广州病逝。2006年3~4月间,艾玲曾向笔者口述过她在“文革”期间的经历,现将整理文字摘录如下。

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上海《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当时习惯简称“北办”,下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采访、收集北京理论学术、文艺及教育界的动态和意见,汇总报给在上海的报社,供市领导参考。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在前一天,《文汇报》副总编辑陆灏给我打电话告之:“明天将要发表一篇大的文章,是一个叫姚文元的写的,你们‘北办’在文章见报后就出动,收集一下有关人士对此文的反映,”还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上海市委让《文汇报》刊登的,但对外不能说,只能说是姚文元向《文汇报》投的稿……”。

该文见报后,“北办”即出动人员采访了有关部委和领导。我和记者李根第去采访了吴晗。吴晗对姚的文章很生气,说《海瑞罢官》不是他要写的,是毛主席叫写的。《人民日报》的同志普遍反映是不同意姚的文章,王若水就向我表示很反感。李希凡说,江青原来叫他写这篇文章,他表示自己是搞《红楼梦》研究的,对海瑞了解不多,江

青就说那让别人来写。

我熟悉的一些老领导、老同志以及一些知名人士,在对待批判《海瑞罢官》究竟是“学术研究”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的问题上,观点认识不尽相同。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赞同批判《海瑞罢官》的是左派,不赞同的是右派”。对社会上的反映,我们没有把它看得很严重,因为当时中央并未有任何文件明确表态。“北办”在正常的工作职能范围内,把这些情况反映汇总上报给上海《文汇报》编辑部。至于编辑部把“北办”上报的情况如何处理,是以《文汇报情况》还是以《记者简报》形式上报上海市委,我和“北办”是不知道的,也不会去打听。那时,“北办”每天都有一个邮包装上我们手写的情况汇报,通过民航班机送往上海。报社有什么文件也通过这个邮包给“北办”。后来听说,毛泽东、江青在上海很重视“北办”的汇报,每天就等着邮包一到就取去看,了解北京的情况。报社领导对我说:“北办”的工作是得到肯定的,是在为党工作,你们采访的情况,毛主席都看过了。为此,“北办”上上下下都感到很荣幸。

当时,“北办”负责与《红旗》杂志联系的记者是李根第,我在他采写的情况汇报中,发现关锋、戚本禹,还有学部的尹达,是支持姚文元文章的少数几个人,就把他们的观点编入了给上海的报告之中。一天,陆灏电话通知我,设法把关锋、戚本禹二人秘密安排到上海。行动要绝对保密,不能让中宣部知道,也不能让“北办”的其他人知道,总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亲自通知了关、戚二人后,关锋就向《红旗》杂志社假称父亲病重,要请假回老家,戚本禹也向单位请了假。为了掩人耳目,我不能用“北办”的车,又不便借用其他单位的车。想来想去,只好向在军委机关工作的丈夫求助,请他派部队的车子送关、戚两人去机

场。那时正值冬天,我在半夜出发,乘坐军车悄悄开到关、戚家的附近等候。由于怕被人看见,还不敢直接开到他们的家门口。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关、戚二人分别来到与我接上头,就直奔首都机场。他们乘第一趟飞往上海的航班离开了北京。我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任务。事后,陆灏还表扬我这件事办得好,干净利落。当时,关、戚两人去上海干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陆灏会去接机。后来,听说关、戚二人在上海见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还参加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会。后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关、戚都是小组成员,成了红极一时的中央首长。



1967年,艾玲在《文汇报》社门前

1966年6月,《文汇报》

社内部开始贴大字报,批判报社领导。不久,我和“北办”的主要工作人员被责令返回上海参加报社的运动。我与编委其他成员一起被大字报点名,戴上了“走资派”、“资产阶级黑线人物”的帽子。大字报铺天盖地,就连我那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宿舍,从四面墙壁到天花板,甚至小小的单人床头、床侧都贴满了大字报,折磨得人寝食难安。我被揪斗时,人群鼎沸,口号声喊个不停。1966年11月8日,我和报社几个编委被正式宣布停职接受审查。

经过九个月的批斗审查,一天,造反派副司令来找我,说关锋、戚本禹来上海了,要解放你。当时我没有听说张春桥要保我。1967年3月25日,《文汇报》革命委员会成立,我作为老干部结合进领导班子,担任了革命委员会主任,又当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不久,我感到与造反派很难合作,而且家又在北京,自己仍兼任“北办”主任,于是又回到了北京。报社的实际工作由邵传烈等人负责。

1968年7月1日晚,我代表“北办”到人民大会堂观看庆祝中共成立47周年文艺晚会,主要节目是钢琴伴唱《红灯记》。我进入会场刚在后排坐下,就听到广播里喊:“京办的艾玲同志请到前面来。”我听成是“军办”的,就坐着没有动。一会儿,一个男同志(后来知道是江青的秘书)来找到我,说叫你到前面去怎么还不去?我说是叫军办的,不是我。他说:就是叫你,快走!我跟着他到了前排,江青见了我就跟我握手,说“谢谢你了,艾玲同志。”接着把我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说:“辛苦了,艾玲同志。”这时,周恩来也过来跟我打招呼。我想应该是“北办”的情况汇报,中央领导都看过了,也许还知道曾经由我安排关锋、

戚本禹二人到上海,所以才有这么一幕。

1968年11月7日,“北办”奉命停止业务活动,我和“北办”的全体人员通通被调回上海,去上海柴油机厂劳动和调查近一年之久。1969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我是中共“九大”代表,我十分惊讶,自认为不可能。但负责通知的人说是上面指定的,是什么人指定的他也没说。在“九大”期间,我被编在上海知识分子小组,还让我当了副组长(组长是同济大学造反派陈敢峰)。因为我是报社的,陈敢峰就让我负责整理小组讨论的简报。“九大”结束返沪后,我又回到了上海柴油机厂,直到1969年10月,我奉命回报社主持工作。

1970年夏庐山会议后,中央部署批陈整风运动,军队高层与上海帮的关系日益紧张。我当时是不可能了解的,也没有这方面的敏感。1971年1月,在上海召开党代会期间,一次因大会时间长,中午无法赶回报社吃午饭,报社的军代表好意劝我就近到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食堂吃午



艾玲(中)与本文整理者洪小文(右)合影

饭,我便与军代表一起去了。中午,招待所食堂人较多,我们两人还是排队买的饭菜。吃饭时,我们那张小饭桌上,就我和军代表两人,没有第三者。匆匆吃完午饭,又赶回去开党代会了。后来,此事被人传言成我和驻沪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一起吃饭,还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其实我根本不认识王维国。但是,由此捕风捉影说我与空四军挂上了钩,继而竟推论是与林彪集团挂上了钩。于是,张春桥下令将我逮捕。

1971年3月23日午夜12时,徐景贤的秘书到我办公室说:“艾玲和军代表、工宣队代表三人立即去市委开紧急会议。”于是我们即去康平路市委大楼。进到会议厅,只见王洪文、徐景贤紧绷着脸,坐在正中沙发上,四周是挎枪站立的军人。王洪文慢条斯理地说:“你的问题拖了很久了,到现在才解决。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要交代和陈伯达的问题。”我当时就抢着说:“我不认识陈伯达”。王洪文凶恶地马上制止我说:“这样吧,你拿些衣服,到个清静的地方去好好考虑交代问题。”我气愤地说:“不去!我没有做错过什么,为什么抓我?我的一些情况,以前曾跟徐景贤谈过,他了解《文汇报》的情况。”我顺势看了一眼徐景贤,希望他能实事求是说几句话。但是徐景贤装着没听见,一声不哼。王洪文讲完话后,对一名军人点头示意了一下。随后过来两

个全副武装的军人,一边一个架着我的胳膊,连拉带拽地把我架到门外,推搡着进了一辆早就准备好的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我感到时间过的很慢,当突然听到刺耳的刹车声时,吉普车戛然而止。我被从车上揪了下来,带到一间阴暗且仅够比放下一张单人床略大的小屋子里,便开始强行搜身。看守人员凶巴巴地说:“以后你就叫‘203号’”。我才明白,牢狱苦难降临了。第二天一大早,一支近20人的专案组前来提审,为首的专案组长高声宣读了对我进行专案审查的决定,然后反复逼供我与林彪、陈伯达、王维国的关系。开始每周来几次,以后则半个月、一个月来一次,最后索性半年、一年都几乎不来一次。与此同时,我的老伴受到株连被关押审查,6个子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

1975年6月,专案组长拿着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的批示:“艾玲顽固不交代,到五七干校边劳动边交代”,命令我去干校。后来报社的同志同情我,给我办了医生证明,说我有肺炎,才免于去干校,也结束了长达4年多的囚禁。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组织部责成上海市委对我被“四人帮”迫害关押问题进行清理审查。审查过程中,对我蒙冤入狱予以平反没有什么障碍,但是对我在“文革”初期的表现和为什么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和中共“九大”代表的问题纠缠了很久。一直到了1979年12月,才给我作平反结论,里面还有一句:“犯了路线错误”。我拒绝在结论上签名。我的回答是:我搞的情况汇报,毛主席也看了,我不同意说那是江青背着毛主席搞的。如果毛主席错了,我就错了!最终,给我做出的正式组织结论删去了“犯了路线错误”那句话,对强加于我的所有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恢复名誉,予以平反。我于1981年恢复工作,任《中国日报》社编委、社委兼办公室主任。1984年离休,在广州老家定居。■

(责任编辑 徐庆全)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我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

○ 口述 朱锡琪 访谈 金光耀 金大陆 整理 孙路遥

“文革”开始时我是上海《文汇报》教科部体育组的记者。

我原是上海市建工局属下一个业余学校的教师，共产党员。1960年柯庆施提出文化单位里面要“掺沙子”，我被选进了报刊编辑训练班。训练班结束后，被分配到《文汇报》社。1967年1月初，我、邵传烈、周国荣为负责人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社。到2月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我被推为“公社”的政宣组长，2月下旬“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成了市革委会政宣组长，并成了市革委会的核心成员。那时张春桥、姚文元常在兴国宾馆召集市革委会核心成员开会，用张春桥的话就是“开小会”，参加者除了张、姚外，有王少庸、马天水（被解放后）、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和我，共八个人，做记录的是朱玉佩，她不参与讨论。这样的小会一般一两个月开一次，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小会上先讲。

“文革”初期没有接近张春桥前，我对张春桥是很信任的，怎么会不信任呢？他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但参加这个小会接近张春桥后我慢慢地识得庐山真面目了，这就有了1968年的“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

张春桥与廖政国的矛盾

1967年初夏的一天，张春桥叫我去了解一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反军管”是怎么一回事，我就叫了一个记者去了解，原来“反军管”是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点的火。既然“反军管”是他点的火，我就不需要向他汇报了。后来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几天后，上海出现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红色造反纵队）贴出的标语“揪出上海的陈再道”。我在两个地方看到过这条标语，一个是北京

东路2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对面的墙上，另一个是外滩市革委会大楼对面。对“红纵”的标语响应的人很少。过了一些日子，王、关、戚倒台了，揪军内一小撮就是反革命，于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有意见了，写了个报告给张春桥，要求给电台的造反派和二军大“红纵”办学习班。张春桥就在市革委会核心成员的小会上讲：“廖政国要给他们办学习班，他自己也有错的。”二军大“红纵”的对立面“红旗”（红旗战斗兵团）获悉廖政国的要求没有得到张春桥的批准后十分气愤，一百多人来到康平路静坐整整一个通宵，抗议张春桥，要张当面回答“揪军内一小撮”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其他人敢叫张春桥当面回答吗？当然不敢。为了这件事张春桥气得不得了。稍后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的一次全市群众组织会议上，会议快结束时，张春桥用铅笔敲着桌子，面孔铁青地站起来说：“你不要以为后台硬，我有这个（指着身上军装的领章）呢！你不承认我这个政委（当时张春桥已经是上海警备区的第一政委了），我还有毛主席支持呢！”这件事使我知道张春桥和廖政国是对头，廖政国做什么事情他都不会同意。二军大两个群众组织，廖政国是支持“红旗”的，张春桥支持“红纵”，“红纵”是上海市革委会成立时的发起单位之一。

1968年春节前，我参加市革委会拥军爱民慰问团，去长兴岛慰问部队。那天我原来是要住在那里的，但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给我打了个电话，叫我马上回市区，说张春桥要开小会。为此专门让部队派了水陆两栖登陆艇将我一个人从长兴岛接到吴淞码头，兴国宾馆派来的汽车已经等在那里。我到兴国宾馆时已是华灯初上，走进宾馆一看，好像不是开会，台子上摆的都是小菜。张春桥说，春节到了，大家随便聚聚，其实就是他请我们吃饭。请的全是参加小会的人，一个都没有

缺,包括朱玉佩也在。我不会喝酒,徐景贤、朱玉佩、马天水也不会。王洪文的酒量是第一等的,王承龙、王少庸也会喝,张春桥酒量很好,但他能控制住自己,不多喝。张春桥叫他的秘书何秀文将茅台酒拿出来,他的茅台酒是藏起来的,平时不喝的。王洪文喜欢喝酒,喝了几口后就跟王承龙猜拳助兴,他们两人的脸都红了。

这时张春桥开口了,他说昨天我们在市革委会礼堂开过拥军爱民的大会了。那天大会我也坐主席台上,张春桥坐在主席台中间,他右边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廖政国是独臂,只有左手。会议结束时,大家高呼口号,张春桥的右手与廖政国的左手握在一起举起来喊口号,表示军民团结。那天晚上张春桥说,“这个会我们已经开过了,开是开了,人家是不是拥护我们啊?”张春桥这么一问,大家都明白他的意思了。王洪文马上说:“廖政国是铁杆啊!”就是说廖政国是保陈丕显的铁杆,他将陈丕显保护在青浦县的军营里,不让人家批斗,在警备区的内部会议上还叫陈丕显坐在主席台上,说他还是警备区政委,保陈丕显保到这种地步。王洪文还说,部队到公安局支左,公安局里也全部支持老保。张春桥接着说:“我们头脑要清醒点,我们手拉手拥军爱民,最担心的就是部队不站在我们这一边。你们不要学王、关、戚,他们在报纸上公开‘揪军内一小撮’犯了错误。部队里的事情要端出来,只能自上而下,廖政国的问题总归会解决的,要相信党。”张春桥这是跟我们通气,告诉我们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有问题。当时我听了这些话很气愤,张春桥在大会上与廖政国两个人举起手来拥军爱民,暗地里却要把他揪出来,这不是两面派嘛。这一看法的产生与我后来参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有很大关系。

《文汇报》“北办”传来反张风声

1968年春天,我们报社驻北京办事处“北办”的两个同志,不断地写条子来说,《文汇报》要转转风向了,不要批极左了,现在的形势是批极



中共“十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和江青在主席台

右了。当时我们的报纸都在批判造反派中的派性、山头主义,写了不少社论。“北办”这么说,我们就想,怎么突然之间要开始反右了?我们戏称这是十二道金牌。于是周国荣编了一整版关于反右的毛主席语录,去给张春桥审查,张春桥看了后不同意,结果也就没有登出来。

之后在一次小会上,徐景贤发言,他这个人说话有条有理,他对我说:你们《文汇报》周国荣最近跟“北办”打得火热,老朱你怎样看啊?我说不知道有这件事。张春桥接着说,《文汇报》有成绩,但不要自满,要当心摔跟头。张春桥这样说我事情好像很严重了,会后我就问周国荣你是不是跟“北办”的同志很热络?怎么徐景贤也讲这事了。周国荣就说这件事肯定是有人去向徐景贤汇报了。我想这只是周国荣的猜想,就直接给“北办”的周俊全打电话,他外号是周大炮,有什么事情都瞒不住的。周俊全在电话中说:“反右倾你们要好好搞,啥道理你们到现在还不行动?”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上海出问题了,你说清楚,不要这么吞吞吐吐的。他一下子压低声音说:“老朱啊,我老实跟你讲,康生那里有个张春桥专案组,你知道吗?外面传说很多,不过你不要跟其他人乱说。”我说:“周大炮你怎么越讲越糊涂了,你好好说,他们清查出張春桥什么问题吗?”他说:“对不起,我再讲下去就要犯错误了。”我一听很生气,就说:“叫艾玲听电话!”艾玲是《文汇报》“北办”的负责人,我就直接问她张春桥究竟有什么问题?结果艾玲回答得很有意思:“对于张春桥

的问题,在中央还没表态之前,现在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一听艾玲的话不就是说张春桥有问题嘛,而且问题还不小,要等中央表态呢。与“北办”通话后,我就与邵传烈和周国荣讨论艾玲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最终觉得张春桥还是有问题的。

4月1日(也许是3月31日),二军大“红旗”在市革委会门口、康平路、南京西路成都路口的长征医院贴出大字横幅,要“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大家心里明白,在上海贴这样的横幅当然是指张春桥,但是没点他名,这是从“一·二八”炮打事件得出的经验,用正面的口号,不让他抓到把柄。第二天,我看到横幅下面出现了一行毛笔写的小字:“炮打中央文革的人绝没有好下场!”是二军大“红纵”写的。又过了一天,下面又多了一行小字:“请长期保留”,是“红旗”写的。

二军大“红旗”的标语出来后,市革委会坐不住了,4月3日(或4日)在延安西路200号文艺会堂开了一个全市群众组织大会,马天水、王承龙在会上点名批评二军大“红旗”,说“你要跳出来,就让你跳出来好了,相信全市革命群众组织是不会支持你的。”那次会王洪文好像也来的。邵传烈参加大会后坐不住了,按照市革委会的精神连夜组织稿子,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不指名地批判二军大“红旗”在制造政治谣言,写好后发表在4月5日的《文汇报》上。

过了几天,我记得是4月9日,这天上午是市革委会例行的碰头会,在市革委会的长型会议室,参加者有平时参加小会的张春桥、徐景贤、马天水、王承龙、王少庸、王洪文、我和做记录的朱玉佩,姚文元不在上海,还有驻沪三军的廖政国、姬应伍、高志荣。廖政国坐在会议室的西端,大家都先到了在等张春桥,张春桥从会议室的东门进入,一看廖政国坐在那里,还没宣布开会,就先开腔了:“你们警备区要做做工作,二军大‘红旗’到处都保,有保对的,也有保错的,二军大‘红纵’是到处冲,有冲对的,也有冲错的,因此你们要做做工作,让这两个组织坐下来谈谈。”廖政国一听,当场发问了:“什么冲对冲错的,你说说哪一个是冲对的?”张春桥看他这么问,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对马天水等说你们不要保我,因为马天水、王承龙已经表态保他了,张还说《文汇报》也不要

保我,因为4月5日邵传烈写的“编者按”是保他的,他说“我又不是曹荻秋,要人保干什么?”张春桥的口气就是这样。但讲归讲,其实他还是要人保的。他还说这件事惊动了总理,昨天有人到二军大去冲“红旗”,总理昨天晚上打电话来问我这件事。我听了感到很奇怪,总理日理万机,一个群众组织受到了冲击,在“文革”中是家常便饭,又不是很严重,总理怎么会知道的?我认为二军大里肯定有人往上面报了,不然总理怎么会当天晚上就知道呢。

我回报社后就叫跑医疗卫生界的记者郑重去调查二军大“红旗”里到底有些什么人。郑重回来后告诉我,总理有个养女在二军大“红旗”,但不知道在哪个年级哪个班,只是听他们学校的人这么说。我觉得这完全有可能,否则总理怎么能这么快知道呢。我直接的感觉是总理好像站在二军大“红旗”这边。还有当时我从红卫兵小报如《新北大》上看到总理和江青有讲话,说右倾翻案风全国各地都有一点,可以大胆怀疑,怀疑错了改正就是了。还看到总理讲过上海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一切都好,我把总理这句话抄在笔记本上。我的笔记本里还有一段江青的话“上海搞大联合是对的,但是上海搞无条件大联合,北京不是这样,北京是在革命的基础上搞大联合。”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是话里有话,实际上是批评上海的无条件大联合。因为上海《文汇报》在1967年9月25日发表过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提出搞无条件大联合。据说是毛主席到上海来的时候找交大红卫兵杨小兵,杨小兵谈了我们搞大联合要哪些条件,毛主席就说:“你们不要搞条件嘛,搞无条件大联合!”这个意思当然是对的,但张春桥和徐景贤就把这个登在报纸上,说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毛主席要我们搞无条件大联合。这就涉及哲学问题,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条件的,不可能没有条件。这个最新指示全国其他地方没有转载过,后来《人民日报》10月8日的一篇社论悄悄地改了这段最新指示。这也是“四一二”事件中我们反对张春桥的一条重要依据,那就是篡改毛主席最新指示,没有经过毛主席审查就私自登出来,造成了原则性错误。后来我们反对张春桥的“十个为什么”里面就有一条,要听从毛主席最新指示,实现革命基础上的大联合。

我写了反张传单

4月8日,我在文化广场参加“积代会”,当时王洪文讲话我没听,坐在主席台上写传单,所以后来有人说我是两面派,一边在开会,一边在写反对张春桥的口号。我一共写了十句口号,写的时候确定不直接点张春桥的名,这也是从“一·二八”事件中汲取的经验,但是要让上海广大军民一看就知道我们在反对张春桥。会后我将这些口号给周国荣、邵传烈看,周国荣说:“你这个战斗队的名字很怪,怎么叫‘为什么战斗队’?”我说,这是毛主席讲的,每个共产党员做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我们这个口号就是提出问题,问几个为什么,让大家来回答,我们自己不要回答。后来周国荣将这十条口号给报社同志看,有个夜班编辑叫刘文锋,是复旦毕业的,加了一句:揪出大叛徒!我马上想到,我怎么连这么大一件事都没写上去。这也说明当时我想到的张春桥的问题就是揪军内一小撮,他与廖政国的矛盾,他一门心思要打倒廖政国,而毛主席定下的政策是“揪军内一小撮就是反革命”,但张春桥阳奉阴违,这是他的第一条罪行。第二条是篡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事,这在我们看来也是很严重的事情。第三是叛徒问题。“一·二八”炮打张春桥时就有传说,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说用党性保证张春桥是叛徒。我当时还不相信,因为他没坐过牢。后来听“北办”同志说,康生那里有张春桥的专案组,虽然我们当时不知道具体内容。而且社会上还传张春桥曾化名狄克反对过鲁迅,那也是可上纲上线的大事。

这十条口号原来打算4月11日这天贴在报社内部的。那天中午市革委会政宣组开会,我在会上把总理讲话、江青讲话结合二军大“红旗”、“红纵”斗争的情况讲了,虽然一个字没有提到张春桥,但是政宣组的人一听就明白了。我还讲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出了差错,我说我们搞报纸工作,任何文章发表都要给本人看,现在有些人发毛主席的指示不让毛主席看,谁给他这么大权力?会上大家都高呼口号:谁篡改毛主席指示绝没有好下场!揪军内一小撮就是反革命!当时政宣组有20多个人,这说明张春桥事实上很脆弱,

我没怎么动员,大家的情绪就高涨起来了,高呼口号。政宣组的人都是文教系统的代表,有音乐学院、戏剧学院、出版社等,他们回去后就自己单位贴大字报。我回到报社后就开始印传单,但我觉得光靠传单还不够,报纸上也应该表个态,那就全国都有影响了,就去跟邵传烈、周国荣商量,但也不能点张春桥的名,而是要用正面口号,让人家看了要心有灵犀一点通,知道是反对张春桥的。

那天晚上,正在印传单时,“北办”又传来一个消息,说《北京日报》4月7日的社论很好,你们看看是不是可以转载。我看到那篇社论中明确提出批判“二月逆流”问题,说是“有人打着批判极‘左’旗号干了很多坏事”,还提到有“小爬虫”,也有“变色龙”。有些用词是总理和江青的原话,我认为这篇社论的矛头是指向上海,于是故意打电话给徐景贤,说:“《北京日报》4月7日社论很好,我们打算转载。”徐景贤说可以啊。但过了大概一个钟头,徐景贤又打电话来说:“老朱啊,这篇社论不要转载,还是我们自己写好,你们自己写一篇吧。”我回答说:“你刚刚不是说很好吗?一会儿又说自己写,我们自己写不出这个社论,人家可以登,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转载?”徐景贤说:“这个事情我很难决定,要向春桥同志汇报。”这么一来,我觉得这个事情难办了,万一张春桥不同意怎么办呢?我就跟邵传烈、周国荣商量,决定今晚不接听任何人的电话,即使徐景贤来电话,我们也不接听。我们三个人坐在办公室,一点也没声音,可以听得到手表咔嚓咔嚓走动的声音,正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啊。后来电话铃响,我们不接,报纸照印。其间,邵传烈跟我讲:“老朱,反对张春桥是不是郑重一点?‘一·二八’事件已经有了教训,郭仁杰就是因为‘一·二八’事件跳楼自杀的,即使张春桥有问题,中央会端出来的。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邵传烈的这种想法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当时我想,我们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观点的新闻工作者,对于这么重大的事情,不能没有自己的反应。我对邵传烈说:“我们造反夺权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一顶乌纱帽,不是为了当头头,是为了保卫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然张春桥有事情中央会端出来,但我们不反对,毛主席身边有这样一个人,我们不放心。”

周国荣也说：“像这样的叛徒在毛主席身边能行吗？如果中央表态说我们有错误，我们就做铺路石，那样无产阶级司令部就可以多一个人了。”我们这么一说，邵传烈也就不响了，然后他就拟出四句口号：“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林副主席、誓死捍卫江青同志、誓死捍卫中央文革”，实际上是表明我们不捍卫张春桥。这四句口号就刊登在4月12日的《文汇报》上。这几句口号的大样出来后，我们叫报社印刷厂厂长杨瑞根把大样锁起来，这样即使徐景贤派人来，也没办法改动报纸了。

报纸印出来后，已是4月12日凌晨了，我、周国荣、邵传烈、倪平、陈进鹏、朱殿鸿、何倩、郑重、夏震菲等，带了一批传单，坐了两辆车到二军大，以表示支持二军大“红旗”。路过同济大学时，天还没亮，我们在同济发了些传单。后来听说同济“东方红”的陈敢峰一看传单知道有人反张春桥，马上给徐景贤打电话报告，所以他立功了。我们到二军大后，发现戒备森严，门口有人值班，办公楼门前用一长排铁栅栏拦了起来。我们跟值班的人说，我们来支持二军大“红旗”，揪军内一小撮就是反革命。二军大“红旗”出来了一个女生，戴眼镜，身材一米六多点，她跟我们说：“对不起，我们是军队，不跟地方上串联。你们的传单我们不收。”就把传单还给我们。她没说反对张春桥，也没说支持，就说你们的事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在二军大的门口只停留了几分钟，只好打道回府。在路上我想，他们可能不相信我们，因为《文汇报》4月5日的“编者按”，不指名地批评了二军大“红旗”，他们对我们有戒心，要防备我们。

我们回到报社时天已亮了。这时传单已发出去了，在上海引起了轰动。上午10点钟《文汇报》社周围人山人海，有的来打听消息，有的来问“为什么战斗队”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周国荣，回答让他们自己去想，独立思考。这时南京路、淮海路已经贴出很多大字报，有些大字报是指名道姓的。市革委会那里很紧张，徐景贤在他那本书里写道，一批没有领章帽徽的军人在南京路上贴大



在朱锡琪家中访谈

字报，“在上海闹独立王国的绝没有好下场！”当然是指张春桥喽。南京东路上有一群人围着看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说张春桥的老婆文静被日本人俘虏后投降。这些大字报主要是文教系统包括上体司、上艺司、出版系统等写的，工厂的不多。这时中央还没表态，整整一个白天，我们三个人都在报社等中央表态的消息，也没人来找我们。后来知道，那天王洪文来过报社，但在门口被拦住了，他报了王洪文的名字，报社的门卫说“王洪文也不能进”。所以批我们的时候有人说《文汇报》连王洪文都不让进，闹独立王国。那天我们没有与“北办”联系，“北办”的艾玲知道二军大“红旗”是反张春桥的，但是她不知道我们也反张春桥，后来她被抓起来清查感到很冤，想不通，觉得是把责任都推给她。应该说，在反张春桥这件事上，“北办”的影响是有的，但主要是我在推动。

我与徐景贤辩论

4月12日傍晚，传来中央表态的消息，是由海军政委李作鹏出面的。当时我想，这本该是中央文革的人出面，但因为牵涉到张春桥与廖政国的矛盾，所以要由部队来表态。李作鹏提了三点：1.贴张春桥大字报是错误的；2.部队不要上街游行；3.不要反击。13日，徐景贤叫我、周国荣和邵传烈当晚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在市革委会礼堂召开，参加的大概有1000多人，有徐景贤、马天水、东海舰队司令高志荣，还有政宣组和文教系



朱锡琪(中)与访谈者金光耀(左)、金大陆(右)合影

统的负责人,也有一些基层的人,实际上这是一个辩论会。高志荣先宣读李作鹏的三点指示,然后徐景贤说:“反对张春桥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大家可以辩论。”他还说,张春桥没有历史问题,没有坐过牢,有什么理由反对张春桥?于是我就站起来说:“我现在请教你,揪军内一小撮是什么错误?为什么要千方百计把廖政国揪出来?”徐回答道:“谁说过要把廖政国揪出来?你有点瞎说。”我说:“上海有人揪军内一小撮是不是存在?武汉陈再道事件时,上海有人贴大字报,要揪上海的陈再道,上海的陈再道是谁?”这么一来徐景贤不说了,我又问:“再问一个问题,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文汇报》9月25日登出来的,为什么《人民日报》在10月8日又改正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你徐景贤也应该知道,如果发表你的文章也要先请你看过,这个最新指示毛主席看过吗?”徐景贤说:“哎,这是我的错误,我没有给张春桥看。”我马上说:“你不要自己替张春桥承担错误,你也负担不起,这件事你不可能不与张春桥说的。”随后,我就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这个会议很简短,大概半个钟头就结束了。我、周国荣和邵传烈都参加会议的,报社参加的还有其他人,但发言就我一个。

会议结束回到报社时,工总司已经来了四五个人,在报社会议室等我们,见到我们后就宣布代表市革委会对我和周国荣进行隔离审查,罪名是反对张春桥。我当场就被关进报社的厕所间,周国荣也被关起来了。邵传烈仍继续工作。

我被隔离审查后,就不停地写检查、接受批

斗。隔离审查了差不多两周,徐景贤来报社主持会议,在我和周国荣再次检查后,他宣布朱锡琪和周国荣可以继续工作,并宣布邵传烈主持报社的工作。后来我在徐景贤的书里读到,毛主席对张春桥说:“‘四一二’事件无事。”毛主席还说,“支持你张春桥的不一定都是好人,反对你张春桥的也不一定是坏人。”所以张春桥就让徐景贤在会上作了以上宣布。但我当时感到很突然。会议一结束,邵传烈马上来找我,“老朱,你再听遍会议的录音,然后去见见张春桥,我车子已准备好。”我对邵传烈说:“我不好意思去见张春桥。”当时我确实感到不好意思去见张春桥,因为炮打他了嘛。但也觉得张春桥错误总归有的,这次肯定是主席保护了他,现在要我去见张春桥,就是要我当面给他赔罪,我感到我没法做到,所以尽管邵传烈车子都准备好了,我还是没去。为此,张春桥气得不得了,有次在全市万人大会上,他点我的名,说:“算我眼睛戳瞎,看错了人。我是想见朱锡琪的,但朱锡琪不想见我。”他这是挖苦我。他当时是什么样的人物啊。后来在另一次于文化广场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张春桥从理论上来否定“四一二”事件,他用他惯有的口气说,“现在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已经很臭了,他们没有办法反对共产党。党内走资派也没有这个实力,只有造反派中的知识分子才有力量来跟我们较量。”

这个“四一二”事件后来上海在全市范围内一共整了五次,到“批林批孔”运动时还要批“四一二”事件,《文汇报》的职工总共有近三分之一受到牵连。抓“五一六”分子时就将邵传烈作为“五一六”分子揪了出来。那时表面上让邵传烈主持报社的工作,实际上对邵传烈还是不放心的。有一次在锅炉厂开大会,张春桥坐在主席台上,看到邵传烈坐在会场后面的角落,就叫邵传烈坐到主席上来,邵传烈上去后,张春桥站起来与邵握手,还说:“反对过我的人,没关系。”这是存心出邵传烈的洋相。我们幸亏有毛主席的保护,毛主席对张春桥说:“造反派犯错误,要高抬贵手。”要是没有毛主席保护,我们肯定没命了,尤其是我。所以当时对我的处理还算轻,党内严重警告,还保留党籍。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张闻天理论的两大亮点

——写在《张闻天文集》再版之际

○ 张培森

去年为纪念张闻天诞辰 110 周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决定再版一批张闻天的书籍共 8 本,其中有《张闻天文集》四卷,和《张闻天早期文集》(除译著外的全部早期文稿)、《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两本专题文集,此外还有两本《张闻天年谱》(上下)。今年这批书籍再版的即将完成,又适逢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也算是对党的生日的一份贺礼。

谈及张闻天这批再版书籍,有必要先说明一下他的四卷本《文集》当初出版的由来。1979 年党中央为张闻天平反不久,就批准编辑出版张闻天文集。不过按当时中央有关部门规定,中央领导人除毛、周、刘、朱外,其他领导人出版著作,均只限一本选集。然而编辑组在实际编辑过程中,却发现对于这样一位终身笔耕不辍的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其丰硕的思想遗产,远非一本选集所能容纳得下。于是就在 1985 年《选集》编辑完成出版之后,编辑组即根据实际情况,以及一些老同志的意见,写报告给中央,建议在《选集》的基础上,再编辑一套多卷本文集,报告不久得到了批准。这样,又经过将近 10 年的努力,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一部汇集张闻天一生重要论著 270 篇,共 150 余万字四卷本《张闻天文集》终于在 1995 年出齐。为这部重要著作的出版,中央批准中央党史研究室于该年 8 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出版座谈会。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座谈会。胡锦涛在这次代表中央的讲话中对张闻天著作做了高度评价,指出:“这套文集的出版发行,对于我们研究党的历史,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于加强党的建设,都有重要意义。”

回顾整个编辑过程,笔者的一个深切感受是,这位老革命家的许多著作不但具有深刻的理

论性,而且有着鲜明的时代价值。笔者个人认为目前再版的这部文集,至少有两大亮点值得人们关注:一是关于“人权与民主”问题,二是关于“商品与市场”问题。

一、从 19 岁谈“人权与民主”至“文革”中撰写民主问题论稿

这次再版《张闻天文集》,增补了一篇他五四时期发表的文章,题为《中华民国平民注意》。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年 19 岁的张闻天是南京工程学校的一名学生。他 17 岁考入这所学校时,正值国内新文化运动兴起,因而在五四之前,就已深受新思潮的影响,他曾在一篇自述中写道:“五四前《新青年》的出版,给了我很大影响,我的自我觉醒也于此开始。”五四爆发后发表的这篇文章就鲜明地表现了他当时的这种觉醒。先让我们看一看其中的一段论述:

吾们从前在专制势力下的时候,不晓得君主与民主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晓得君主武力是万能的。因为目光所到的只在这一国。到了现在,交通便利,接触面广,晓得君主武力不足恃,晓得有世界的潮流。

寥寥数语,却给人们揭示了人类近代文明发展历史一条具有根本性的规律,这就是民主是一种世界潮流。张闻天这篇文章当时发表在 1919 年 7 月 22 日《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如果从发表此文的 1919 年算起,至今已经有 90 多年,人们纵观这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世界历史,民主潮流滚滚向前,无可阻挡。尽管各国的民主化道路各有不同,可谓异彩纷呈,然而历史却不断地证明,当今任何依仗武力支撑的专制统治政权,终究逃不脱民主潮流冲垮的命运,这是一条无可抗



青年时期的张闻天(1922年)

拒的法则。

再让我们看看第2段论述,文章指出:

在共和时代,国家以人民组织,所以发达国家人民即所以发达国家;所以个人的自由非常重要,所以人权是神圣,不但不容私人的侵犯,即国家除了不得已限制外,不能滥用权力而侵害的。但是人人要自由而(须)以他人的自由为限。于法律范围内,人人自由,各有活泼进取的精神,各具自治的能力。分子发达,即国家亦发达了。

文章这里所论深入浅出,简单明了,然而其所包含的思想,却颇为精深,并非一般肤浅之谈。其中首先指明“人权神圣”是由于人民在民主国家中的主体地位所决定的,而且特别告诫国家不能滥用权力而侵害人权。尤其最后在勾勒“法律范围内”的自由民主社会前景时,文章实际对现代民主实质作了精辟的概述。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人大会议答记者问时所指出的,要“充分发挥人的独立思维和创造精神”,“只有人民有积极性,我们的改革和建设,才有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民主的真正含义。”

谁曾料到,正是发表以上这篇文章的年轻人,在后来中国革命的风雨中成长为中国共产党

的一位领导人,并在红军长征中被选为党中央的总书记。自然更没有料到的是,中国革命胜利后,人权和民主问题又遭遇到那么多的波折。而他本人也由于在中央会议上的一篇发言而罗致冤案。难得的是在其垂危的暮年,在人身尚无自由的“文革”时期蒙难的情况下,这位老革命家经过深刻的反思,秘密撰写了一份数十万字,如今被人们称作“肇庆文稿”的思想遗产。而正是在这份文稿中,关于民主问题,成为最大的亮点之一,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作了一系列论述。

首先,他在《人民群众是主人》这篇文稿中阐明了党与群众关系这个重大问题。文稿特别提出的一个严重告诫是,党在执政后的一个“最容易犯的”错误,同时也是“最危险和致命的”的错误是“脱离群众”。他认为这种情况,在党成为执政党之前固然也容易发生,但是在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就“更容易发生,其危险性也更大”。

何以如此,文章认为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人的地位变了。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党的领导人处于一种既是领导者又是首长的特殊地位,用张闻天的话说,他们“工作特殊,生活也特殊”,而这就往往容易使得一些领导者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居于“群众之上”的,群众则有义务服从他们。而另一方面从群众本身来说,由于过去旧社会长期受压迫,他们当中有些人也往往容易以旧的传统习惯对待现在的党政领导者,把他们看做官老爷,把所有的好事都说成是他们的“恩赐”;同时也鉴于他们的权势,所以唯恐得罪他们,因而对他们“唯命是从”。这样,就把人民群众是主人,而党政领导人不过是公仆的关系从根本上弄颠倒了,应该说这就是党的干部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顺便提一下,周扬同志“文革”结束后在中央党校一次报告中提出弄不好共产党也有个“异化”问题,一时引起了非议,有人说这是对党的诬蔑,其实这是他通过“文革”深思后对党的一个忠告。事实上,苏联的最终解体,从根本上说不正是苏共长期脱离群众导致“异化”的结果吗?

面对这种危险,张闻天强调指出,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党所面临的一项任务,就是要“真正使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而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名副其实人民勤务员”。应该说

张闻天的这一提示是一个具有根本性、长远性的提示,今天党中央所强调的“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以及“权为民所赋”等指导原则,其实也都是为实现张闻天以上所提出的这一根本性任务,这也是当前政治改革的一个重大目标。

第二,张闻天在谈民主问题时,还着重谈到党内民主问题。他写的《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这篇文稿实际就整个贯穿了这一精神。文稿明确指出党内思想斗争,是“党内民主的主要标志”,接着论述了中共几十年进行党内思想斗争中形成的一系列优良传统。而在这些论述中,今日看来特别令人瞩目的,是尖锐批评了违反以至破坏党内民主的错误。他在谈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就直指“压制民主和取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专制主义、军阀主义、家长主义”,这里一连用了表现封建专制的三个“主义”,而且还指明“党内常常出现的知而不言,言而不尽的情况,同党内那种言者有罪,闻者不戒的家长作风、军阀作风有直接的关系”;文章在谈到党的民主集中制时他又一次直指上述的三个“主义”,指出“片面强调集中,无视民主,就会犯专制主义、军阀主义、家长主义的错误”。关于如何贯彻民主集中问题,这篇文稿还特别告诫居于领导地位的党员,必须认清“我们所要的,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专断,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以上张闻天30多年前的这些批评,今天读来也仍然发人深省。正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中国唯一执政的领导人民建设的党,因此党本身的建设就至关重要,党内民主也就必然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民主。须知张闻天的这批文稿是在“9·13”林彪事件发生之后写下的,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是,一位原来曾在他身边长期工作的黄关祥,“文革”前被迫离开,这时又被批准回到他身边时,说到他在五七干校听传达毛主席在四届人大一次讲话,其中说,张闻天和王稼祥,可以留下来当“反面教员”。此时张闻天回应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林彪正面教员又怎么样呢?”

据笔者所接触的包括几乎所有老同志的回忆,都从未见过张闻天直接流露过对毛泽东的不满。而林彪事件后他这一句当时直接对应黄师傅的话,应该说并非为一时情感所发,而正是反映了对他所亲身经历的,从1959年庐山会议到“文

化大革命”那段党内民主曲折历史的痛切思考。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的一番“逆耳忠言”,遭到了飞来横祸,而鼓吹个人崇拜的林彪,却从此步步高升。庐山会议对党内民主的这次严重破坏,终于导致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沉痛的历史教训告诉人们,要想建设好整个国家民主,必须始终要重视党内的民主建设,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以党内民主带动整个国家民主。

第三,文稿还阐述了执政情况下党与国家的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原来进行革命的政党胜利后遇到的一个全新的问题,虽说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农村包围城市,在根据地就已经积累不少政权建设的经验,然而那种只限于局部地区且不完全的民主试验,同这种取得整个国家政权和实现国家民主化,还是大不一样的。首先是整个形势和任务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是武装推翻旧政权,如今则是进行和平的现代化建设。这也就必然要求党在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上要有新的观念。而张闻天在文稿中正是用崭新的观点阐述了这个问题。他一方面明确肯定在我国“党是国家机关的唯一的和最高的领导者”,另一方面却又毫不含糊的指出:“党不能超过国家,高居于国家之上,不顾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代表的意志和决心而自己实行专政,党领导国家,但它本身不是国家,它不能代替阶级实行专政。”

究竟如何做到既体现党的领导,而又不超越国家?文稿实际表述了以下三条重要原则:

一是党必须尊重人民代表大会。党是最高领导,然而党的领导集中体现于对国家的政治路线和方针策略的领导,而党的一切决议和决定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政府机构的讨论、审议、补充、修改和接受,并做出适合于群众自己的意见和需要的,并具有法定的约束力相应的决定、命令和法律,然后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国人民中公布施行。这一过程实际就是人民群众在党领导下自己当家做主的过程。因此尊重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尊重群众的表现。

二是党不能包办代替政府的工作。早在“文革”之前,张闻天就明确批评过“党政不分”的错误主张,指出“决不能把党的领导等同于党包办代替一切”。他还在读列宁1923年《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篇文章中所论要“把党的机关和苏维

埃机关结合”这一节旁特地写了一条批语：“(列宁)在这里强调了它们的结合,而未谈其区别。不能因此否定区别。”而他在“文革”时期所写的这篇文稿中,则进一步强调指出,“党决不能靠少数党员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相反,它应该特别注意大量“引收、培养和提拔”非党群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参加国家机关的各方面工作,“使他们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真正做到人民群众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三是共产党员应当成为“尊重、服从和执行国家法纪”的模范。如前所述,党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规法律来治理国家的,如果共产党员,以至党的领导人就不遵守、不执行,甚至带头破坏国家的法纪,其结果国家法令、法律岂不是成为废纸。因此文稿指出“任何共产党员,违反了国家的法纪,同普通群众一样,应该受到国法的制裁,决不能因为他是党员就可以无法无天,胡作非为。”

所有以上原则可以说都实际包含着对过去错误经验教训的总结,而且对我们今天的改革也仍然有着启示的意义。就拿人民代表大会来说,回顾整个建国以来的历史,应当承认确实有过不重视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教训。本来1955年一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一五”计划还比较稳当,完成得也比较好。但是到了“二五”计划,还只是在党的八大通过一个计划建议稿不久,就由于领导人一下子改变主意遭到推翻,发动了“大跃进”。然而经过一番折腾,且不说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上千万,“二五”计划到1962年实际执行结果,钢、水泥、棉花等主要工农业产品都未达到计划指标,粮食和棉花的产量甚至低于1952年的水平。接着元气尚未来得及恢复,就又发动了未经任何一次党代会、人代会讨论通过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这样经过两次大折腾,中国经济建设至少耽误了20年。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有人将同一时间中日两国经济发展作过这样一个统计比较,1955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达4.7%,日本不到2.5%;可是到了“文革”结束后,新的时代刚开始

的1980年,日本的GDP占了世界的10%,中国却落到了2.5%。造成以上两次错误固然有其种种主客观条件和因素,然而缺乏民主监督机制,党代会和人代会均未能真正发挥其审议和监督作用,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教训。

由于过去有过一段长时期不重视人民代表大会,因而群众中流传一种说法,把人大比做纯属形式的“橡皮图章”,甚至有人主张废除人大。对此,张闻天在文稿中明确指出“问题在于充实内容,而不是废除形式”,还说“没有民主,‘从群众中来’就会成为空谈”。事实上时至今日,我们不是也仍然在做张闻天所说的这个“充实人大内容”的改革工作吗?

二、从50年代初批评斯大林不重视商品交换,到60年代初建议国内开放市场

这次再版的专题文集《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增补了一篇张闻天1953年同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谈话作为附录。说起50年代,计划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几乎是一个毫无疑问的问题。然而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单一的计划经济恰恰是导致僵化的苏联模式最终垮台的深层次的原因之一。可是十分难得的是早在1953年,一位中共领导人就曾对苏联计划经济提出过质疑,并对斯大林不重视商品交换进行了批评,这位领导人就是张闻天。请看他当时在担任驻苏大使期间,对国内来苏联考察的吴冷西的一次谈话。

1952年岁末至1953年初,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对苏联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考察结束后于1953年1月底去使馆看望了张闻天。就在这次会晤交谈中,由于吴冷西谈及对当时苏联日用品质量太差,品种太少的一点感受,便引发了张闻天对当时苏联经济,以至对斯大林新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一番评论。实际上张闻天当时的评论并非是凭空而出,因为一是他当时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与了苏联帮助中国制定“一五”计划工作会谈,对苏联经济的现状有一定了解;二是就在这次同吴冷西谈话半年前曾到苏联中亚地区的五个加盟共和国(土库曼、

塔吉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和哈萨克)进行过访问考察,调查工业、农业,详细地考察了苏联的集体农庄;三是他早在中国革命时期就曾经在苏联有过长达五年的学习,对苏联过去的历史也有一定了解。

他这次谈话首先肯定苏联工业建设的成就。他认为,历史地看,苏联的经济建设成绩伟大,工业化确实很快,否则怎么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希特勒德国呢?苏联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只比美国迟三年多。这方面应该肯定。但现在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七、八年,苏联轻工业的发展也确实太慢,而且农业也搞得不怎么好。他说,现在苏联流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有计划、按比例的法则。但如何认识和运用这个法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他又说,在制定我国“一五”计划过程中,同苏联同志商谈时,我们提出怎样才能有计划、按比例,特别是怎么样的计划才是按比例的计划,怎么样才能把握好比例等问题。他们翻来覆去地说明,甚至可以说是讲解,但我们仍然是不得要领,事实上他们也说不清楚,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在苏联也还没有解决。

说到这里,张闻天就对计划经济实行困难谈了他个人的一点看法。他说,关于“社会需要”(即今日所说“社会需求”),这里有种类和数量两大问题。列宁提出计划经济时是以全民统计为前提的。这种全民统计很难做到,而且需要(求)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社会需要(求)怎么确定是一大学问、一大科学。目前苏联日用品这么缺乏,很明显是背离社会需要(求)的,也很难说是合乎按比例法则。

接着,他就对当时斯大林的新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一个理论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说,斯大林这次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要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要运用价值法则。但是,从斯大林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他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肯定,只是针对那种主张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而他自己并不是非常重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只把它们称作“因素”而非法则。至于价值法则,斯大林更是断然否定这个法则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起着生产的调节者的作用,只承认它主要是在个人消费品的商品交换领域中起作用。

由此,张闻天就又说到了苏联的集体农庄。他说,现在苏联集体农庄的产品价格固定,多年不变。集体农庄的生产规模由国家计划决定,主要农业生产工具(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均为国家所有。这样的规定是否太死了?这肯定会挫伤集体农庄经营的积极性和灵活性,也会造成国家的沉重负担。但斯大林没有发现这有什么不对,反而把希望寄托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以产品交换代替商品交换。

从上述谈话可以得出,张闻天是中共领导人中最早对苏联计划经济,尤其是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出质疑以至批评的领导人之一。令人惊奇的是,为何50年代初就能对苏联经济和斯大林著作提出以上这样一些独到的看法?作为当时同张对话的吴冷西认为,除了他当时对苏联经济有一定了解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相当的理论造诣”。吴冷西指出的这一点诚然是说得不错的。要说张闻天对经济问题的兴趣最早可以追溯至上世纪20年代。他1922年赴美勤工俭学,1923年就写了一篇纵论一次大战后欧美经济的长论文《赔款与战债》,发表在国内著名刊物《东方杂志》上。他当时还从美国加州大学图书馆的一份英文刊物上,将一篇经列宁亲自审定的苏维埃政府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文告《苏维埃俄罗斯政策之发展》,译成中文后寄回国内,刊载在上海《民国日报》上,这是国内见到的最早介绍列宁新经济政策实施情况的报告。从他后来1925年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填写的表格上得知,他早在入学前就阅读过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多种经济学书籍,而入学后所读莫斯科中大课程中就有马克思的《资本论》。

需要指出的是,张闻天不仅很早在理论上重视经济学的学习,而且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之后,也是在实践中运用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探索中国经济建设道路的一位先行者。1933年他就在中央苏区明确提出“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发展苏区经济,认为这种私人资本的发展“可以增加我们苏区内的生产,流通我们的商品”。这是中共领导人最早提出运用列宁的观点发展革命政权下的经济的主张。及至抗战时期,他又在晋陕农村调查基础上提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的主张,认为“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

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第二步”。抗战胜利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去东北做开辟根据地的工作。东北工作期间，先后担任过合江、辽东两省省委书记。东北四年多的兼有农村城市的领导工作实践，使他有条件进一步思考整个新民主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因而在全东北解放前夕，他为东北局起草了一份重要文件《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这份文件的基本思想为：东北整个经济应是以国营经济为主的，容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正是这份文件上报中央后，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随后不久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其所确定的关于建国后经济建设方针，以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中的关于经济建设部分，都是吸收了这份《提纲》的基本思想。而50年代前半段“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就恰恰证明了这一基本方针是符合我国实际的，反观后来一段时期，那种背离这一方针，追求单一公有制结构的空想，其结果却导致经济上大滑坡。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1949年张闻天担任辽东省委书记时期，也就在他调任驻苏联大使之前，他在省委机关学校的干部研究班讲课中就专门讲授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问题，他还亲自带领省级机关主管经济工作的干部，到营口市海边实地考察营口建港问题，以便打开东北地区的出海通道，加强商品流通，开展对外贸易。以上两件事距离他进入外交部不到半年时间，可见后来他能那样早地对斯大林不重视商品交换提出批评并非偶然。

遗憾的是这位十分热衷于中国经济建设道路探索的领导人，建国后并没有能让他充分发挥其才能。可是在他1959年庐山会议被罢免外交部领导职务之后，却以待罪之身，利用落户到经济研究所担任一名挂名“特约研究员”的身份，切切实实地搞起经济问题研究。

60年代初，就整个国家经济形势而言，由于“大跃进”和“共产风”的影响，加上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从五九年实际进入一个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形势迫使人们不能不思考和总结五八年来的经验教训，1962年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就在此

时张闻天提出赴南方几个省市进行调查的要求获得批准。此次调查他为自己设定的重点，仍然是流通领域，对各地刚恢复不久的集市贸易尤为关注。

他一路调查，一路阅读随身携带的列宁有关新经济政策的著作。遗留至今的他当年读过的《列宁全集》第32、33卷上仍然可以看到，他阅读时留下的大量批注。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他在列宁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演讲稿旁写的几段批注。列宁针对当时有人反对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认为新政策会使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得到好处多的错误观点，指出这是“一个怎样把利用我国物资和发展市场连接和结合的问题”，张闻天在旁边写道：“谁能够更好地利用物资，利用市场，谁就能得到更大的好处。”

同时我们再来看一看，他当时在扬州调查时，同扬州地委书记谈集市贸易调查所作的一番敞开思想的评论。他说，自由市场虽然现在商品不多，但有强大的生命力，将来很有前途，是要发展的。流通促进生产，它对发展经济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过去怕乱，怕资本主义，把它关闭了，因噎废食，不对。你可以管它，现在主要是开放，不能坐井观天。他还说，农民把集市贸易叫自由市场，把自留地叫自由地，很有意思。一个“自由市场”，一个“自由地”，农民这两个“自由”都是少不了的。有了自留地就势必要有自由市场，这是配套的，不能分开。他还认为当前商业系统“统得过死”，因此除了国营商业之外，还应该要有自由市场，而我们现在就是缺一条腿，造成人为障碍，作茧自缚，自己把自己捆死了。

就在这次南方四省市（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调查完成回到北京之后，张闻天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报告的中心意见是，建议不但要坚持目前已经恢复的集市贸易，而且可以扩大，超出本地区范围，使之“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农民在完成交售任务后可以在集市上自由出卖粮棉和农副产品，还建议允许个体商贩加入到突破本地区范围的商品流通等。所有这些意见实际上已是超出当时中央规定的政策范围的重大改革，然而还在这份报告没有上报之前，只是在张闻天所在经济研究所讨论时，就有人反对，说这套主张是“实行自由化”。对此张闻天不无几分激动地起来反驳

说,现在建国已经十几年了,还要画地为牢,是不应该的。实行我这个办法是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的,但只要因势利导,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如果解决不了,说明我们共产党人没有本事。

报告送上去不久,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重提阶级斗争的讲话中,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批判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张闻天出席了第一天的小组会后,即被通知停止出席会议,接受审查,他的这份报告后来也成了所谓“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

然而就在八届十中全会后,张闻天进一步受到批判,已经被取消参加一切中央会议和阅读所有中央文件的情况下,不但没有放弃研究,而且又于1963年4月撰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的长篇论文。他的这篇论文虽然不是专门谈商品和市场问题,然而却是从深层次上澄清商品和市场问题上暴露出来的理论混乱。这篇为当今学者评价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创见”的论著,其突出的创见正就是将生产关系分解为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即一个方面,张闻天称其为“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指“人们为了进行生产,依照生产技术(即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情况和需要而形成的劳动的分工和协作的关系”;而另一个方面则是“所有关系”的方面,是指“一定社会形态中的生产资料和生产的所有关系”。

张闻天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所研究的主题,也正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及其内在矛盾的发展规律”;而且他还认为“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特殊形态中揭示出生产的一般,所以他不但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特殊规律,而且也指出了社会化生产中复杂的分工和协作的关系,及一些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律。”因为“在生产的社会化”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为接近。张闻天用他的“两重性”的理论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一深刻而具有创造性的解说,可以说是对当时那种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只讲“异性”,完全看不到“共性”的“左”的思潮的一个有力的理论批判,也为人们打破在商品和市场问题上“左”的禁锢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武器。在此之前他南方调查,以及在经济研究所讨论他

的报告过程中,所批评的“坐井观天”、“画地为牢”,其实也正就是指的这些人看不到“商品和市场”问题上表现的“生产社会化”这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性”的一面。

说到“生产社会化”,还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位老革命家,早在20年代就去过当时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美国,亲眼见过社会化大生产;他在60年代那种“左”的思潮泛滥情况下能够保持独特的见解,除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之外,恐怕也与他早年的这一阅历多少有关。在市场经济已经给中国经济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人们不应忘记这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先行者,在过去那种特殊年代所作的艰难探索,而他遗留下的这方面思想遗产,对今天人们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仍然具有启示的意义。■

(作者为中共党校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 徐庆全)

书屋

2011年第9期目录

学界新论	清王朝从勃兴到腐败的斑迹 “权位空置”现象之我见	吴正格 任蒙
书屋品茗	鲁迅和胡适精神世界的同异 《儒林外史》谈片 陈丹青的鲁迅 石难浮 电子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突围 “为白人的羞耻付出代价”	刘少勤 顾农 艾华 周巴沙 周国清 莫峥 罗楚盈
人物春秋	不要忘记方孝孺 奇人奇事高士奇 阳明山上的林语堂 “民国大佬”吴稚晖	孙芝轩 睦达明 王炳根 赵映林
灯下随笔	闲话人性的善与恶 宽容什么,谁来宽恕? 花费每一分钱都有账可查 访日杂记 说“官”	雷池月 肖雪慧 高峰 袁传旭 李荫远
说长论短	远去的爱情 至今仍令人纠结的人和事 “封侯”还是“著史”? 都是《魔崇》惹的祸 曾纪鑫的文化历史散文	张国骥 陆其国 刘伟波 陈漱渝 赵微
史佚佚篇	以“王”僭“帝”的秦汉秘史(下) 乾隆年间能称“盛世”吗? 废约运动与民国政治	张远山 余习忠 李斌
前言后语	文坛沉寂的半壁江山	张永久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6.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0731-8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陈垣校长入党前后波澜

○ 陈徒手

—

北师大校长陈垣 1958 年底正式申请入党时,已是 78 岁的高龄老人。他能否入党的问题涉及五十年代中共对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冷热演变,让北京市委、大学部及其所在的北京师大的负责人几年间困扰不已,入党之后一经公布便成了当时轰动知识界的一桩大新闻。

按师大党委 1959 年 1 月 9 日入党内部材料确定的口径,陈垣芜杂一生的简历被这样谨慎地描述:“陈是清末秀才,曾任北洋军阀国会议员,教育部次长,参加过曹锟贿选,以后即专门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1929 年起任辅仁大学校长二十余年。”

在当时粗糙、简单化的政治教育环境之中,一般党员和群众对北洋国会议员、政府高官和参与贿选这样所谓“历史污点”会有高度敏感。因此师大党委力求在这方面有所解释和缓冲,巧妙地过滤掉政治上的先天性疑点:“陈任国会议员期间,主要是在京师图书馆阅读《四库全书》,著有《四库撰人录》、《四库书名录》等,估计不会有更多的政治活动。”

这种淡化和含糊是有组织效果的,从现有党内文件来看,支部大会及师大组织部门对陈垣的诸多北洋时期问题都没有触及,一言带过,而且始终把陈的前半生基调定为“不关心政治、只热爱学术”。这种有意识的保护性评价在当年与陈垣同辈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实属难得,有不少名教授在此类历史问题上都不获宽恕和见谅。

对于陈垣在抗战期间的表现,师大党委也做了画龙点睛式的肯定:“抗日期间陈闭门读书,不问政治,著书立说,很少与人往来,拒绝担任‘大东亚文化同盟’会长及其他任何职务,未发现他与日伪汪伪和帝国主义在政治上有何联系。”(见

1959 年 1 月《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入党的材料》)

中共军队入北平前夕,朱家骅、胡适等曾三次安排陈垣上飞机离京,但陈垣决意留下。他自己陈述的理由是,对国民党无好感,而自己二十多年不问政治,不会有危险。在随后几年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陈垣表露了当时留京的心态:“我是抱着怀疑的心理要看一看,到底为什么原因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这一定有个道理。”一位京城著名校长、著作等身的老学人能有这样初步的思想倾向性,无疑让中共高层有所欣然和期盼。

对中共所指定的《新民主主义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等理论书籍,陈垣始终持“认真阅读”(校党委评语)的态度。在一件带有“绝密”字样的校方整理《陈垣小传》(1958 年 12 月)中写道:“解放以来他对党的领导是尊重的,时事学习从未间断,特别是对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讲话或报告反复阅读。”1954 年全国人大《情况汇编》第一期中曾记载,病中的陈垣不顾医嘱,仍执意要去参加全国人大小组会议,他说:“能参加这次大会感到很高兴,好久没看到毛主席了,一定要积蓄精力,参加有毛主席出席的会。”

有感于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他在不同层次的学习会上这样表述过:“解放区来的干部是好干部,共产党是一个不平常的党。”“对今天这样的政府之下的生活,还有什么理由对政治灰心,对政治不闻不问呢?”他有一句名言常常为统战部门的工作报告所引用:“过去几十年自己太无知了,恨自己接触党太晚了。”

1953 至 1956 年,陈垣在学校大小会上时常发言,号召师生积极参加党的运动,配合政府各项任务。1953 年冬天因面粉供应紧张,市政府决定收缩供应并凭证售出。此事一出,招致社会较大的不解和埋怨。陈垣为此在全校群众大会上积极解释这一政策,希望师生多从正面理解,他说:

“解放四年的经验，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和国家的一切政策都是以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的，大家应该信赖政府，从大处着眼，从长远利益的全局出发来考虑问题，不要只看到小的利益，要把好的执行，保证国家工业化的建设任务。”（见1953年11月6日市高校党委《各校教授对面粉计划供应的反映》）

二

教会型大学一向被官方认定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顽固堡垒，作为辅仁老校长，陈垣思想如何转向就成为一个各方关注的风向标。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中，辅仁遭到撤并，教职员工折腾颇大，陈垣被分配到北师大当校长。他在这段重要的转折时期的表现及评价，现在还没有寻找到更多的内部官方资料，只在校方上报的《陈垣小传》中看到几句简单的评述：“经过辅仁大学的反帝斗争和参加土地改革后，转变了对党的态度，接受了党的领导，靠近党，拥护党的各项政策，参加各项政治运动也比较积极，在当时对辅仁大学运动的开展起了一定作用。”

学校党组织对陈垣历史研究的学术水准还是持肯定的态度，认为他的学问路数大体继承了清代学者的考据方法，他的著作考证历史上的某些事件、问题或某一书籍较多，议论较少，研究一朝一代的经济制度几乎没有，因此他的某些著作对研究历史有一定的用处。涉及学术弱点，只是说他研究比较专门化，故使用范围也有所局限。

没想到的是，陈垣报名参加西南土地改革运动后，所见所闻改变了他原有的一些学术思路。譬如他在四川巴县乡间应邀参加了斗争地主的大会，并做了革命性较强的发言。他在当地干部陪同下到处走访，实地看到村中地主所立的碑碣，发现与斗争大会上所听到的地主剥削的残酷事实不符，由此想到自己过去所研究的金石碑文很少记载劳动人民被压迫的情况，对以往“闭门治学”所依据的考证材料发生了怀疑。过后不久，校党委欣喜地向市委汇报说，陈垣已经对几十年来考据研究中缺乏阶级观点进行了初步批判。

“大跃进”运动来临，陈垣陷入一阵慌乱，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不知“何去何从”，感觉再整理旧

东西“不能为‘大跃进’服务”。他诚恳地对党委的同志说：“历史这门学问太难了，自己过去的著作是否有错误已无能力辨别批判，希望一些研究历史的党内负责同志给予帮助。”师大党委向市委介绍说，陈垣几次表态拥护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想做一位“红色老人”、“红专老人”，但又担心自己的著作被完全否定。（见1958年12月师大《陈垣小传》）

三

对于整风“反右”期间陈垣的实际表现，校党委的态度显得复杂、微妙和为难，最后以上下合力的方式保护过关。党委给出的正面理由是，陈在“鸣放”初期就称赞党的整风运动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要求知识分子“反求诸己”，“要帮助党整风，就要有党的领导”，反对“民主办校”。因此陈校长属于“基本上能站稳立场”。

陈垣被人抓住把柄的是在1957年春季“鸣放”阶段中央统战部一次座谈会上的“错误言论”，其爆发的激烈程度足以让事后参与处理的中共教育口官员有所棘手。在1959年1月9日师大党委整理的陈垣入党材料中披露了其间的发言要点：“陈垣说，旧知识分子都有一些高傲的气质，自尊心很强，士可杀不可辱，老教授一次次检讨、被斗争，有时人家原是热爱国家的，但都指着脸骂人家是反革命，那当然会使人感到无限委屈，抑郁难平，感情的创伤一时不易弥补。”还说，“运动过后，大家都不敢随便说话了。党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墙，有的地方就是这样筑起来的，希望党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

陈垣在授意之下做了两项弥补工作，一是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积极进行批驳，二是“双反”中主动向党交心，写了5000多字的自我检查。他有些惶惑，怅然若失，看到马寅初挨批，他就有所顾虑：“经济学方面批判马寅初，历史学方面是不是也要批判我？”他私底下埋怨说：“那些过去不研究学问的，不写著作的，倒没有什么事。我们这些人，过去费了力气做学问，今天被叫做资产阶级专家要被批判，真不如不做了。”

陈垣出任北师大校长时，名义上说掌握全面，但一落到实际，他就只领导校长办公室、大辞

典编纂处和研究所,研究所尚未成立,大辞典编纂处也较为空泛,造成他在学校没有什么工作可负责。最重要的是,由于对学校具体情况不了解,本来颇具几十年教育行政经验的陈垣往往对工作提不出意见和办法,下面偶尔来请示也不知如何决定。这使陈时常处于苦恼和困窘之中,慢慢适应并养成习惯后,反而大小事都要请示党委书记来定。

1953年初何锡麟出任北师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掌控党政实权,他开始由于同陈垣合作较弱而受到上级批评,此后有所改进,同陈的联系比过去增强。但是整体工作还是由何说了算,何有时找陈垣谈问题,陈就认为何的意见已经很好,自己没有什么可提的了。时间一长,竟成了一个工作模式,陈对何事事依赖,高高挂起,被校办的一些工作人员戏称为“牌位”。

1953年4月上旬市高校党委统战部来人调查,记录这样几件小事。何锡麟副校长有一次曾拿一个计划草案交给校办公室金永龄,金问:“陈校长看过没有,有什么意见?”何说:“他提不出什么意见来。”

进步群众刘和反映,有时陈垣在办公室里转圈,说:“你说我应该干些什么呢?”“老了,作不了什么事。”有一次说:“年青人(指何锡麟)那么能干,偏偏身体不好。我这老头子没有能力,身体反而那么好。”(见1953年4月20日高校党委统战部《各校上层统战工作情况》)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伏不断的思想运动之中,陈垣在大小会上说了不少拥护式配合式的时令话、应景话,已经难得听到他脱口而出的内心言语。有一回听说李四光在中国科学院会上遭人批判而流泪,陈垣极为少见地反应道:“谁这么弄我,我不干……”

四

1949年后北京市高校党委对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之事一直持谨慎的态度,基层党组织顾虑重重,认为高级知识分子思想复杂,很难改造。据市高校党委1955年11月21日《北大、清华、师大等五校教授入党情况和问题》中披露,解放6年来北京市这5所高校一共才发展16名教授

入党,迟缓的主要原因在于党内还存在不少思想障碍,不肯积极进行培养工作。

五十年代以来北京高校系统每年建党计划都没有完成,1954年成为全市完成建党计划最差的单位之一。市委组织部追查原因,高校基层党组织无非还是认为高级知识分子个人历史或家庭社会关系比较杂乱,只能采取简单放弃的消极态度。

1956年中央组织部明确提出两年内高校建党指标,即教授党员要占教授总数的20%。并要在今后7年内,使高级知识分子的党员数量,达到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1/3左右。迫于高层压力,各高校加大了建党的速度和力度,有近百名教授被突击成为发展对象,其中有13名学部委员、十几位正副校长(或教务长、系主任)。这名单中没有陈垣,而且1956年10月市高校党委把陈垣列入“不够条件者,如何处理尚无更好办法”之列,与之同类的还有梁思成、汤用彤等人。过了一个月,市高校党委组织部再次在《教授中发展党的计划》中表示:“陈垣,觉悟不够,且年老卧病,已丧失工作能力,不具备入党条件。”市委一领导用钢笔在此标注:“高知中够条件是少数……无党派(陈垣)更复杂。分一下类,不够者算了。”

当时高校党委对此有个解释,就是要避免“对党的认识还不足、民主人士气味很重的人拖着小尾巴进来。”(见1956年10月10日高校党委《发展党发言提纲》)

转机出在1958年“大跃进”之时,郭沫若等人入党的消息公布之后,对陈垣震动不小,他马上表示“不灰心”之意,并于12月正式提出申请入党。师大党委转年1月9日向市委汇报,上交了一份4000余字的陈垣思想内部评价及小传材料,建议“可考虑发展其入党”。

想不到赶上1959年初春中共“开闸放水”的短暂时期,原本复杂万分的问题得以简单解决。1959年初市委很快批复同意北师大报告,并在两个月内连续批准梁思成、周培源、张子高等12位拖延多年的著名教授入党,在报刊上广泛宣传,引发了一股接收左派教授入党高潮。

1959年1月28日师大校长办公室、人事处党支部召开审查通过陈垣入党的会议,新任党委第一书记刘墉如来到现场以示重视,他说:“陈垣

同志的入党,说明了党在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胜利。”“陈垣同志在解放以后积极要求进步、追求真理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陈垣同志在入党的问题上,过去也曾有过思想斗争,如认为自己想入党是‘太不自量’,怕提出来不批准,面子不好看。但是,最后总是获得正确的认识。”

陈垣在支部大会上的发言也应说是最常见的“八股”模式,如有“今天对我来说是一生中最光荣的日子,接受我参加到工人阶级先进队伍,感到莫大荣幸。”“今天党给了我宝贵的政治生命,我要珍重这一新生命的开始”等常见词语,稍带有个人色彩的就是这么寥寥几句:“今年我已年近八十,真所谓垂暮之年才找到了共产党,自恨闻道太晚。但是我年纪虽老,俗话说‘虎老雄心在’,我想年岁的老少不能阻挡人前进的勇气,闻道的迟早不能限人觉悟的高低。我要以我有生之年竭尽能力,为党的事业不休不倦地继续努力。”这份讲话后来整理修改成文,以《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为题在《人民日报》显要位置发表,在学术界内外掀动不小的波澜。

刘墉如在会上突然提到一个话题:“有人害怕党内组织纪律,怕到党内来不自由……只要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会感到自由,感到组织纪律的必要。”刘是泛泛而谈,而陈垣自然有所回应:“今天同志们所提的意见非常宝贵,我今后要加强阶级观点的锻炼,努力克服个人主义思想残余,密切个人与组织的关系。”

研读这份保存至今的支部大会记录,我们可以看到,浸染多年,陈垣政治性的表态已经极为纯熟和老到,都源自于激奋又茫然、紧跟又踌躇、外人无法全部解读的苍凉心境。■

(责任编辑 徐庆全)

贺《炎黄春秋》创刊二十周年

炎黄春秋研炎黄,更研春秋五千秋

天下兴亡匹夫责,匹夫尤看新思谋

曲润海

2011年7月18日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SW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6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7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0040048号

陈登科的“瞒和骗”

○ 陆志成

读《“放卫星”的第一条新闻怎样发出？》(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之后,使我想到作家陈登科当年同方徨几乎一模一样的遭遇。所不同的是陈登科比方徨走得更远,由“瞒和骗”的新闻“升华”到文艺创作,写出了一系列散文、小说、电影剧本等作品,给他本人,也给那个时代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派往卧龙湖“监收监打”

1958年的安徽也同全国一样,工业“大办钢铁”,农业放“高产卫星”热火朝天。粮食亩产从几千斤,一直放到5.6万斤。当时有些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这些数字怀疑,为了堵住这些人的嘴,便叫一些人下到乡村去“监收监打”实地考察。陈登科既然是个作家,自然归在知识分子一类,便被省委派到淮北卧龙湖监收监打。

说起卧龙湖,陈登科十分熟悉。当年淮海战役时,他就到过卧龙湖,1957年冬又去过。其名曰湖,实际就是一片洼地,每到夏秋季节,一场大雨过后,便一眼望不到边,全是水,芦苇丛生,野鸭成群。到了冬天,水干了,满眼全是荒草,因此,农民习惯将此类洼地称之为湖。也许,在千百年前它曾经真的是湖,但是,现在陈登科看到的是一种死湖。他说半年前,自己还在这荒草湖滩上打过野鸭,怎么只几个月的时间就变成河渠纵横,稻花飘香了呢?

陈登科到达卧龙湖村当天就投入到监收监打过程中。不过,战地新闻记者出身的他,还是颇有心计的,那就是亲力亲为。亲自丈量田亩,亲自参加操镰割稻,亲自参加捆扎稻把,并挑把上场,还亲自套牛上碾,直到打出稻子。尤其是在过秤时,全由他指定人执秤、记账、统计,一律不让当地干部插手,这还能有假?正在他看着打谷的时候,一

位县委书记过来说,等打完谷还早着呐,走,咱们先去吃午饭吧。他就高高兴兴地去吃饭并且还喝了酒。等到酒饭一罢,再回到打谷场,一包包稻子已经装好,一过磅,亩产6300多斤。陈登科连夜回合肥,向省委作了详细回报,省委立即决定把它报导出来,还让报社专门赶写了一篇社论配合汇报。当时产生的影响很大。由于“考察”新闻是出自农民出身的陈登科之手,更具有说服力。于是,沉睡千年的死湖,如今大放异彩,6300斤对这个荒草洼地来说,实在是奇迹中的奇迹,实在应该大唱赞歌。卧龙湖成了美丽的“神话”。

陈登科后来讲,老实说,我当时只恨自己喉咙太小了,不能将我的歌声传遍世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时间未过半年,便有人当面斥责我向省委说了谎话,所谓6300斤,完全是假的。后来,才知道实际情况:原来打谷场的稻草堆里早就藏好了成包的稻子,请他去喝酒就是个圈套,利用这个机会把藏好的稻子拿出来充了数。再后来他又到卧龙湖来,深入一步了解到,那个高产数字,是23亩半的稻子,算到了一亩二分地的账上了。

派往卧龙湖拍电影

卧龙湖的“神话”还在继续。

陈登科说,在那种大哄大嗡气浪的推动下,像下山坡踩上西瓜皮一样,只能是滑到哪里算哪里了。“监收监打”结束后一个月,也即1958年的7月,陈登科又被省委派到卧龙湖拍电影,任务是宣传“河网化”。河网化是当年缺水的淮北地区,为了要推广稻改,实行的闻名全国的水利建设创举。说白了就是挖沟,不管有没有水源,整个淮北乡村,挖过东西沟再挖南北沟,所谓纵横交错,星罗棋布。陈登科带领上海电影制片厂奉命派来的一个20多人的摄制组,跑了淮北6个县,实地选择适

合电影的景点,最后,落脚于卧龙湖。

在这里电影的现代化技术手段,诸如蒙太奇、移花接木、以假乱真、夸张特写等得到充分的发挥。像我们在那个年代看到的所有的电影一样,都是一派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旗遍地、口号声声、歌声阵阵……

当年秋末,陈登科同鲁彦周合写了电影剧本《柳湖新颂》。冬季,陈登科又写出了另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卧龙湖》可以说这两部电影是写与拍同步进行的,当两部电影文学剧本在1958年年底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发表的时候,1959年的2月,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柳湖新颂》和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卧龙湖》,便分别在全国上映了。

此前,陈登科自1958年2月至4月,还走访淮北12个县的30多个公社,上百个生产队,先后写出数十篇特写(报告文学)和9个短篇小说。8月出版散文集《春水集》。另外还在《人民日报》、《安徽日报》、《江淮文学》上发表了一些趋时文章。他说:为了歌颂“大跃进”,我是从新闻到散文、小说、电影剧本样样来,十八般兵刃齐上,可以说是竭尽所能地炮制了一系列“瞒和骗”的所谓文艺作品。

违心之作与“反右”挨打

1984年6月,在同陈登科校对我所编写的“陈登科生平与创作年谱”的一段时间里,我曾经问过他:如果说写放高产卫星的虚假新闻是中了圈套,受了欺骗的话,那么为什么后来又进一步写那些虚假的文艺作品呢?这其中有没有“个人”因素?难道仅仅因为年轻幼稚吗?

这话说出口之后,自感到问得太尖锐,我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敏感的深层次的问题。没想到他马上回答道:就本人主观方面来说,我为了保护自已,能够求得混过去。为着与上边的口径一致,合上领导的脚步。说了违心之言,写了违心之作。这些话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若就客观形势方面来说,其中原委你就要考察一下我在“反右”斗争中的遭遇了。

于是,我对“陈登科在1957”作了一番探究。

陈登科1940年(21岁)参加革命,才开始学

文化,1944年才学着写点报纸小通讯,1945年加入共产党,1948年开始文学创作,到1956年底,先后写出并出版中篇小说《杜大嫂》、《黑姑娘》,长篇小说《活人塘》、《淮河边上的儿女》,报告文学集《铁骨头》,短篇小说集《虹光》,散文集《治淮的人们》、《治淮通讯集》,共8本书100多万字。受到赵树理、周扬、丁玲等人的一致好评。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都是歌共产党之德,歌人民之德,歌民族之德的“歌德”作品。

建国以后,他的笔从单一描绘战争,逐渐伸向社会各阶层。特别是1956年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鼓励并推动着他在扩展题材范围方面进行尝试。于是,就有了发表在1957年第1期《江淮文学》和《雨花》上的两个短篇小说《爱》和《第一次恋爱》。这两篇描写爱情的小说,目的在揭露和鞭挞在婚姻家庭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败坏的腐朽思想和行为,直面现实爱憎分明,且笔锋犀利。

小说发表之初,《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文艺》、《文艺学习》等十余家报刊发表评论,有的说:“相当成功”,有的说:“很有教育意义”,还有的说是“文艺的新花朵。”

然而到了3月,情况发生了变化。3月5日《安徽日报》发表了由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大批判文章《什么思想在领导〈江淮文学〉编辑部》。文章指名道姓地批判陈登科的“爱情小说”。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但并没有引起时任《江淮文学》主编陈登科的“警觉”。他不单在各种会议上继续大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在5月6日的《安徽日报》上发表了《有保留地接受批评》一文,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接着又有一批反驳和争鸣的文章发表出来,甚至有人向中央告状。弄得省委“反右领导小组”非常被动。不得不再发表“一点说明”作以解释。出现如此“反复”局面,在全国“反右”运动中相当罕见。这笔账自然要记在陈登科头上。

转眼到了“6月8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内部下达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外部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这是为什么?》。“指示”与“社论”犹如“反右”斗争开始的发令枪。枪声一响,首当其冲又做过“充分表演”的陈登科成为众矢之的,大会小会,大报小

报,批判之声此起彼伏。是此时也,他只有“在自己家里规规矩矩地呆着,闭门思过”。这时,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在北京召开,陈登科的文学老师丁玲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这对被称为丁玲“爱徒”的陈登科实在是惊人的事件。9月,张春桥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的《灵魂工程师的灵魂》一文中,指陈登科“走上反动道路”;周扬在著名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报告中,指陈登科为丁玲、陈企霞们“驱使的工具”。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敲打”,给陈登科头上增加的压力,若用“雷霆万钧”来形容,绝不为过。

此时的安徽省文艺界已经打出了一个以省委文教部部长魏心一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主席戴岳为首的“反党集团”,文联42人,打出17个右派分子。《江淮文学》编辑部14人,打了12个。这么一来从部长、主席,到刊物主任、编辑,基本上一网打尽,可是,由安徽反右领导小组报出、又经《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17个“右派名单”上,居然没有陈登科的名字!

至于陈登科未被录进“右派分子”名单一事,笔者访谈有三种版本,此处只记述其中一个“可靠”的版本:周扬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安徽省委文教书记陆学斌说:陈登科我了解,是个老实人,工农干部出身,党培养出来不容易,有点错误帮他改正就是了。让陆学斌转告当时的省委书记曾希圣。陆学斌回合肥后,向曾书记委婉地转告了周扬的话,曾书记在同陈登科下棋连赢三局后,当他的面宣布:你那个右派不划了!

接着中央一声令下,陈登科同早已分散到全国各地不同工作岗位上的“文研所”同学们,都来到北京鼓楼东大街103号原中央文研所旧地,参加了关于丁玲问题的检查、交代、认罪。陈登科又在第9期《文艺报》上发表了检讨:《回到党的怀抱》。至此,他的右派危机得以解脱。

俗话说:死罪已免,活罪难逃。陈登科被下放到皖南太平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改造到次年稻谷初熟季节,便被派到上文所说的那个卧龙湖“监收监打”。不用说,惊弓之鸟,漏网之鱼的陈登科,此时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了。他又主动在1958年6月1日的《安徽日报》上发表表态文章:《听党的话,在劳动中锻炼》。从此,陈登科就像方徨信中说的那

样,“领袖一号召,就追逐那个乌托邦去了”。于是,陈登科就从“描写劳动人民强烈真情实感和力量”(周扬语),开始了向炮制假新闻假文艺的“转变”。

他看到的底层真相

虽然放高产卫星的“新闻”“合了领导的口味”,电影《卧龙湖》、《柳湖新颂》等作品“合上了领导的脚步”,但陈登科的“下放”生涯还在继续。1959年隆冬季节,陈登科又被派往安徽“西伯利亚”的阜阳地区古城亳县农村工作队。以他当时11级干部身份,担任张集区委,公社、食堂主任?怎么读这个官衔?次年又调往蒙城工作队,一下子沉入到社会底层的陈登科在那里看到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呢?他作过如下记述:

“当时的口号确实响亮:‘实现河网化,淮北变江南!’农民一听号召,男女老少,人人拿起锹锄,上了挖河战场,不分日夜,苦干了二年。结果是,河网挖成了,却不管用,既不能排,也不能灌,反而挖乱了水系,酿成水灾,最终是1960年为农民带来一场空前的灾难。”

“1960年春,我二次走访羊小寨。一进村头,五八年修建的大门楼,已经倒塌了。村里的人,不仅脸上无半丝笑容,手脚都肿得透明发光。至于村子里的房屋幸而未倒,可是房顶上的木料和柴草早已拆下当柴烧了。”

“有一次,一个工作队队员向我汇报说:他们生产队有这么一个女社员,下地干活时见了生黄豆就吃,见了生绿豆也吃,吃了还往家里偷,偷不到庄稼,草也要带一把回家……没过三天,那个女社员突然得了急病,性命危险,我向县里打电话,请他们赶快派医生来抢救。经检查断定是肠梗阻。开了刀,打开肚子一看,肠子里全是生绿豆粒子。事后我知道,她早上从食堂打回半盆稀糊汤,自己没舍得喝一口,全给她的丈夫喝了,自己没东西吃,才赶在别人前下地吃了生绿豆粒子。”

“小妞是我在亳县张集工作队‘收养’的一个13岁的女孩。一个老奶奶偷偷地把小妞的身世告诉我:小妞的父母全在六〇年春天死了,只剩下她和一个妹妹,家里原有三间草房,也在六〇年倒塌了,从此她成了孤儿。在敬老院食堂干

杂活时 ,竟被一个坏干部奸污……”。

“这个孙马庄 ,原有四十户人家 ,1959 年冬去掉十分之三 ,六〇年春又去掉十分之六。只一冬一春把好好一个村庄破坏光 ,院墙倒了 ,院子里长起蒿子 ,房子垮下 ,屋里也长起蒿子 ,整个村庄全长起这种驴尾蒿。我们好像在蒿子棵里钻来绕去 ,其实是走家串户。今天的蒿子地 ,也就是社员昨天的房屋场院……这庄有一个男青年 24 岁 ,猛一看有五十岁 ,长得像个‘木乃伊’ ,据医生检查和群众反映 ,心肝肺无病只是消瘦 ,可能是吃过××肉造成。那时我们工作队下来之前 ,省委就订过好几条纪律 ,其中一条是 :不准讲农村形势不好 ,至于病、饿、死、外流等等 ,在写汇报时 ,这些词句都不宜用。”

对“瞒和骗”的反思

看到的是“惨状”却要写成“美景”。对如此形势 ,陈登科落到“两难”境地。

当他面对满目荒凉 ,被“五风”扫荡一空的农村 ,面对“男人饿得打晃 ,孩子饿得透亮 ,女人饿的绝经、掉蛋(子宫下垂)”的时候 ,当他看到人民在挨饿 ,在死亡 ,并亲自处理一件一件“特殊案件”的时候 ,这个为了人民的解放 ,曾经浴血奋战的刚强战士 ,一个富有良知的党员作家 ,他的心在滴血 ,他的头脑在思考。所以 ,他愤怒地说 :五七年整掉了一大批敢想敢讲的、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 ,整掉了一批刚刚破土而出的文艺生力军 ,整得大家逢人只说三分话。五九年又整掉了一批敢讲真话的好干部 ,整掉了党内民主 ,整来一个用谎话编织的假“共产主义”给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所以 ,当“浮夸风”、“共产风”和颠倒黑白的运动蔓延的时候 ,人民在受难的时候 ,我的笔 ,不是在捍卫人民的利益 ,不是为人民鼓与呼 ,而是跟着去歪曲生活、假造生活 ,去欺骗人民 ,做了“帮凶”。我心中痛苦 ,我心中有愧 ,我的灵魂在被拷问 ,我感到这是违背自己的良心 ,是对人民的背叛和犯罪。有罪就要赎罪。《风雷》就是我的“赎罪之作”。

《风雷》是一部 50 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写的就是一场维护人民利益与损害人民利益的斗争。作者以热情的笔触 ,着力塑造了一个在淮海战场

上被人民救过命 ,转业后怀着感恩的情结到淮北来“寻父” ,因而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并向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作顽强斗争的区委第二书记祝永康的正面形象 ;同时 ,亦以犀利的笔锋 ,揭露了一个为了个人权力而不惜伤害人民、伤害同志的腐败分子区委第一书记熊彬。作者真实地描写了农民生活的贫困、艰辛 ,以及为了生存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拼搏。毫不含糊地提出了党员领导干部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 ,应该如何保持与发扬联系群众 ,依靠群众的问题。极具针砭现实 ,启人警醒的意义。“虽然这部作品也留有某些思潮的局限性 ,但形象大于思想 ,我们今天读着它 ,还是被那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活的人物形象所感染和震撼”。

值得研讨的是 :被批为“反叛”之作《风雷》的构思、孕育、动笔以至完成初稿一百章的写作 ,恰恰是反右派之后的 1958 年到 1960 年 5 月的三年之间。那几年 ,正是“假大空、瞒和骗文艺”大行其道的时期。就是说 ,陈登科一边为了“时局” ,为了“应景”去“批量生产”一些“歌颂”之作 ,而另一面却在默默地观察、思考、结构、书写、刻画“历史的真面貌” ,“传达出时代的内在信息” ,并以赤诚的心 ,把一部现实主义力作 ,被视为当代长篇小说精品《风雷》献给人民 ,捧上文坛。

陈登科的这段“真—假—真”的经历 ,可以说是一个作家不幸中的幸事。可相对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来说 :“种瓜得豆” ,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 ,恐怕是始料不及的。

方徨先生建议“再找一些这样的典型剖析一下 ,看看这些所谓‘奇迹’都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系统、认真地剖析那个荒唐年代的荒唐问题 ,将为人们留下深刻的教益。才是正确的、真实的对待历史的态度。”笔者正是基于此 ,写出了这篇文章的。

(作者为安徽省陈登科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萧 徐)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 ,凡转载本刊文章 ,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官越做越小的吴亮平

○ 唐宝林

(一)

2011年6月21日,解放初期在原上海中共沪西区委书记吴亮平领导下的部分老同志举行了座谈会。

吴亮平在1986年逝世时,中共中央讣告曾给予崇高评价,说他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科学家”。应该说,在中国共产党人中,获得这样评价的人是很少的。但是,至今党内有些人,对这个评价不以为然,他们对吴亮平的革命功绩了解甚少,不明白他为什么“官越做越小”。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1939年斯诺再次访问陕北时就已经发现。他在后来写的《红色中华散记》一书中说:“吴亮平在我会见他时年方26岁(指1936年斯诺在保安初次访问党中央和红军,之后写了著名的《西行漫记》——笔者),是位……才思敏捷的知识分子,可已是党内有一定声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对他显然颇为赏识,政治局其他委员也都如此。”可是“我不知道他现在的职务,但对他(显然)没有跃居高位始终感到不解。”([美]埃德加·斯诺著:《红色中国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版。)

吴亮平1908年生于宁波奉化,12岁,以优异成绩考上上海名牌中学——南洋中学。三年中,他除学习课堂知识外,还读了共产党机关报《向导》等进步书刊。后来他回忆说:“读书开拓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知识,提高了我的爱国主义民族意识。”(《吴亮平未完成的自传》,《吴亮平文选》第40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2年版。)

1924年,他与200多名厦门大学师生在上海白手起家办起了大夏大学,以老同盟会员马君武为校长,该校收学费低,入学手续简便,又在沪

西工人聚居区,成为吸收穷困学生,为共产党培养不少早期干部的据点。吴亮平就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工人运动。目睹日商内外棉纱厂资本家残酷压迫中国工人的状况,“强烈地刺激着我,使我对帝国主义异常愤恨”(同上,第408页。)他这时担任了大夏大学学生会宣传部长,主要社会工作却是为工人举办文化补习学校。

1925年5月,终于发生因日本资本家克扣工人工资引发的罢工、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而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吴担任党中央领导的上海市学生联合会总务部长(即秘书长),受到中央代表恽代英的特别关照。他说:“我当时才17岁……代英同志从思想上、政治上对我进行了细心的帮助和培养。”在恽代英的推荐下,8月和10月,吴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此途竟与大他8岁的张闻天以及王稼祥、沈泽民、伍修权、孙冶方、王明等同路。到校后,他又住在张闻天和伍修权的隔壁房间。张像兄长一样关心帮助他,从此开始了二人几十年的战友与上下级的情谊。

在苏一年,吴又熟练地掌握了俄文。后来为译读马恩德文原著,又学了德文。于是他既是学生,又是课堂上的口头讲课与教材翻译,继又被聘为教员。同时还按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要求翻译了一些马列主义原著。第一篇就是恩格斯英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反杜林论》中的一部分,进而又参加了《共产党宣言》、《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等的翻译工作。两年的革命斗争锻炼和莫斯科生活,奠定了他成为共产党最早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也使他养成了追求真理,理论联系实际,热心革命,密切联系群众,大公无私,为人正直,是非分明,对同志热诚,同时也能顾全大局而

委曲忍辱等可贵的思想作风。没有想到,正是这些崇高的品性和修养,不为党内别有用心的小人所容,生出无数的怪事来。

逆风知劲草,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在国内革命失败和悲观的情势下,大量人员退出共产党和革命阵营之时,他却由周达文、张闻天等人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张闻天也因与吴有许多相同的品质,十分关照他,还把王明暗中打击他的情况告诉他,力所能及地保护他)。但也因为这样,他那平坦的人生之路也过早(19岁)地结束了,走上了荆棘满地的坎坷历程。

(二)

莫斯科中山大学,并非世外桃源,内部充满着当时联共内部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共产国际(实为联共)与中共(实际是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以及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国际代表团)、中山大学内思想纯正作风正派的学员与一小撮投机分子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吴亮平同班的王明,就是一个怀有野心、利用这些矛盾投机钻营的人。吴亮平还因其夸夸其谈,只知背诵教条而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而厌恶他。但他深得当时副校长(后来成为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的米夫欢心,先后成为学校的学生公社主席和支部局书记,大搞拉帮结派,对不愿追随他们的正派的同学进行残酷打击迫害。他因见吴亮平在同学中成绩不错,几次拉拢他。吴则对他的为人很看不惯,不屑为伍。从此埋下祸患,以后吴被他屡屡打击。先是把吴打成“江浙同乡会反党小集团”成员。这个莫须有罪名被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否定后,王明集团在打击瞿秋白的过程中,又把吴视为眼中钉。在苏联反托派运动中,把俞秀松、周达文等一大批反宗派教条的优秀干部打成“托派分子”,进行开除、监禁甚至杀害的残酷打击。这时因为吴亮平已经回国,幸免于难,但又难逃王明回国后的打击。

1929年10月,因不满中山大学的教条主义的教学方针及王明集团的宗派主义行为,同时为国内火热的革命斗争所吸收。吴亮平在瞿秋白的帮助下,拒绝校方的好意挽留和优厚的生活条件,回到白色恐怖中的祖国。吴亮平回国时,受到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政治局常委)的热情接待,作为中宣部的代表参加中央文化委员会的领导,与文委书记潘汉年一起,首先解决了一年多来几个文学革命团体如创造社、太阳社等与鲁迅之间的争论。吴亲自向鲁迅传达了中央的三点意见:

一,文化工作者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不应该争吵不休;二,我们的同志攻击鲁迅不对,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

然后吴亮平和潘汉年征求了鲁迅的意见,鲁对攻击过他的同志表示理解,认为他们的心是好的,只是态度不好,并同意成立“左翼作家联盟”。接着,吴与潘做了大量工作,使“左联”得以在1930年1月底成立。吴在筹备会上,代表中宣部讲了话。(参见吴亮平《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若干问题》(1978年6月15日),《吴亮平文选》第270页。)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的又一大贡献。但是因为过去不许宣传,鲜为人知,甚至不少研究鲁迅的学者也不知道。

接着,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吴亮平又代表中宣部参与筹建了“中国社会科学界联盟”,编辑《寰球》旬刊,编写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民族民主革命情况,介绍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形势,帮助人们了解国际情况,鼓舞革命斗志。还在中宣部日常工作之外,出版了专著《社会主义史》,编译《辩证唯物主义论与唯物史观》,全文翻译了《反杜林论》(此书随着中共党史和革命与建设的发展,到1979年文革结束后五次修订出版)。回上海一年间,当时才22岁的他总共完成了100多万字的著译,给成立后就忙于革命斗争而理论准备不足的共产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但是,1930年6月,王明调任中宣部秘书主持日常工作后,把苏联的肃托运动引进国内,害死了党内许多优秀干部。对吴亮平,因没有抓住任何把柄,就把他说成是“托派嫌疑”、“老机会主义分子”,明里暗里进行整治。吴亮平反驳说:“不是机会主义且不说,我才只有二十出头,‘老’字从哪里来?王明哑口无言。(吴冷西等:《悼念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吴亮平老师》,中央党校《理论月刊》,1986年第11期。)于是,王明就撤销了他的职务并调离

中央机关，“下放基层锻炼”，去马路上贴标语，撒传单，搞飞行集会。吴亮平回忆说：“那时我满怀义愤，心想你王明可以撤我的职，但撤不了我革命的决心，宣传马列主义的决心。”（吴亮平《〈反杜林论〉中译本五十年》《文汇报》1982年5月12日。）当时他生活困难，靠在法政大学代一点课的收入生活，除参加支部规定的活动外，他全书翻译《反杜林论》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此书虽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但文字深奥，特别是杜林的话，故弄玄虚，难于索解，他就把德文版原文，参照英文版和俄文版，力求译得明了，所以整整译了3个月。但因适合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出版很快，11月出版了这个中国第一部《反杜林论》全译本。12月，吴亮平在马路上偶遇已经任国民党要职的某大学同学，躲避不及，以共产党嫌疑被捕。在狱中，他与难友彭康、廖沫沙、周立波等，与反动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向难友系统讲课《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他因“大赦令”而出狱。这时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已经篡夺了党的最高领导权，并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但他害人之心不死，临走前，布置说：等吴亮平出狱后，将他送到某一苏区去，秘密把他杀掉。当时在特科工作的战友张庆孚告诉他这个秘密后，催促他立即离开上海。张闻天代表中央审查了吴亮平在狱中的表现后，没有理会王明的阴谋，立即将其安排到苏区工作。（参见雍桂良等著《吴亮平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但是，吴亮平躲过了这一次谋害，却躲不过抗战爆发后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的又一次打击。王明和副代表康生这次回国，借斯大林大肃反大屠杀旋风，与康生合作再掀肃托运动，又害死一大批优秀干部，并把吴亮平的“托派嫌疑”提出来，撤销了他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职务，排挤他到地方工作。毛泽东在1938年9月六届中全会上，借助共产国际斯大林支持毛的力量，粉碎了王明的野心，但吴的“托派嫌疑”拖到1941年中央审查七大代表资格时，才由任弼时向其宣布，解除嫌疑。吴在被解除中宣部副部长后，就被毛泽东及对毛搞个人崇拜的干部边缘化了，到地方上逐步降级。所以1939年斯诺再次访问陕北时自然“不知道他现在的职务”，并且“显

然没有在中央跃居高位”。

这里就涉及毛泽东与吴亮平关系问题了。

（三）

1932年11月，吴亮平到中央苏区红军学校做政治工作，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初识毛泽东。这时，毛40岁，吴才24岁。一见面，毛就说：“你是吴亮平《反杜林论》不就是你翻译的吗？”“这本书我看过好几遍了，今天碰到你，很高兴”。（吴亮平《永远铭记毛主席关于战斗唯物主义的教导》《红旗》1978年第1期。）毛泽东在红军打漳州时看到了一些书，其中就有《反杜林论》。后来长征，丢掉了许多东西，但这本书没有丢，一直带到陕北。由于经常阅读这本书和其他马列主义著作，经常请教吴亮平，后来又请吴当他接见斯诺及其他到陕北访问的外国友人的翻译或写信，在开初好几年，毛对吴十分尊重，在通信时，还称他为“亮平兄”、“亮平老师”，并给他的功绩崇高的评价。特别是翻译《反杜林论》和由于斯诺《西行漫记》在世界上的畅销而引起的巨大反响，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从被严密封锁的陕北地区传播到全国和全世界，给毛泽东和中共带来巨大的正面影响，毛泽东称他“功不在禹下”，意思是引进马克思主义，引出中共和中国革命的影响，这一进一出，像大禹治水疏通河道那样，其功大矣。吴亮平则在听到并见到毛泽东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军反围剿及长征中的事迹，也十分崇敬，并在任何情况下，都竭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形象。

但是，后来接触多了，特别是延安整风和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后，也了解到毛泽东的许多弱点，正如他在“文革”后党中央1979年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所说：“从毛泽东个人来说，他犯错误的根源有三：一是帝王思想，二是小农意识，三是骄横专断”（转自高山、吴菲菲《追忆亮平大伯》《吴亮平传》，第323页。）这是没有与毛泽东近距离接触多年的人是无法概括的。但这又是吴亮平难以接受的。虽然由于毛泽东学斯大林，纵容众人搞对他的个人崇拜的气氛中，从吴的地位处境来说，他不能提出批评。但他与毛二人的关系，自然也不再融洽。

吴亮平心境复杂，一方面他必须从党和革命利益的大局出发，竭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和威望。另一方面，又有一种“伴君如伴虎”的心态，又不愿曲意奉迎，对毛搞个人崇拜和迷信，因此也渐渐感到不相适应。特别从毛泽东对张闻天的关系中，他看透了，决不能长久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的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曾反对和批评过毛泽东。但有的批评是正确的，如毛搞的“肃清 AB 团，而形成党内恐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1 页。）有的错了，如反对罗明路线，特别是反对“邓、毛、谢、古”，从而在毛心中记恨一辈子。如毛毛在《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中华儿女》1999 年第 9 期。）中所说：“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记怨又记恩，看人和处理人，不免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但张闻天的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他的为人，与吴亮平有许多相似之处：光明磊落，豁达睿智，从来不争权，不图名。所以在实践中认识到错误后，立即与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说服博古辞职后，帮助毛泽东复出，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周恩来为首的“三人军事小组”。由于张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家都拥护张任总书记。因为张不接任，致使有 20 多天党内无领袖。最后，张见实在推不掉才接任。（1997 年 3 月 22 日杨尚昆会见刘英时的谈话，《百年潮》1998 年第 4 期。）之后，张更尊重毛泽东，一是注意民主，实行集体领导，纠正博古时期的独断专行，尤其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二是重视发挥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作用。所以，毛泽东这时期对张闻天比较满意，戏称张为“明君”，自己为“大帅”。（《何方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1 页。）因此延安整风前几年二人关系较好。

但是，在毛泽东心里，如上所述，张闻天在任“左”派中央第二把手时批评和压制过毛，毛耿耿于怀，等待时机要算总账，张闻天初出茅庐，没有什么工作成绩和实际经验，只靠从莫斯科带回“几麻袋教条”就跃居高位，毛不服，甚至鄙夷，说他是“洋房子先生”，“言必称希腊（指马列）”，只了解苏联皮毛，对中国则“一事不懂”；张被大家看作理论家，三天两头发表文章，动辄引证马列，既引起他的反感，也对他形成很大压力。毛对张

的合作只是当时条件下的临时的需要。所以，毛泽东虽然说张是“明君”，实际上如李锐所说：毛泽东后来“谈到王明路线和洛甫任总书记时说‘你当权不如我当权’”。（《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5 页。）

从张这方面考虑，固然佩服毛的领导和军事才能，但也觉得实在不好相处。他已明显感到毛容易猜疑和记怨，而且很厉害，在一起共事处处要留神，而对毛轻视马列和世界文明，也不以为然。正如黄克诚所说：毛喜欢顺着来的人。张闻天不会，也不想学。于是张终于逐渐被毛排斥。二人分裂公开化的首个事件，是 1938 年毛与江青结婚。当时多数中央干部和地方领导同志（通过电报、书信）都反对毛与江青结婚，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大家都反映到总书记张闻天那里。张原以为结婚是个人的私事，别人不便干涉。但见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领导人的婚姻不能等闲视之，就把大家意见综合后，给毛写了信，比较婉转地传达了。毛泽东读罢勃然大怒，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何方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1 页。）

于是，到延安整风时，张闻天便被清算。传统说法是延安整风主要是反对王明、博古，但此二人已经靠边站，主要目标却是张闻天（教条主义的代表）和周恩来（经验主义的代表）。整风后大肆宣传毛泽东从遵义会议起就是“党内的总负责人”，“毛泽东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把张闻天和周恩来的实际作用和历史真相完全抹杀了。而且，张闻天写的一些党内文件和文章，如张闻天与周恩来起草的《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张、周和林伯渠等起草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都成了《毛泽东选集》的“伟大篇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中央档案馆藏。该《意见》称，经过中共有关部门的审核、考证，发现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 160 余篇著作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 12 篇，经毛泽东修改的有 13 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其他领导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还把西安事变时，毛泽东主张审蒋被张闻天纠正，红军到陕北时张闻天出面纠正陕北根据地肃反扩大化，营救刘志丹的事，

都记在毛泽东的身上。1959年,张闻天支持彭德怀反对毛泽东饿死几千万人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左”路线,终于被彻底打倒,成为“反党集团”分子。

张闻天与吴同为留苏干部,理论上都比较强;二人品性相同,却都与毛格格不入。而且二人关系一直如师如友如兄弟,在莫斯科和上海已如上述外,到陕北后,吴又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张直接领导下负责中宣部工作,还参加了张闻天主持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的编辑,并在张闻天兼管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担任编辑主任,具体担任编辑工作。因此吴亮平的子女曾说:张闻天是吴亮平生前最崇敬的人之一,而且也是对他影响最深的人之一。(《吴亮平传》,第264页。)而且因为吴与张闻天共同反对毛与江青结婚(30年代初吴在上海文委工作,知道江青的底细,自然与许多高级干部一起反对毛与江结婚)。于是,延安整风在清算张闻天的同时,吴也遭到株连。自然,吴亮平常常帮助毛泽东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帮助他接待斯诺访问及写作《矛盾论》、《实践论》的历史真相被一笔抹杀。吴亮平对毛、张关系的发展,十分清楚,回忆这段历史时,亲口对人说:“因为毛泽东和张闻天当时都是我的领导,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至今我都历历在目。”(同上,第262页。)

(四)

1949年全国解放后,党内出现了急于过渡和阶级斗争极端化的左倾路线与重点发展国民经济的稳妥路线的斗争。吴亮平拥护后者。他首先在1953年“高、饶反党事件”中,调到北京挂起来,停职一段时间。后来刘少奇亲自过问,才出任化工部副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为我国化工行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并对当时好大喜功的计划亲自写信给上级领导人提出意见,但却又被指为“反党”。吴坚持民主作风,反驳说:在工作中要允许提不同意见,对领导同志有意见不等于反对领导,更与“反党”扯不到一起。在调查中,他发现个别省用国家拨款建造化肥厂的钱用于建造宾馆,又提出批评,惹得省里同志不快,说他“管得太宽”。但是他坚持为党和国家的利益干实事,说实话。(同上,第149页。)

吴亮平的这种思想作风,与当时主流派的干部格格不入,于是又被排挤。1963年10月,调到国家经委降到企业管理局工作。有人怕他不满,试探地问他:“副部长到经委似乎应该是副主任!”他立即挥挥手说:“这没有什么。我们是去做工作的,管它是主任还是委员。”

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失败后,一度退居二线,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主持政府工作,注意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的先进经验,让吴亮平牵头运用“托拉斯”的组织形式来管理工业、交通企业。吴又做出了杰出贡献,实现了我国工业管理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吴亮平年近70岁,却感到“天亮了”,心情非常舒畅,发挥他在理论和经济建设上的长处,积极参加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勤奋写作一系列经济建设文章,为党中央献计献策,并为大量战友中的冤假错案的平反而热情奔走。

吴亮平一心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名利。正如他在上海解放初对工人干部陈祥珍所说:“革命胜利了,人民感谢党和领袖,这就不好了,应该是党和领袖感谢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问题。”(陈祥珍:《在亮平同志教导下成长》,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吴亮平在沪西》,2006年内部出版,第48页。)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歌颂领袖、歌颂党是“人民大救星”的教育的今天,听听吴亮平这个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的基本原则的教导,实在有振聋发聩的震撼力。■

(2011年6月21日,解放初期在原上海中共沪西区委书记吴亮平领导下的部分老同志举行座谈会,缅怀吴亮平。本文的一些内容来自于这次座谈会,特此致谢。)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萧 徐)

本刊启事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第二次“伍豪事件”

。 丁 伟 郭德宏

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炮制了一个所谓的“伍豪事件”。当时，他们以周恩来五四时期曾用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和《申报》上分别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企图达到污蔑周恩来、瓦解共产党在白区革命力量的目的。但这个“脱党启事”，完全是捏造的。因为在刊登启事的前两个月，周恩来已经离开上海进入了中央苏区，此时他正在江西瑞金工作，根本不可能到上海发表这样的“启事”。即便如此，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立即于同月也以“伍豪”的名义，刊登了反驳国民党特务污蔑的澄清启事。1942年延安整风时，周恩来也将此事原原本本叙述清楚，完全澄清了这一历史事件。

可是，抗战期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效仿三十年代国民党制造“伍豪事件”的伎俩，又于1942年7月炮制了诬蔑“周恩来背‘党’投蒋”的假新闻，堪称“第二次伍豪事件”。

2010年11月，丁伟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查阅有关资料时，发现了一份“昭和17年7月20日在中国特命全权大使重光葵给日本外务大臣东乡茂德的‘有关周恩来脱党情报事宜’的报告”。（原件藏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编号为《各国共产党关系杂件 / 中国部 / 第八卷 1 昭和十二年分割 2》之【秘第589号】。以下照片所示汪伪政权之《中报》所刊《周恩来背“党”投蒋》消息和重光葵将此消息译成日文的附件，均出于此编号之档案。）昭和17年7月2日，即1942年7月2日，当日的《中报》刊登了一个《周恩来背“党”投蒋》的消息，说延安的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于这年4月8日刊登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周恩来叛党告全党同志”书，并说这个材料是“当地华字报纸《中报》从国民党特工总部入手得到的情报而转载的”。《中报》系汪伪政权周佛海派系在南京创办的大型日报，它刊登的这个消息内容如下：

周恩来背“党”投蒋

延安解放日报载告全党“党”同志书

暴露西安事变时蒋周秘密协定

（中央社京讯）四月八日、延安匪共出版之《解放日报》、载有所谓《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周恩来叛党告全党同志书》一文、文中将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与共产党间之秘密、以及共党骂周恩来背叛之内幕、暴露无遗、兹志全文如下：“亲爱的同志们、有一件最使我方感到悲痛、又最使我们愤恨的事发生了、这就是周恩来的背叛本党、投降了卖国的国民党了、固出于我们意料、但已早在我们意料中、当西安事变时、我们本是主张把蒋介石杀了的、因为杀了蒋介石、我党就可扩大、有获得全国政权的可能、但在那时、周恩来假借党全权代表的权力、出卖全党的利益、与蒋介石私订下了口头协定、放了蒋介石、周恩来在事后即得了一笔巨款五十万、存在香港汇丰银行、这是蒋介石给的报酬（这件案子是本党委驻港代表潘汉年、在去年秋天调查出来报告中央的、中央曾于本年正月间、去电询问、复电云‘事实胜于雄辩’、等到香港给日本占领后、英美各地银行之账目有被清理可能、周于是因此心虚、而遂出此叛党一途、实在中央同志念周之过去历史、并不忍因此一案而革其党籍、曾电在渝之董必武同志、将此意转达邓颖超同志、而周竟不信任中央同志诚意、而冒昧出此叛党一途）、西安事变以后、周任本党代表、与蒋介石谈判各种问题、结果均于本党有害、□属丧心病狂、廿七年张国焘叛党躲避、周并为其辩护、实际上张已作了蒋介石的反共先锋、又有名的‘限制共党办法’、即出诸张之手笔、而周恩来实与张一鼻孔出气也、廿九年苏北皖东之摩擦事件、韩德勤李品仙等部队、向我新四军江北部队围攻、中央曾一再电周促其速与蒋介石严肃交涉、而周置若罔闻、反报

告中央、谓蒋介石已号令韩李停止、不料□□发猛攻、我新四军江北部队、死伤殆尽、周反要求下令新四军停止摩擦、于此可见周已早蓄叛志、三十年蒋介石下令解散新四军、逮捕叶军长、击毙项副军长、杀害我党重要干部数百人、我党部中央电知周恩来、速向渝蒋谈判、如不收回成命、释放叶军长、赔偿损失、我党即将誓师灭此仇人蒋介石及其军队、电发十日、周尚无答复、再发一电催复、过了三天、周才有复电、文云‘吾人应处以镇静、万勿意气用事’、由此可见周已不复为本党之代表、而俨然蒋介石代表之口吻矣、我们从以上报告、几件比较重要的事实看来、可以证明周恩来早已不是本党的同志、而为国民党的间谍、中央同志对自己的批判、是过去对周的态度过于宽容了、如在发觉他有可疑之处、即当迅于处置、不致有今日这么的损失、我们由此教训、告诫全党同志、防止意志薄弱的分子、成为张国焘周恩来之第二、中共中央委员会、四月一日、完”

重光葵在给日本外务大臣东乡茂德的报告中,还将汪伪政权《中报》所刊上述内容译成日文,作为附件,供东乡茂德参阅。

文中虽然说此消息是“当地华字报纸《中报》从国民党特工总部入手得到的情报而转载的”,但经过核查同时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有关文献,并未发现有关这个事件的任何记载,同时考虑到抗战时期国民党蒋介石与汪伪汉奸政权的对峙状态,所以,我们可以暂时将制造这个所谓的“周恩来背‘党’投蒋”消息,界定为汪伪汉奸政权单方面所为。

这个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周恩来叛党告全党同志书》,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捏造的,因为漏洞太多了,捏造的痕迹太明显了。无需对文中涉及的事实详加驳斥,仅仅指出下列几点就可以了:

第一,郭德宏查阅了1942年4月8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面根本没有什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周恩来叛党告全党同志书》;核查同时期其他党内文献,也无任何相关记载。

第二,从1927年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就已经不再叫“中央执行委员会”,而改为“中央委员会”,因此,在1942年,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什么“中央执行委员

会”,只有国民党才有“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三,中国共产党除在早期使用过“党部”的名称外,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不再使用“党部”的名称,因此,在1942年,根本不可能称自己为“我党部”,至于“我党部中央”的说法,更是不通之至,“党部”这个名称,也主要为国民党所使用。

第四,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的所有文件,用的都是白话文,根本不会使用这种半文半白的文体,只有国民党的文件才使用这种文体。

因此,完全可以断定,这个所谓的《周恩来背“党”投蒋》消息,完全是汪伪国民党特工总部捏造的。捏造的目的,是用来混淆是非,以假乱真,颠倒黑白,企图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这个捏造的《周恩来背“党”投蒋》,所涉及的机构名称,如“中央执行委员会”、“党部”,为什么与国民党的机构名称相同或类似?其文字表述为什么也使用国民党文件常用的半文半白文体?这或许是因为汪精卫集团是从国民党内部分裂出来,习惯性地沿用了以往惯常的文字表述和机构名称,也或许是出于挑拨抗战中的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考虑。

此污蔑周恩来的消息在汪伪政权的《中报》刊登后,并没有在社会上和国共两党中引起什么反响,因为经过查核,至今尚未发现国共两党任何一方针对此事的有关文献。汪伪特工总部幻想以此为全民抗战制造混乱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成为汪伪汉奸政权投敌卖国、破坏抗战的一个新的铁证。■

(作者丁伟,现为旅日学者;郭德宏,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原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启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过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北京市房山区

102488 信箱 3 分箱

收款人:崔秀岭 邮编:102488

为什么只有一位井冈山籍的开国将军？

○ 孙 伟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军衔时有一千多位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被授予将军，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土地革命时期参加红军的农民。如果留意一下将军们的籍贯，人们不难发现，他们大都集中于最早掀起土地革命和创建红军的江西、湖南、湖北，其中又大多集中于几个“将军县”。像红安、金寨、兴国、平江等县，恰恰又是当年参加红军人数最多的县份，也是登记烈士人数最多的县份。例如湖北的红安县出了61位将军，全县却也有14万人牺牲；江西的兴国县出了54位将军，当年全县也有数万人牺牲。

井冈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据统计，从1955年到1965年，在全国被授予将帅军衔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有56人，约占总人数的3%。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开国将帅中，有元帅5名、大将3名、上将15名、中将21名、少将12名。

井冈山斗争时期大约牺牲了4.8万名烈士，井冈山人民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我们却看到另一组数据，源于吉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于2004年编并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吉安人物》一书。吉安地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心，吉安人民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有50006人，可是在所辖14个县市，牺牲最少的却是井冈山籍的，计355人，占总人数的6%；即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只牺牲319人，在相关根据地中，也是数目最少的。

而且从开国将军们的籍贯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首批一千多名开国将军中，井冈山籍的只有一位。他就是生前担任过广州军区原顾问的赖春风少将，系原宁冈县古城镇沃壤村人。直到2000年5月，原井冈山市与原宁冈县合并组建新井冈山市，这才勉强挤进一位井冈山籍的将军。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是毛泽东最早建立农村根据地、最早实行土地革命的地方，为什么井冈山籍的将军如此之稀少呢？

首先与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有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处于湖南、江西两省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境内重峦叠嶂，连绵不断。这里不仅地势险要，而且有着丰富的物产。在连绵的群山中，分布着许多丘陵、半丘陵、盆地，土地肥沃，盛产粮油。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物产，使得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谈到：“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同时，也指出这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可见，这里优越地势和物产丰富背后的是地处偏隅、交通闭塞、人烟稀少，农业经济相对落后。

在当时毛泽东的心中，更看重的是井冈山这个地方，是国民党统治薄弱地区的农村的广阔回旋空间。因此，这种先天的自然条件很难产生大量的本地兵源，也很难出现许多接受过较好军事教育和文化教育的高级将领。在毛泽东上井冈山前，袁王的部队中，领导人物袁文才是永新县禾川中学的肄业生，算是一个文化人，王佐是一个文盲，手下人也大多不识字。

第二个原因，与当时的《井冈山土地法》有一些关系。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回顾自己探索和学习战争的过程，就提到这个问题：“我在井冈山搞得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纲领。”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的土地路线在不断地进行完善。根据湘赣边界从1927年冬至1928年冬一年来土地斗争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共中央第37号通告《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以及中央六月来信中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精神，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讨论和修改，毛泽东于1928年12月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该法是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土地法。1941年在延安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一书中正式刊印该法，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该法全文共9条，共约1500字。包括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如何分配及分配数

量、征收土地税、红军人员土地的耕种办法等内容。由于此前几乎无经验可鉴,后来毛泽东在重新发表本法时,加按语作了说明:该土地法有几个错误:(1)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2)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3)禁止土地买卖。

严格地讲,《井冈山土地法》受到了苏俄革命时实行“土地国有”制的影响,没收地主的田地后归公,属于苏维埃政府所有,只交给农民耕种,不是分给他们当成私有财产,也不许买卖。因此,井冈山当地农民参军参战的积极性并不太高。红四军中出身井冈山籍的人不多,部分原因正在于此。

朱毛红军主力下山后,到了江西省兴国县,在这里重新制定了一部土地法,从而解决了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扩大红军的根本问题。《兴国土地法》与《井冈山土地法》相比,有一个最根本的变化,就是不再没收一切土地,只没收地主的田地,而且分给农民。这等于是承认农民的土地私有,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得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而不是属于公家的土地,参军、参战、保家保田的积极性就马上就调动起来了。如毛泽东搞过调查的长冈乡,青壮年男性80%都参了军,兴国县也因此被毛泽东表扬为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苏区模范县。在毛泽东、朱德创建的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8万红军中有2.7万是兴国县人,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只有2000人,等于长征每走一里路就倒下一名兴国籍战士。兴国也因此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将军县之一。

最后一个原因,笔者认为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后果。1930年2月23日,袁王二人在江西省永新县城被诬陷杀害。袁文才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32团团团长,还被先后选为湘赣边界工农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红四军军委委员、红四军参谋长、中共宁冈县委常委委员等职。王佐曾任红四军32团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红四军军委委员,并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1团团团长、红五军第5纵队司令等职。这两位英雄都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在当年的朱毛红军和湘赣边界地方政府中都担任过非常重要的职务。

湘赣边界特委这次精心设计的“军事阴谋”,成功

地杀害了“袁文才、王佐及其排长以上干部40余人,至于部下有1/3的人编入了红五军,其余的人则遣送回家”。特别指出的是,当晚在永新城遇害的有1927年9月作为袁文才的代表到三湾的陈慕平和王佐的结拜兄弟刁辉林,1927年6月进攻永新城的敢死队队长、后任32团特务连连长周桂春,以及32团军需处长、智囊李筱甫等骨干分子20多人,死者中不少人都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过突出贡献之人。

此处,可见袁王部下的命运主要有三种:一是对当时的重要骨干和亲信,当即进行了剿杀;二是将部分普通战士编入了红五军;三是不愿受编的战士,被遣送回乡。著名的张国华中将,于1929年3月参加红军,当时就在王佐领导的红四军32团4连当战士、司号员,时年13岁。当晚他也在永新,之后被编入了红五军。不过,张国华是江西永新县人,这又与井冈山籍擦肩而过。上文提到的赖春风,当时年仅17岁,也被编入红五军,幸运地成为袁王部队仅存的一位井冈山籍的将军。

其实,袁王部下的命运还有第四种。袁文才、王佐等人被错杀,整个32团被解体,在各个方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反映最为强烈、情绪最为愤慨的当属袁王旧部和客籍民众。他们想不通:边界特委为何要把袁文才和王佐当作反革命杀掉?忠于革命的袁王为何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一种好心不得好报、跟着共产党走没有好结果、共产党过河拆桥的悲哀抵触情绪,在部分人心里滋长,那种过去曾经平息下去的仇视心理又瞬间迸发出来。

井冈山人民一段时间都被蒙蔽了,不再相信红军了,此后也没有什么人参加过共产党的队伍了。袁文才的部属谢角铭和王佐的哥哥王云龙,他们因故留下来没有去永新,而成为侥幸不死的袁王旧部最高首领。他们一度进退两难,因为当地党组织要没收王佐财产和追杀这些幸存的亲信。袁王旧部曾写信向彭德怀和中共赣西南特委申冤,不过石沉大海,没有产生任何作用,这才导致了后来的逆变,从正面走向了反面。本来还很革命的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部反水。可见,错杀袁、王后,共产党在井冈山失去了群众基础,失去了兵民胜利之源。

曾担任过当年继续“搜索”袁王旧部行踪的红五军第3纵队第4大队大队长的李聚奎上将回忆到,不仅几天的侦查结果一无所获,而且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对这个行动很反感,而对袁王的部队倍加爱护。贺子珍

的哥哥贺敏学也指出,萧克那么会打仗的人,1932年带兵来井冈山都没有打下来。说明什么问题?袁王被错杀,帮助了敌人,国民党反动派做不到的事情,特委帮他们做了。

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

沦入敌手达19年之久,直到1949年9月才由前身为朱毛红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18军的部队收复。■

(作者是井冈山干部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萧徐)

代购代邮

要读懂中国社会,请看杨继绳著《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著《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最新修订版再版,在2006年版本的基础上,更新了内容和数据,对社会阶层固化、阶层冲突、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等大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新的剖析。这本书为广大读者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代社会提供了新的信息和新的分析视角。该书对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吸毒者、性工作者、罪犯等社会群体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指出了改革前后三十年来这些群体的社会地位、生存状态、利益诉求发生了哪些变化,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变化发生,还指出了这些群体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对社会群体进行介绍和分析的基础上,以2008年数据为基础,确立了中国社会结构模型,通过这个模型展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问题和优化社会结构方向。

由于阶层流动减弱了,阶层继承强化了,从而出现了“官二代”、“富二代”和“穷二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在教育不公平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就业不公平,底层社会的子弟上不了好学校,通过艰苦奋斗上完了大学,也找不到好工作。因为好的工作岗位被上等阶层继承了。

阶层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社会公正又是阶层和谐的关键所在,一旦失去了公正,就很难有社会和谐。这本书批评了当前种种社会不公正的现象,指出了走向社会公正之路:制衡权力,驾驭资本。为了达到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目的,就得建立一整套制度体系。怎样建立这样的制度体系呢?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回答,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李锐反左文选》1957—1978年的20年,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灾难。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的恶果之一。

了解中国政治,必读李锐文章。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李冬君	60.00	8.00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张木生	58.00	8.00
文人陈独秀	石钟扬	39.00	7.00
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	金 雁	48.00	8.00
普列汉诺夫·陈独秀·顾准	靳树鹏	30.00	6.00
聆听历史细节	王 凡	36.00	7.00
高尚传	戴茂林、赵晓光	59.00	7.00
西路军——河西浴血、生死档案、天山风云	冯亚光	126.00	12.00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上下册)	邓 鹏	97.00	10.00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	施用勤译	58.00	8.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50.00	12.00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黄宗良等	246.00	20.00
难忘一九五〇——志愿军入朝参战60周年图文实录	丁 伟	48.00	7.00
我这九十年——一段革命家庭的私人记忆	任均口述王克明撰写	38.00	7.00
国学大师之死	同 道	29.00	7.00
人生三路向:宗教、道德与人生	梁漱溟	28.00	6.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最后的皇族	龙翔 泉明	38.00	7.00
我与中国民主同盟	梁漱溟	43.00	8.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何 方	39.80	7.00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	顾达寿口述 郑少锋执笔	28.00	6.00
党员、党权与党争	王奇生	48.00	8.00
望九琐忆——一位老者的20世纪	白永达	22.00	6.00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肖复兴	25.00	6.00
国家记忆	章东磐	98.00	10.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共和国大审判(二)——特别法庭内外纪实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采访	38.00	7.00
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	丁三著	32.00	7.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金以林著	48.00	8.00
红墙知情录(一—二—三)	尹家民	95.00	10.00
历史:何以至此	雷 颐	28.00	6.00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	徐 孔	29.80	6.0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沈志华主编	148.00	12.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张闻天在1935~1938	张培森主编	17.00	6.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7.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中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	78.00	7.00
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李立宁 孟新	4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22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侯井天	98.00	11.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8.00	6.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辉	38.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著	46.00	8.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张学良最恨日本，为什么打苏联？

○ 张晓丹 王海晨

张学良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史学界多有深入研究，唯独对中东路事件稍显薄弱。究其缘由，一是因为这是张学良打的一次败仗，张学良为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学者不忍心揭这块伤疤；二是他打仗的对象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苏联，他后来发动的西安事变不仅挽救了中华民族，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共产党渡过了一次生存危机，他有功于共产党，大陆学者多出于为尊者讳的传统心理，不愿意碰这一问题。

张学良是坦荡做人的典范，他在晚年自己揭开了这块伤疤。

对苏强硬，我父亲就是这样的态度

张学良一生最佩服的人是他老爸，不知是不是刻意模仿，反正他身上确实有许多“大帅”的遗风，对外强硬，即为其中之一。

翻开中华民国史，有人说是“一部窝囊史”，其实，还真有两件中国人对外强硬的事儿。这就是两次武装搜查外国使领馆的事件。一次发生在1927年4月6日，张作霖任安国军总司令的第二年；一次发生于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任东北保安总司令的第二年。

两次事件有同有异：相同之处有三：其一，搜查对象国都是苏联；其二，搜查目的都是为了“反对共产宣传”；其三：搜查手段都是军警武装查抄。

不同之处有五：一是主事儿的人和身份、地位不同，前者是北洋政府国家元首张作霖，后者是东北保安司令张学良；二是事件发生地不同，前者搜查的地点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具体搜查地点是苏联大使馆使用的旧兵营，后者搜查的地点靠近苏联的边城——哈尔滨，具体地点是苏联驻哈领事馆；三是苏联对两次事件的态度不同，对前者不了了之，对后者武装反击；四是东

北集团内部评价不同，对张作霖称赞不已，敬其威，服其勇，对张学良鄙夷不屑，鄙其少智，贬其鲁莽；五是国际上反响不同，对前者除苏联之外，西方主要国家都表示赞同，对后者，除日本幸灾乐祸外，几乎所有国家都表示“不应该”。

武装搜查外国使领馆，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少有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仅此两例，都是张氏父子所为。张学良有张作霖之遗风，此言不虚。张之宇、张之丙采访时提到这件事儿，张学良说：

我们为什么搜查俄国领事馆？主要是为了抓共产党。

搜查俄国使馆，这也是极端的秘密，我现在才说出来，这是北京公使团告诉我们去搜，这是他们帮忙的，这是很极端的秘密呀，他们知道，他们公使知道什么人藏在什么使馆。

那时候，一般也就是反对俄国干涉，就是不赞成，不能说反对，那么俄国跟中国共产党在这勾结，明白？也可以说忌妒。我们搜查俄国使馆，俄国一点都不知道。翻墙过去的，不是从前门进去的，所以当时人都不知道。最可惜的是那些文件，后来他们知道了我们进去了，就开始烧文件，烧了一部分，大部分叫我们都拿出来了，现在大部分存到美国去了。

张学良搜查苏联驻哈领馆就不同了，开始时西方各国、包括日本都表示支持或默许，搜查完了，尤其是战争打响之后，美英法各国均“印象不佳”。东北军内部也怨声载道：“有的说：‘东联孙吴，北拒曹操，乃策之上也；而今东抗孙权，北拒曹操，是乃走麦城之路也！’有的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今天，不顾条约上的诺言，又没有什么正当理由，竟将邻邦的使臣押解出境，这怎么能让四夷宾服呢？’”

两者相比，只能说，张学良没有老父老道，有其勇而少其智，不自觉地效仿大帅，得到的却是东施效颦之果。

我那时野心也很大,我要把中东路收回

张作霖野心大,张学良野心也不小。

中东路是根据1896年中俄《中俄密约》而修建的,1903年全线通车。最开始的时候称东清铁路,干线从满洲里向东至绥芬河,支线从哈尔滨起向南,经长春、沈阳直达旅顺口,全长2400多公里。日俄战争后,大连至长春段“转让”给了日本,称南满铁路,长春以北仍归沙俄,仍称东清铁路。十月革命后,东清铁路陷入混乱状态:当时任路局理事会理事长的霍尔瓦特为沙俄时期的将军,宣布东清铁路对苏维埃政权独立;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准备武装“夺权”;美国和日本要求国际共管;法国企图以债权国资格染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派军队解除了俄国护路队武装,接管了东清铁路。1919年,苏联宣布无偿归还东清铁路给中国。第二年,东清铁路改称中国东方铁路,简称中东铁路或中东路。1924年通过《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奉天协定》,苏联以共管的名义重新获得了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此后,苏联采取包括贿赂中方人员等各种手段,实际控制了中东路,中苏共管成为空话。

从张作霖时代开始,东北当局即开始了收回中东路主权的努力。1926年,苏方违反条约,拒绝运送中国军队,张作霖拘捕了中东铁路局局长伊万诺夫,武装接管了中东路。

张学良继承父亲的大权后,更是雄心勃勃,用他自己的话说,即:

我那时野心也很大,我要把中东路收回。

1929年3月,张学良为贯彻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路线,在“俄国理事不但不允许修改以前不平等的规定,反而想扩大俄方的权利,以致屡次会议,都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向苏方提出六项要求:(1)路局长之各种命令、公函及他项文件,非由局长及华副局长会同签字,不能生效。(2)路局所有支出应得到稽查局之同意,否则不得动用款项。(3)路局未经解决各案,交理事会解决。(4)路局各科处及沿线各段、各站,由中苏两方面平均分配管领。(5)其他职员之平均分配办法,逐渐实行之。(6)办事中俄文并用。

这些要求本属正当,却遭到苏方拒绝。于是,5月27日,发生了警察搜查该领馆事件。事件发生后,苏方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张学良电告张景惠、吕荣寰:对苏方抗议,“可囑径向中央交涉,被拘俄人在交涉未得相当解决,并经中央许可以前,勿予释放。”从这一指示中可看出,张学良在收回中东路权益上的强硬立场。

张之丙访问张学良时问:那时下面得提供一些军情资料啊,您才能做决定啊,那这些人都是谁呢?

你叫我说我也说不出来了。

张学良说不出的这个人叫张国忱,张国忱当时在东省特别区负责对俄外交,他身边有一个白俄顾问,名叫托玛舍夫斯基,是帝俄时代的将军,他向张国忱建议:“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共产党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刻发难,共产党必倒台。中国若能趁此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刻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另一个向张学良提供情报的是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他向张学良报告说:“苏联内部空虚,边防武装不堪一击,战端一开,必土崩瓦解,尤其连年收成不好,军需民食成大问题。即或引起战争,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们的。”

张学良接到“俄国通”张国忱和中东路督办吕荣寰提供的情报,便不辨真伪,信以为真,更坚定了他对苏强硬的决心,才有了武装搜查驻哈领事馆的事件。

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

此次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和张作霖搜查苏联大使馆性质是一样的,张作霖是否后悔,历史上没有记载,张学良确实是后悔了。

张之丙为了帮他回忆,读到:您接到蒋介石密电,说冯玉祥叛变,与哈尔滨苏联领事馆有关。于是张受挑动,密斥哈尔滨当局搜索苏联领事馆时,张学良说:

搜是搜了,与这个无关。

您搜出什么来了吗?

也没有,这件事我们做得很不好。

怎么不好？

没什么证据，叫人搜集什么呀？

那后来有了所谓“中东路事件。中东路这件事，你那天问我是谁挑衅，换句话说，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

这段话否定了史学界以往有关这一问题的诸多“成说”：

(1) 搜查驻哈领事馆，不是因为接到了蒋介石的密令，受蒋介石挑动而搜查哈领馆。

(2) 搜查哈领馆与冯玉祥“叛变”无关。

(3) 更否定了苏联学者所谓张学良是在帝国主义的怂恿、唆使下发动的反苏反共的挑衅行动。

(4) 搜查苏联驻哈领事馆，没有搜出来所谓“苏俄扰乱中国之证据”文件。

(5) 事件的挑起者不是苏联，而是东北当局。

最恨日本，我为什么打苏联呢？

在民国军人中，大多都和日本打过仗，但唯有张学良和苏军交过手。我们暂且不论这仗打得值不值，对不对，先看看张学良为什么敢于和苏军对阵。

张学良一直将日本视为东北最大的威胁，张作霖被日本炸死之后，日本更成为最大的仇人，为了摆脱孤悬关外的处境，以易帜的方式将东北和关内联成一体，想以全国的力量待机寻仇，何以突然间将目标转向了苏联呢？除他要收回中东路主权外，他还提到另外几种动机：

第一，提高东北的地位。

那时，要想东北的地位提高，就必须要打一仗，而且还要打赢。

为什么他要提高东北的地位？自东北集团和南方的北伐军交手之后，节节败退，在南方有些军人眼里，东北军被贬为“乌合之众”，尤其是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军纪败坏，被戏称为“纸糊的军队”，东北军的形象大受影响，都认为东北军不能打仗。东北易帜谈判过程中，南方蒋介石虽力主和平解决，冯玉祥却一直主张乘胜追击，根本不把东北军看在眼里。所以张学良才提出：“愿与国民政府谈判”，前提是“根据平等和平条件”，强调“东三省为中国之重要一部分，吾对于不令东三

省参与国家大事之图谋，绝对不同意。”1928年7月1日，张学良发表“决不妨害统一通电”后，媒体“有谓奉方求和，有谓奉方投降”的报道，更伤张学良的自尊。加上易帜前，中央政府是由东北军控制的，易帜后，控制中央政府的东北集团变成了地方政府，只能接受中央的摆布，这种地位的变化，也在张学良心中留下了阴影。各种因素，促使血气方刚的东北新统帅急于寻找一种途径振作一下东北军，提高提高东北的地位。

第二，张学良初掌一方，急于树立个人权威。张学良的权力是继承来的，不是靠自己拼出来的，东北军内部许多人，对他并不服气，他对此十分不满。他枪杀杨、常，最不愿意听别人称他为“少帅”，最恨别人说他是“黄嘴子将军”等，都透露出他不满别人看轻他个人才能、想树立个人权威的心理。他挑战苏联，同样有这种心理在起作用。

张学良在口述史中对此说得比较直白：

那时候，可以说是我大胆的作风。当时我想要树立自己的威权，总要把日本打败，或把俄国打败。

那时，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

第三，告诉日本，我敢打。

日本对东北人民的欺凌，是淤积在张学良心中无法排解的忧愤；日本的杀父之仇，是卡在张学良喉咙里的一块难以拔除的鱼刺。以往的著述中，许多问题都有涉及，但唯独没有人谈过张学良最恨日本，为什么他主政之后，首先把枪口对准了苏联呢？

张学良在晚年自己揭开了这个谜底：

日本人欺人太甚了，中国人不能靠近南满铁路，不但军人，连老百姓也不能过南满路，抓了就扔火车炉子里给烧了。

那日本的关东军总司令来吊孝……我明知道是他们干的事儿，我想把他杀了，后来明白我不应该这么做，这一做事情太大了，太厉害，我不能逞意气呀。

知道是他们干的，也知道是对头来了。

就是没办法，杀之不可，忍之不能。

恨日本为什么打苏联呢？

我怎么会跟俄国……因为那时我看，日本我们自己打不败了，所以我的目标是要跟俄国

打……我就想站起来……也是对日本一个表示,我敢打。

第四,自认为有把握能打赢

那时候我想我们的力量比苏联大。

看着苏联那些军队,我想我们能打赢。

那时候,俄国在东北的势力并不大。

武装搜查哈领馆一事发生后,苏联除提出口头严重抗议外,一方面在国内拘押华侨华商施以报复,一方面在中苏边境频繁调动军队。7月10日,张学良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武装接管中东路。这事实上已将战争的引信点燃了。

张学良此时也有些紧张,不过很快他又镇静下来,因为他收到一份最新情报,是蒋介石转来的,情报来自国民政府驻法国公使高鲁,电文中有这样的字样:“查苏俄外无国际同情,内无充分兵力,尚对我称兵,其政府必难巩固,各方推测,势所不敢。”苏联宣布断交之后,蒋又转来一份情报,是驻德公使蒋作宾发来的:“苏联人民不特不主战,且将极力反对战事。”“中东铁路地位本无保持之可能,云其交通总长宣言,除非中国侵入俄境,决不输送一兵。”“据各方消息,以现势判断,俄实外强中干,彼除用利诱威胁之外,再无其他方法。”几份驻外使节的新情报,再加上以前部下们提供的情报,更使张学良看轻苏联。

一开始,我们打赢了

1929年8月6日,苏联发布命令,为配合苏联阿穆尔河(黑龙江)舰队对中国军队作战,组建远东特别集团军。8月中旬,苏军进攻鸥浦、东宁等地。从此,中东路战争拉开帷幕。

中苏大规模武装冲突从10月中旬开始,持续了将近两个月。战争分东西两线。东线主要发生在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处的同江、富锦地区和黑龙江东部的密山地区,西线集中在内蒙古的满洲里和海拉尔地区。我那个时候啊,看不起苏联,我想我能打赢……而且一开始,我们打赢了。可后来,苏方另外调来军队,把军队换了,将领也换了,叫什么,加仑,我们才失败了,开始我们打赢了。

三江口我们打赢了。在三江口是海军,沈鸿烈在三江口把苏联的主力舰队打沉了。

几乎所有记述中东路战争的史书,都记载中国军队一开始就被打败了。为什么张学良说“一开始,我们打赢了”,而且明确强调“三江口我们打赢了。”是张学良弄错了?还是史家弄错了?

三江口,指黑龙江、松花江与同江的汇合处,也称同江口。三江口之战是中苏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海战”,其实是江战。苏军的作战意图是突破东北江防前线后,沿松花江逆水西上,矛头直指哈尔滨。

在这次战役中,中国方面功劳最大的是铁甲货运船“东乙”号,战前特从葫芦岛旧舰上拆下两门大炮,安装到货运船上,并将其事先隐藏在芦苇丛里。10月12日凌晨,苏军在飞机和舰炮火力支援下,突然发起进攻。芦苇丛中的“东乙”号发炮还击,苏军4艘战舰起火,旗舰“雪尔诺夫”号沉入江中,司令官、参谋长和旗舰舰长等70余人丧命(未得苏方资料证实)。苏方返回哈巴洛夫斯克。

这次中苏海军交战,中国共沉没舰艇7艘、武装驳船1艘,伤亡700余人;苏军舰船沉没5艘、伤4艘,损失飞机4架,伤亡舰队司令以下700余人。此战,虽规模不大,但苏军出动了陆海空三军,兵种齐全,中国军队终因众寡悬殊,无空军支援,致使东北海军江防舰队损失殆尽。

可以看出,张学良说“一开始,我们打赢了”,是有一定根据的,尤其是以改装货运船击沉对方旗舰,这在海军战史上也是以弱克强的奇迹。

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一枚纪念铜币,正面图案是一艘无动力战舰,背面有“中华民国十九年”字样,俗称“哈尔滨战舰”币。根据记载,此币就是为纪念在三江口阻击战中牺牲的将士和颂扬在战事中立下赫赫功绩的“东乙”号驳船。

我认为中央政府很不对,不但没帮忙,还拆台

张学良被问到“在中东铁路纠纷的时候,您去用兵,有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您在用兵之前有没有跟他们商量?”张含混地回答:

我自个儿决定就是了,不过我也对中央报告了。

“我自个儿决定就是了”,其实,这带有一种

“我做事，我负责”，与他人无关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这在张学良的整个口述史中随处可见。和后来“九一八”时“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道理是一样的。中央确没有明确什么时候用兵的命令，但蒋介石曾答应全力援助张学良和东北军。

7月10日，蒋、阎、张与外交部长王正廷等在北京举行会议，蒋主张“武力接管中东路，防止‘赤化’，甚至与苏断交，在所不惜，一旦中苏开战，中央可出兵10万，拨几百万军费。”蒋介石在7月19日日记中写道：“唯吾人深望能达到（对苏）绝交目的，而复对国内共党方有彻底办法耳”。

王正廷于苏联宣布断交的前两天表态：如俄人坚持来打，中方“决严重抵抗，不能任由赤党侵犯”。苏联宣布断交当天，蒋介石电告张学良：“如苏俄竟敢公然破坏世界和平，侵略我民族利益，吾人为世界和平计，为民族利益计，当以革命之精神，不惜牺牲一切，贯彻政府拥护国权之主张也。”

什么是“严重抵抗”？“牺牲一切”包括不包括用兵？这是不是作战命令？

张学良受骗了。在几个月的武装冲突中，南京政府只给过200万元资助，除此之外，没有一兵一卒的增援，没有一械一弹的补充。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希望啊，中央对我们有一个表示，可中央光用口说，只是派了一个李济深来，他也表示中央不能……所以我们就泄了气了。换句话说，中央是中央，我们是地方，不管是亲爸爸后爸爸，总之你是高一等的，那么中央没有一点表示，所以我们很伤心。

对这个事情后来我对中央……中央只是应承，你得自己干。我原来是服从中央的，后来我对中央……也就如此就是。

战争开始后，张学良意识到：“多撑持一日，即多一日之损失。且恐发生意外，收拾愈难。”张强烈要求中央尽速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蒋介石自知理亏，只得向张学良致歉：“暴俄知我国内乱，故对我提议与德国斡旋之计，均置之不理，且声言概不承认与德国有所接洽云。如此情状，我方求速而敌方反益延缓，使我前方将士与东北同志困难倍增，此心歉然，莫可名状。”然“以意度之，西北问题不了，则俄事亦连带延长，不能速了。”

这时的张学良既不能要求中央兑现承诺，也不能向世人解释什么，只能满足苏方的要求，恢复中东路原状，从东北地方的角度与苏方达成停火协议。

给他（李维诺夫）打电报，就是我们谈和。我们打败了，直截了当谈和。

那时苏联内部也有些事情，那时候苏联要是强的话这件事情也不能那么解决。换句话说，那件事情的解决，算对我们相当好，我们是打败了，苏联也没要求东西呀，他那时候自己有事情。

后来谈判的结果是，中东路董事会，那董事会里他多占了一席，他发言权大，等到投票决定时，他多一票。

我认为中央政府很不对，不但没帮忙，还拆台。

他把调唱得很高，谈不了，他不去谈，要我们谈，结果把谈判的姓蔡的还处罚了。

据张学良的外交秘书王家桢回忆：“有一天在沈阳北陵张学良别墅里，张学良表情非常悲伤的和我说：‘我最心爱的好军人韩光第旅长战死了，他所率的全旅人马也伤亡惨重，俄国军队已经越过海拉尔，指向哈尔滨了。’我对张学良说：‘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张将军喟然长叹地说：‘我有什么办法？南京只叫我们打，什么也不管。打既然不行，就得和吧。可是南京又不叫我们管和的事，这简直是整我们啊！’”

张学良在遗著中有一段话，实际是对中东路事件的总结，读来意味深长：

此一役也，暴露出我军事弱点，及全国不能团结对外的现象，促进日本野心军人，加紧侵略中国，造成九一八事变，缩短中日争端战争化之期间（限）。

暴露了哪些弱点？全国怎么样不能团结对外？为什么说中东路事件造成“九一八事变”？此前，虽有个别学者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但看到张学良这段话，仍不免有一种别样的感觉。学者只是根据史料分析、推导，当事人则是体验、总结。只可惜张学良写这段话时尚处在幽禁期间，不便展开。■

（本文作者张晓丹为辽宁张氏帅府博物馆馆员，王海晨为温州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萧 徐）

1956~1957 越南“双百”运动人物素描

○ 程映虹

作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近邻,越南政治经济改革的动向一直是中国的参考系。毫无疑问的是,越南经济改革相当程度上受到中国的影响。反过来,越南的政治改革(党的最高领导人差额选举,人代会对政治加强监督和质询等等)近年来在中国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但是,和中国一样,越南的改革思想并不是今天或者在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才出现的,而是在 50 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当时越南知识分子利用苏共 20 大和中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北越的影响,在 1956~1957 年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文”、“佳品”运动(名称来自当时两份有影响的民办杂志),是当时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民间舆论的最重要部分。这场运动在 1957 年秋天越南尾随中国发起反右斗争后被终止。对于那段历史的处理,中越两国今天有着不同的做法。在中国谈论 1956~1957 年的百花齐放和反右一般来说并不是禁忌,绝大多数所谓“右派”早就被公开“平反”。但在越南,官方始终没有重新评价那场政治运动,一直掩盖那段历史,但对于很多遭受迫害的个人已经在小范围“平反”。因此,今天的越南人,即使是那些参与民主运动和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对那段历史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对那些在 50 年代中期大名鼎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言行没有具体的了解。

和中国 50 年代中期民主观念和自由思想是由储安平和林昭这些名字所代表的一样,越南当时在这一方面也有一些代表人物。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把他们当中最有影响的一些人简要介绍给中国读者,从中我们可以对那场跨越国界的思想运动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陈寅

陈寅 越南的“胡风”

越南诗人和小说家陈寅,可以说是越南上世纪 50 年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中最先发出声音的人。陈寅是 40 年代下半期参加北越革命并入党的,他是一个充满爱国热情和艺术创造力、崇尚个性独立的艺术家。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为了从法国殖民统治下取得民族独立,加入越盟。

越盟是越南独立同盟的简称,其实就是越共,但为了得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支持,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共产党人没有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号,用的是越盟,后来又叫劳动党。陈寅的创造力很受器重,1954 年北越取得了对法国决定性的奠边府大捷后,他受军队总政治部的委派,前往中国撰写有关这个战役的电影剧本和小说。

当时越盟实行军事化,参加革命的艺术家居归军队总政治部管辖,住在军营里,外出都要申请离营证。陈寅在中国期间正好是胡风在万言书中批评党的文艺政策的时候,陈寅可能了解了有关情况。当时越军总政治部派了一个政工干部和他同行,指导他的创作,事事都要干预,陈寅对此十分厌恶。回国后,1955 年 2 月,他发起组织了军队中大约 30 名作家和艺术家联名向中央委员会上书,要求废除军队总政治部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把对艺术和文学的领导权还给艺术家和文学家,废除对文艺工作的军事化管理。在上书的同时,陈寅还带领大约 20 名文艺家面见军队总政治部主任阮志清,提出三项保障艺术创作自由的要求,被阮志清拒绝(阮在 50 和 60 年代的越南军队中地位仅次于武元甲,1967 年去世)。

在写作中，陈寅向官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只准表现社会主义和党领导的光明面）挑战，要求创作自由。当时越南党内主管文艺的权威素友出版了一本题为《越北》的作品，被官方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但受到了陈寅的批评和冷嘲热讽。



文艺界左派领导人怀青把陈寅当胸揪住，说“同志们，快来，这儿就是胡风！”陈寅辩解道：“同志们，单位领导，我发誓我的名字叫陈寅，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的出生证明！”

这幅漫画是陈寅的支持者在北越自由化时期（1956年秋）发表在《人文》杂志上讽刺文艺界领导人以“越南的胡风”为罪名迫害陈寅。

1955年中国批判胡风后，陈寅也被当作越南的胡风受到批判并下放到土改工作队。中国逮捕胡风后，1956年初他也被逮捕，在狱中自杀未遂。但在苏共二十大后陈被释放，后积极参加了《人文》、《佳品》运动，发表了很多作品。1957年秋天在越南的反右中陈寅受到清算，被下放劳动多年。他后来长期研究和创作先锋派作品，1997年去世。笔者在研究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找到陈寅的儿子陈崇武，他是美术家，90年代在美国留学，现在巴黎从事艺术创作，经常在国际场合和越南举行画展。

潘魁：越南知识界的长老

潘魁是越南德高望重的作家和学者，他的祖父1880年代时任河内总督，反抗法国入侵失败时自杀，成为越南民族主义的象征性人物。潘魁本人自1910年代起就组织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抗拒殖民主义，成为民族主义知

识分子的领军人物。越盟深知其社会价值，把他列为统战的头号对象，甚至把他的儿子也安排进统战报刊《祖国阵线》当编辑。但在《人文》、《佳品》运动中，潘魁受邀出任《人文》的主编，成为异议知识分子的一棵大树。

在写作上，潘魁的特色是依仗炉火纯青的古典和现代文化修养，用伊索寓言的笔法表达自己的政见。例如，他对越盟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看得非常透彻，认为知识分子只是在法国殖民当局和越盟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的情况下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只得和越盟合作，但在这种合作中知识分子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对于这种两难处境和无可奈何的选择，潘魁有过一个比喻：在他招待客人喝咖啡时，由于越盟控制的越北没有加进咖啡的白糖，潘魁就让客人嚼一些土产粗糖。他说“这些土产粗糖代表爱国主义，它可以冲淡咖啡的苦味，而这种苦味就像越盟的领导。有了这种土产粗糖，我们就可以在忍受咖啡苦味的同时欣赏它的芬芳，因为这种芬芳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尊严”。他大胆讽刺越盟对胡志明制造的个人崇拜，把它说成是封建主义和宫廷文化的产物，并把胡志明比作越南家庭中老而无用但却因为年深日久而被供奉起来的放槟榔的石灰罐。他利用越盟跟随北方邻国尊崇鲁迅的机会，在北越提倡鲁迅所代表的自由思考和人格独立，痛斥对思想和文艺的政治控制。在越南反右后，年近八十的潘魁被下放农村劳动，一年多后病死。他的儿子不久也死去，死因不明。



1956年秋，在苏共20大和中共双百方针的影响下北越文化意识形态出现解冻，潘魁代表越南文化界前往中国参加纪念鲁迅诞辰的活动。

陈德草：异议分子中的哲学家

陈德草是自由知识分子中西化很深的一个。他于上个世纪40年代末在法国得了博士学位，用法文在1951年出版了研究胡塞尔现象学的专著，至今仍是西方哲学学界的重要参考书。他希望民族独立，放弃了在西方学界的发展，于50年代初回国，来到北越，参加越盟领导的反法斗争。陈德草真心诚意地参加革命，接受改造，为了体现自己的真诚和与过去一刀两断，他甚至故意不用蚊帐睡在森林里，让自己得疟疾，因为这是很多游击队员的“职业病”。

陈德草一度也是越盟统战的对象，他受命创建北越国立大学并担任历史系主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权力高度集中、思想和创作自由受到压制的现实十分不满，加入了《人文》、《佳品》运动。他听说中共发表陆定一关于双百方针的讲话后，立即找人翻译，并向越共要求公开出版。陆定一的文章和周恩来发表于1956年2月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在北越知识分子和干部中广为流传，但直到1957年春才正式出版。陈德草发表了很多文章，批评越盟不顾越南实际，照搬中国模式推行土改、在农村硬性划分社会阶级、摧毁社会秩序和滥捕滥杀。他尖锐地指出，在土改中，整个省和区一级的政权结构都被重新改造了，造成了“整个农民阶级痞子化”。陈德草介绍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自由的本质是个人自由”以及“自由的内容”必须由“自由的形式”来保障的原则，挑战当时官方观点，即自由首先是集体的和社会的自由和“实质的自由”重于“形式的自由”。在越南反右后，陈德草被迫在报纸上发表批判自己的文章，后来被下放劳动，长期受到监视和压制，80年代被允许会见西方记者，但已不敢发表任何和官方相违的言论，直到90年代下半期被允许去西方治病后才在私下发表政见，1997年去世。

阮友灯：越共党内的开明派

阮友灯是参加越共革命的热血青年的代表，有点像胡耀邦，是党内负责青年鼓动工作的领导人。他最出名的一项工作是1945年9月2日胡

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宣布越南独立时，他成功地发动和组织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和群众到场，使得他的名字也载入了越南史册。后来他被任命为北越政府青年部副部长，负责实际工作。如果说他在思想上还不能说和潘魁等党外自由主义者完全一致的话，他和《人道》、《佳品》运动的参与者在具体政策问题的看法上是非常接近的。他支持陈寅等人要求创作和思想自由，在党内斗争中为这些人起了保护伞的作用，为《人道》、《佳品》的生存做了工作。当这两份杂志在“匈牙利事件”后被封闭时，他在1957年春天积极支持北越文联出版另一份《文学》杂志。在这份杂志上，原来在《人道》、《佳品》上发表异议的作者很快又汇集了起来。

当这份杂志受到越共《人民报》和《学习》杂志的批判时，他撰写文章为其辩护。因为他是党内开明派的代表人物，很多左派对他恨之入骨，尤其是越共党内负责文艺工作的素友和怀青。北越发动反右斗争后，阮友灯不但被开除党籍和撤销职务，1959年还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判刑15年。刑满释放后，他被放逐到一个偏远山村，在贫病交加中度过，探望他的人说他甚至以昆虫为食物，直到晚年才被允许回到河内，在亲友的接济下生活。

阮孟墙：呼唤民主与法制的律师

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越北，还有一批受过西方法律训练的历史和法律学者，他们从政权和法制关系的角度提出意见。阮孟墙是在法国得到法学博士学位的著名法学家和律师，他对土改中造成的滥杀滥捕穷追不放，主张追究政治责任。在1956年10月，正当北越自由化达到高潮时，他对正在召开的越南国民大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设立一个独立委员会，调查土改中所谓的“过火”行为、对政府干部的工作建立制度性的监察、把非官方的群众组织真正建成表达人民意见的渠道，以及实现建立在出版和新闻自由之上的言论自由。他强调说，在越南，政治权威至高无上，凌驾于经济和文化生活之上，这是导致土改中的灾难性错误的主要原因。当时越南劳动党召开全会，把总书记长征等党的领导人抛出来作为替罪羊，让他们为土改中的“过火”行为承担责任，长征辞职，一个政治局委员被贬为中央候补

委员,另一个中央委员被贬为普通党员。对于这种不触及制度性根源的“纠偏”,阮孟墙一针见血地说,作为律师,在这样一个权力结构中,他无法在法律的意义上判断什么样的个人能够为这样大的错误承担“责任”,只有恢复法制,才能在制度上避免重犯类似于土改这样的“错误”。

冯馆:把诗句铸成枪弹的诗人

在北越的那场自由化中,打先锋的是文学艺术家。诗人冯馆是其中很有名的一个。冯馆有两首诗当时广为流传。第一首是“反腐败反浪费”,抨击北越不受监督的权力下产生的种种恶行,在诗中,他说“我想把诗句铸成枪弹,射进那些头头的脑袋、他们挥霍人民的血汗、就像丢撒毫无价值的纸钱”。第二首是《母亲给我的教训》,在诗中,他发誓做一个说真话的诚实的诗人:“雷电也打不倒我,如果夺走我的笔和纸,我就用刀把诗句刻在石头上。”为了这些诗句,冯馆后来在狱中度过了32年,1988年58岁时才获释。

冯馆可能是上世纪50年代那批知识分子中唯一一个在越南革新开放后有机会“发声”的人。出狱后,他利用“苏东波”后越南短暂而有限的自由化,在90年代初发表了一些作品,创办杂志《越南之门》。冯馆的舅舅是素友,越南的老左派,原来也是诗人,其作品代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歌颂新社会的光明和英明。对这个名字,中国的文艺界从50年代到70年代是非常熟悉的。他在1956年是知识分子运动的靶子,1957年是整治知识分子的先锋。后来素友官运亨通,80年代是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冯馆出狱后,舅甥曾于1990年新年会面。在那次和冯馆的会面中,退休的素友念了一首诗:

一个干部买了一只表
但他不知道这是真货还是假货
于是他问卖表的姑娘
姑娘说:“假的,但做得和真的一样!”
啊呀,我真的分不清楚!

冯馆听了这首诗很有感触。他在《越南之门》上发表了这样一些感想:“对我来说,这首诗很让人困惑。难道这个政治偶像,这个诗人——曾经像我舅舅一样敏锐(这里他大概用的是反讽笔

法)——直到70多岁才开始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一切到底是真还是假?或者是他心里早就在问自己,但一直等到现在,当手中已没有大权时,他才能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想问题?”

为了这些“感想”,冯馆的《越南之门》很快被封闭了。“苏东波”之后越南短暂的“自由化”也就此告终。

北越的《人道》、《佳品》运动的参与者是很广泛的,还有很多重要人物。例如出版家陈少宝,《人道》和《佳品》就是他的明德出版社出版的。音乐家文高,是北越国歌的作词和谱曲者,他积极参加了陈寅发起的上书和请愿。历史学家陶维英,反对把越南历史削足适履地套到马克思主义人类历史阶段论中,也尖锐批判了北越照搬中国极“左”模式对知识分子实行严厉的思想改造,认为这是在完全摧毁知识分子的尊严。邓范努是著名生物学家,他曾经在战争年代帮助越共就地取材制造抗生素克服森林生活中的种种传染病。女诗人刘氏燕(笔名翠安),是越南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他们都同情和参与了那场自由化运动并在事后受到清算。1958年2月,首批172名参加了《人文》、《佳品》运动的知识分子被送进“再教育班”,3月,第二批304名知识分子也被送进这个班。受运动影响的一般知识分子,后来都或者上山或者下乡接受改造了一段时间(尽管在50年代初已经有过思想改造运动)。



1960年北越以“法国间谍罪”审判“人文—佳品”运动的一些参与者,其中有阮友灯,陈少宝和翠安,刑期从5年到15年。照片中女性中立者为翠安,其他的难以确认,但阮有灯和陈少宝包括在内。■

(责任编辑 萧 徐)

“求实存真”的一面旗帜

○ 郭德宏

《炎黄春秋》不是一个专门的史学刊物,但又是一个具有鲜明史学特色的刊物。它能成为当今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家刊物,离不开历史。《炎黄春秋》创刊20年来,发表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历史的文章,对推进和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我认为,这些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炎黄春秋》秉承了“求实存真”的史学传统,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的办刊方针,对中共历史研究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中国史学本来就有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可是由于长期以来对中共历史政治性、宣传性、教育性的片面强调,使很多党史工作者不敢实事求是,不能秉笔直书,所以党史书籍往往是千人一面,众口一词,信誉不高。而《炎黄春秋》杂志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开创了一块“求实存真”的阵地,树起了一面实事求是的旗帜,对中共历史研究、现当代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促进历史研究工作向“求真”方向发展贡献甚大。刊物内容的学术分量,在学界和学人中的影响力,要超过许多专业性的史学刊物。

第二,《炎黄春秋》发表了大量的别的报刊不敢发表的重要文章和重要史料,使它成为人们了解真实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在其作者队伍中,有许多是历史的当事人和亲历者,他们叙述的许多历史情况是档案资料上看不到的,为研究历史提供了新的历史证据,在保留历史记忆、保存信史上功不可没。

杂志发表的关于中共人物的文章,包括了方方面面,既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很多文章,一改过去的说法,给人以一种全新的印象。例如黄宗英的《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田纪云、胡启立、李锐等关于胡耀邦的文章,都是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有的文章,则澄清了掩埋已久的一些人物的真相,例如赵广瑞的《红四军领导人刘安恭因“托

派”埋名》,就使大家对这个很少有人了解的历史人物有了了解。

杂志发表的关于中共历史事件的文章,有很多都是过去很少涉及的,澄清了很多历史的真相。例如如何方的《〈遵义会议决议〉到底是怎样起草的》,任全胜的《建国后山东最大的冤案“向明事件”》,尹曙生的《公安工作“大跃进”》、郭道晖的《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王海光、于南的《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等,提供的很多珍贵史料都是过去没有见过的。

第三,《炎黄春秋》敢于直面历史,不隐恶、不溢美、不为尊者讳,敢言别人不敢言,具有秉笔直书的史家风范。特别是关于“反右”、大饥荒、“文革”等方面的文章,别的报刊都因为敏感而不敢发表,而《炎黄春秋》发表了这方面的大量文章,例如杜光的《中央高级党校反右派内幕》,杨继绳的《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刘兴盛的《贵州湄潭事件》,周康的《骇人听闻的云南沙甸惨案》等等。这些文章有着大量的第一手史料,揭开了这段历史的一角,补充了地方史志的缺失,弥足珍贵。

杂志还发表了一些关于历史疑案的解决和人物平反过程的文章,例如丛进的《西路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李维民的《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艰难历程》,韩钢的《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等,对于推进中共历史研究也很有帮助。

更为可贵的是,《炎黄春秋》不搞“一言堂”,而是发表多家之言,为正反各方都提供言论的舞台。例如对于中央红军的“四渡赤水”、新四军的“皖南事变”、1950年五一节口号“毛主席万岁”的由来、1958年批“教条主义”的军委扩大会议、“文革”初期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之死、刘少奇之死等很多问题,都展开了争鸣,发表了不同观点的文章,这对于弄清历史真相很有好处。

第四,《炎黄春秋》还发表了很多忧国忧民的

值得补充的一段历史事实

我是《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结缘于1990年后我任山东省青州市政协八届、九届政协委员时，市政协为我们每一位委员订阅了一份《炎黄春秋》，离开政协后个人继续从邮局订阅至今，已二十多年。

《炎黄春秋》是一份讲事实、重真理、顾全面、说真话的月刊，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说它是当今的《资治通鉴》。

数年前《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国内少数民族参加抗战事迹的文章，该文虽然搜罗甚广，但欠全面，把我们2000多回族黄埔军官的抗日事迹遗漏了。

1937年“七七事变”点燃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烽火。国共两党二次合作，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时任军训部部长的回族将领白崇禧将军，通过回教救国会向全国各地分会发出通知，号召动员全体回族青年投考军校，参加抗战。回族同胞接到通知后积极响应，真是父母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全国各地的回族热血青年，怀着抗日救国的壮志，响应祖国的召唤，不避艰辛，辞别家人，于1937年12月齐集汉口，投考黄埔军校第六分校，去广西桂林从军。我是我们青州市考取的28人之一，所有考取学生于1938年2月份乘火车去衡阳，又徒步行军至广西柳州入伍，半年期满，迁回桂林李家村新建校舍接受军官教育，学步兵科的于1940年元旦毕业，特种兵科（炮、工、通）的6月份毕业，其中回族学生共760余人。番号是中央军校第六分校第十五期之总队二大队。而后十六期至十九期均继续招考回族学生，各期总计毕业回族军官2000余人，投身于伟大神圣的抗日战争。他们中的大多数担任团营级、排连级军官，率领着万千兵员和日寇展开殊死的血战，很多人牺牲了青春和生命，碧血黄花，浩气长存。我们刚毕业即逢长沙会战，很多同学为国捐躯，青州籍的就有7人：法景厚阵亡于

（接上页）时论文章，关注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法治、人权、自由、民生等现实问题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这些文章，虽然不是关于中共历史、现当代历史的文章，但贯穿了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主题，反映了当代仁人志士的深刻思考、殷切情怀和良好愿望，对于研究中共历史和现当代历史同样是很有启发的。

除此之外，《炎黄春秋》杂志还发表了一些如

宜昌对岸，刘金生胸部中弹流血过多而战死，他的亲哥哥刘金德也为国捐躯……悲壮惨烈，至今难忘。

七十四春秋（1937~2011）弹指一挥间，我们这些过来人垂垂老矣且为数不多了，散布于世界各地，说不定哪一天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在垂暮之年，有必要交代一下这段历史事实。2008年我们在大陆的黄埔十五期六总队同学联合在台湾的同学，共同出版了一套文集，上下两册，书名是《把一切献给祖国》，两岸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以激励我们的后代，秉承先烈遗愿，共建美好家园，盼中华民族日益强大，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90岁老人脱恩铸

我们成立了《炎黄春秋》读友会

在河南省黄河文化基金会帮助下，我们南阳部分读者最近组织成立了《炎黄春秋》读友会。大家推举了市委党校前副校长、离休干部高元让为会长，推举《跨越历史的轮回》作者耿长建为秘书。读友会宗旨为“以史为鉴，明辨是非，与时俱进，促进和谐”，定期交流学习心得，努力为《炎黄春秋》写文章。南阳知名学者叶青山、赵宗礼、李茗公等参加了读友会。

耿长建

更正

2011年第8期第24页左栏倒数第16行“除李铁轮外，其他七人都是中顾委委员”，应为“除崔田民、李铁轮外，其他六人是中顾委委员”。

王晓中

第8期第47页左栏“1962年2月23日”有误，应为“1966年2月23日”；第94页左栏倒数第3行“国民党参政会”有误，应为“国民参政会”。

褚律元

何编写中共历史和现当代史的文章，很有指导意义，团结、带动了一大批中共历史、现当代历史专业研究者和业余研究者，壮大了研究的队伍，向广大群众普及了中国近代以来真实的历史知识。这都是《炎黄春秋》的巨大历史功绩。

我喜欢《炎黄春秋》的文章，佩服《炎黄春秋》编者的勇气，衷心祝愿《炎黄春秋》杂志越办越好！

（作者为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



三千元五十本起编辑出版 个人文集·回忆自传·家史家谱

出书范围

- 1、个人文集：诗文、小说、杂文、随笔等单集或合集。
- 2、回忆自传：革命、受难、创业、怀旧等回忆录、自传。
- 3、先辈遗文：先辈遗文集、先烈纪念集、家族先贤传、家史档案。
- 4、家史传记：家族百年史、家族大事记、家族老照片、家谱族谱等。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编辑部寄发参考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寄送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设计制作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出版印刷送书。

基本价格

“个人文集、回忆自传”一般32开本，“家族史记、家谱族谱”一般16开本，封面与照片铜版纸彩印，内文黑白胶印，胶装或线装；二百页出版50本三千元起，设计、排版与加印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相关说明

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只用于交流与赠送，需要书号发行的另行协商。北京客户上门服务，外地客户来电说明赠送样书。

老人出书，历史见证；家族出书，文化传承！

服务电话：010-6892 0114 6892 0399

单 位：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图书城25号（家史·家谱·传记书店）

登陆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sw.net)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业务范围：

-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专记、学术著作等。
-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 1、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出版100本三千元，300页出版100本四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2、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出版100本4千元，300页出版100本五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A类型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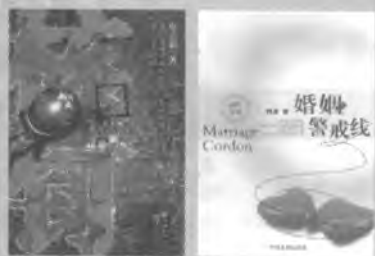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广大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月编辑合作出版作品近百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作品展示



出版服务热线：010-58608407 82057551 58608409
 传 真：010-58608409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 (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 (出版发行网)www.chubanfaxing.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炎黄春秋》创刊二十周年题词选登

以史為鑒

賀《炎黄春秋》二十周年华诞

胡昭立

春华秋实二十载
实事求是谱新篇

楊汝岱

產生憲法百餘年
行蜀道難總大自由
言論首
炎黄努力換新天
祝賀

炎黄春秋创刊廿周年

九十五歲

李銳

堅持
就是勝利

大華潛龍

辛卯年
九七史馬斌達

重新评估三民主义的价值

我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张闻天理论的两大亮点

陈垣校长入党前后波澜

第二次“伍豪事件”

1956~1957：越南“双百”运动人物素描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8.00元